



丛书主编：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刘会军 刘 敏



国共携手

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册主编 ◎ 李晔晔

第一次专门研究统一战线问题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启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先河。

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提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国民革命

第一次用法规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党中央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

第一次修订了党的章程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丛书主编：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刘会军 刘 敏



国共携手

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册主编 ◎ 李晔晔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共携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李晔晔主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10

（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丛书）

ISBN 978-7-202-06971-4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中共三大（1923）—史料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8166 号

丛 书 名	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丛书
丛 书 主 编	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	刘会军 刘 敏
本 册 书 名	国共携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 册 主 编	李晔晔
选题 策 划	马千海
责 任 编 辑	王苏凤
美 术 编 辑	李 欣
封面 设 计	红汇·一品
版 式 设 计	宋晓璐
出 版 发 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80 0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6971-4/D·684
定 价	30.00 元

|| 目录

CONTENTS

◎ 大会纪实 / 001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 00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 00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 003

中共中央三大预备会议召开 / 005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008

◎ 重要文献 / 013

中共三大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 014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 014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 015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 020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 024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 025

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 026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 026

劳动运动议决案 / 028

农民问题决议案 / 029

青年运动决议案 / 029

妇女运动决议案 / 030

◎ 中央委员新成员简介 / 031

李大钊 / 032

谭平山 / 032

王荷波 / 034

朱少连 / 034

项英 / 035

罗章龙 / 037

◎ 热点聚焦 / 039

论中共三大的历史意义 / 040

三大对党的组织建设意义 / 049

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争论 / 050

中共三大为什么要决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 052

在中共三大前后谁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 / 053

中共三大及其后的中央机关 / 055

瞿秋白与中共三大——读“马林档案” / 065

中共三大以后莫斯科召回马林原因探讨 / 072

◎ 党史细节 / 081

斯内夫利特笔记：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 / 082

斯内夫利特笔记：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 087

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 094

党的三大 / 123

第三次代表大会 / 126

瞿秋白三大中央委员问题的质疑 / 139

罗章龙谈“三大”会计 / 140

党的“三大”不存在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 142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

——张国焘给维金斯基、穆辛的信 / 143

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 / 151

◎ 三大之后重要会议及主张 / 157

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研究贯彻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 / 158



三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进一步推动国共双方能圆满合作，并敦促国民党

切实执行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定的章程及相关决议案 / 160

第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

——进一步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正确领导，

巩固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 161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 163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 / 166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 172



大会纪实

- ⑤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 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 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 ⑤ 中共中央三大预备会议召开
- ⑤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

“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目前的一切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中国军阀，尤其是因为解决民族革命问题，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现时工人又尚未充分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

“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参加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1923年1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莫斯科 1923年1月12日⁽¹⁾

第282/03号 致马林同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1923年1月10日会议记录摘录

7. 马林同志的任用

任命马林同志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的第三名委员。

以前对马林同志的委任⁽²⁾予以撤销。

^{*}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主席团认为，马林和维经斯基同志参加下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³⁾是适宜的。

马林同志今后的工作由东方部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印）

科拉罗夫⁽⁴⁾（签字）

注释

（1）这显然是发文日期。

（2）指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

（3）即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4）科拉罗夫·瓦西尔（1877—1950），保加利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897年加入保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曾任紧密派党中央委员。1919—1923年，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参予领导1923年9月的反法西斯起义。自1921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他是保加利亚反法西斯运动组织者之一，并曾任保加利亚共和国临时主席，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195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1923年5月）

一、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二、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无论出于任何考虑而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意义，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三、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到此目的：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歉收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统治；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等等。

四、必须根据这些基本要求，并利用关税收入、盐业垄断以及部分财政操于外国资本之手等等事实，使全体贫苦农民懂得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只有给反帝战线的口号找出土地问题的根据，我们才能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胜利。

五、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六、因此，我们应当坚持过去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我们对民族民主主义的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要它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

七、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内战的问题上，我们支持孙中山，但是，我们要求国民党通过有系统的宣传鼓动建立广泛的民族政治运动，阐明孙中山军事行动的意义，并以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为行动纲领，吸引中国最广泛的民主力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们的斗争。

八、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

九、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而苏俄则不仅是西欧无产阶级的盟友，而且也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盟友。这种勾结有使国民党的运动堕落成为军阀混战的危险，从而不可避免地不仅要导致民族阵线的彻底瓦解，而且要导致

工人组织和共产党的信誉扫地，因为目前它们为了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斗争，正在同国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

十、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发生类似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问题，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

十一、由于中国民主力量提出废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要求，目前在中国又掀起了抵制日本的运动，党应当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个运动。我们党应当尽力扩大这个运动，直至使其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力量的普遍的反帝运动，并要求废除英、美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债务（如治外法权、庚子赔款、关税抵押等）。

十二、中国共产党应当把抵制日本的运动视为民主统一战线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军阀政府为了讨好外国帝国主义而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十三、我们党应当尽力找到适当的形式（如行动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等），把中国广泛的民主阶层联合在这个反帝的运动中。应当首先把国民党和革命学生组织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

中共中央三大预备会议召开*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三大后，各地按中央的通知精神，按民主程序进行大会代表的推选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4个区。区党组织的名称叫区委员会。各区委员会都接到中央通知，要求选派代表参加中共三大。

据当时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1923年五月间，中共中央从上海来信，内容是关于召开中共三大的问题，要求北方按照中央的规定选派代表参加。中央规定参加三大的条件是：第一，主要是产业工人；第二，各区委书记可以来，但不要都来；第三，工运负责人。

* 李颖，人民网，2011年6月2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809871.html>



罗章龙回忆说，中央关于召开三大的通知文件到达后不久，“中英”（中央代号）又单独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工作，并要求李大钊和罗章龙前去参加三大。最终北方区委决定选出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王仲一、王俊等12人为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共青团组织也派出负责人参加，这是全国各区代表中人数最多的。

其他区也或指定或选举，派出了代表。两湖区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树德等，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等。中央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此外，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

在中共三大前，全国各地共推选代表40名。马林在1923年6月2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

“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苏学生支部）。”这说明，三大代表经党员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全国420余名党员的意志。

以北方区委为例，选出的12名代表，分三批走。为了保密，不乘同一交通工具，不同一天走，但时间相隔不远。路线是由北京坐火车经天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到广州。和罗章龙一起坐船的有湖北省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项英。到广州后，罗章龙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其他代表则由广东区委派交通员带到指定的地点居住。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叫“管东渠”。罗章龙回忆说：“我们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有时在谭平山家，有时在广东区委，有时在马林家，有时在其他地方。中央负责同志也不住在代表宿舍，每次开会都是有人带路。其他代表则住在代表宿舍。”

江浙区代表、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也较详细地回忆了他们一行六人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过程。他说：

我和王振一从上海坐船到广州去开会，和我们同船前往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于树德、金佛庄共六人。于、金两人是自己出的路费。记得当时于树德

没有钱，急得没办法，我给他出主意，让他把邻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记得在香港和李大钊上岸去还喝了一点酒。船到广州，在太古码头上岸。这时，天气已经很热，街上卖荔枝的很多，价钱很便宜。到广州后，广州党组织派人来接我们，是在长堤码头。因为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没用介绍信。我们都没有带行李，随身只有一个小包。一上码头就沿珠江岸边步行到三大会址。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休息了两天才开会。

从1923年初到5月间，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进行三大的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主要是对大会的内容和议题进行研究，并成立了各种起草小组。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12日决议精神，陈独秀为中共三大起草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国共合作等大会议题，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尤其是对国共合作的问题，专门召开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1923年6月上旬，中共三大预备会议在广州东山的春园召开。春园是指广州东山新河浦22号、24号、26号三幢公寓式洋楼，是1922年一个姓黎的美国华侨商人和其他两位华人合建的，是一所很有特点的建筑。这所原本普通的房屋，因中共三大的召开，而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会议由陈独秀和马林主持。马林讲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及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人选和中共三大各决议案的起草情况。马林和陈独秀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经常在春园24号楼二楼和三楼客厅研究问题，探讨国共合作的方针策略，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起草中共三大的宣言和各项决议草案。

罗章龙回忆说：“中共‘三大’前夕，在广州开的预备会议我参加了，开了两天，先后在陈独秀的家，马林住的春园召开的，预备会由二届中央委员和一些省的负责人参加……内容主要是对有关大会问题交换意见。”

据徐梅坤回忆，为了召开中共三大，毛泽东、向警予、蔡和森、张太雷、瞿秋白、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比较早地来到广东。三大会议前的事务工作是广东区的代表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罗绮园等人负责筹备。“关于国共合作



问题，共产国际是有指示的，我党接到了第三国际的指示，所以召开‘三大’进行讨论。”

会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还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代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上届代表会议⁽¹⁾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材料也遗失了，所以概述得不可能全面。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当上海的迫害更加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改善中央机构还是不可能的。

上海和广州小组由这两个市的一些地方小组组成。北京、汉口和长沙（湖南）的许多地方小组已联合成地区小组。郑州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被破坏了。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²⁾，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

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

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³⁾，这种间断的情况是罢工造成的。报纸只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然而在初期我们的日报遭到了批评，现在它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也出版了周刊。

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在很多场合，我们发表了宣言。《新青年》杂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出版《前锋》月刊，刊登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

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关于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的“民权”运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民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们始终反对军阀的。有个时期，我们忙于组织京汉铁路员工，要与“交通系”作斗争，而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那时我们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时起，我们就猛烈地反对了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恰当的。

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现在我谈谈工会的宣传工作。先从上海谈起，上海的工业最发达和最先进。可是那里的工人组织却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有很多工人组织，可它们只是空有其名。我们与一个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组有联系。国民党与海员和制烟工人有联系。我们对于上海应该更加注意。

在北方的铁路员工中，我们在京汉线上有较好的组织，可是在罢工期间被破坏了。津浦路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实际上并不存在。京奉路的组织是秘密的。津浦路上的工人还严重地分成各个同乡会。京奉路上至今还很难把不同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

湖南、湖北和广东的联合会与我们有联系。湖北的炼铁、制烟和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工会，以及人力车夫组织，也与我们有联系。汉阳工会很有希望，是中国最大的工会，可以作为榜样。萍乡矿工工会在二月罢工中受到了损失，但组织仍然保存下来了。

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加入这个联合会的还有萍乡的矿工。粤汉路的组织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其余的组织是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广东的大部分工人工会是手工业工人工会。建筑工人的组织也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十三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我们对广州和湖北的“女权联合会”有一些影响。北京和上海也有这种联合会。

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

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现在我们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还应当工人在中进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现在我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邓同志⁽⁴⁾在唐山和科乌⁽⁵⁾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注释

(1) 为代表大会之误，下同。

(2) 原文无货币单位。

(3) 此处俄文稿为“*ежедневник*”（日报），德文稿为“*Die Woechentliche Ecitung der Partei*”（党的周报）。

(4) 根据陈独秀在本文中说，“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而在党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姓邓的只有一人，即邓中夏，故判定为邓中夏。

(5) 音译，俄文为“*Кой*”。



重要文献

- ⑤ 中共三大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 ⑤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 ⑤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 ⑤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 ⑤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 ⑤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 ⑤ 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 ⑤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 ⑤ 劳动运动议决案
- ⑤ 农民问题决议案
- ⑤ 青年运动决议案
- ⑤ 妇女运动决议案



中共三大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不但工人农民学生感觉着，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

目前北京政局之纷乱儿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工会学生会日在压迫摧残中；山东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借端要挟，并要拿回华盛顿会议所赏的利益；沙市长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强令棉花出口；吴佩孚齐燮元争相制造广东之战祸；吴佩孚萧耀南合力助成川乱；又若未来的奉直战争及直系军阀之内哄；——在在可以证明内忧外患交加于国民之身，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势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以证明本党一年以来号召的“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之国民革命运动，不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外力，减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会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同时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

一、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的结果，乃产生帝国主义；把殖民地变做他经济机体的附庸，就是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中国旧时的宗法社会，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割地赔款，强辟商埠，接受外债等，——就开始崩坏。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二、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性质

外货之输入，虽然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适应了他而渐渐趋向集中，但是外国大资本生产品之占领中国市场，几乎同时断绝了中国的大工业发展之可能；原料之输出，虽然使特种农产物的收集和流通渐渐进到了新式的组织，但这样便紊乱了中国旧时经济基础之宗法社会的农业。因为这个原故，中国国内国外的商业便独作偏畸的发展，基本农业的生产力一天一天退步，工业被外力阻住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不得正当发展，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失地的农民，他们人数之众多和失业失地之迅速，比起国内工厂等新式生产机关的发展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这些新式生产机关自然容不了他们。

这种经济的大变动，只有极少数的官僚和极少数的大商人（财阀）趁火打劫得了些便宜；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证，他们遭受贱价劳力的剧烈竞争，他们遭受一切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他们无法生活。商业经济的市场越开展，外货之输入原料之输出越增多，而同时生产方法之改进甚少，宗法社会崩坏之过程因而甚缓。而且国家在对内对外的新环境内，令政府不得不滥征各种苛税，故生产事业更因之而毁坏日甚。

三、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

失业的人越多，极幼稚极少数的工业生产越不能收容，兵和匪就越多。中国最初因为要抵抗列强而采用近代的军事技术，添设“新军”这本不是积弱的中国所能担负，尤其不是宗法式的皇帝所能驾驭；而且中国旧时的经济生活极其散漫，并没有成为一个集中的经济区域，这些散漫的半独立的区域，到处都能够将财阀的经济力去供给军事长官或土匪，使他们都有所凭借：因此就造成了军阀统治的政治形势。中国军阀之存在及发展，又大有赖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便不惜向列强低首，甘心做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各军阀有此种种凭借，便互争雄长，引起不断的内乱；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谋利用中国一派军阀，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又酿成了无穷的冲突。军阀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日趋剧烈，中国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争斗也日趋紧迫，不但如此，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稍为有一点发展，劳资的争斗也就稍为有了一点萌芽。

这种种争斗的表现，到欧战以后就更发显著了。

四、欧战后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

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自尽量地发展，而又相互攘夺，因此酿成欧战，结果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但在各殖民地却恰好趁此机会勉强地发展了他们

的工业；一面世界的社会革命时期从此开始，打断帝国主义战争的横流，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做许多殖民地革命之自然联盟者。中国系处于“国际殖民地”的地位，欧战以前列强在华虽然互相恶斗，但尚能勉强维持其均势，中国的政权也就因为这个均势尚能勉强保存于本国军阀之手；固然亦因此而中国在欧战中之经济发展仍是横受各方牵制，并未能有长足的进步，然在这一期中国工业极小的发展中，毕竟露出了少数的无产阶级，渐渐可以加入世界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因防御社会革命而力求恢复资本主义的威权，更竭尽全力来侵略中国这一个唯一的“自由”市场，其侵略方法，愈进于攫取财政权及移殖资本之倾向，愈要勾结军阀煽动内乱；于是辗转相因，使“游民化”“兵匪化”更成为中国之普遍的经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的势力自然不免涣散。况且中国经济生活中骤起骤落的危机，无一不受正在崩坏的世界资本主义之影响——列强大资本生产品之倾轧，原料之垄断，机器购买之限制以及关税金融之操纵都使幼稚的中国工业发展受莫大的障碍。再则欧战后列强间的均势时有破裂之虞，已屡屡引起其代理人（军阀）中间的战争；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冲突更将引起太平洋上的世界大战。因此种种，可以证明中国之经济力，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之下，永无独立及充分发展之可能，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自然亦极难发展集中其争斗力。因此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民主的总争斗就日趋激烈，日益迫切。

五、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处于现时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充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在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求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澈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的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因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六、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

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尽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行之速度。

七、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

中国民族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革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不期而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战线相联合，故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根本上不能不冲突；而劳动平民及无产阶级的解放，尤其与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根本上不相容：国民革命之进行，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所以中国无产阶级更当参加此种国民革命，以先锻炼集中其能力而取得政治争斗中的位置，方能于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

八、中国无产阶级争斗之方式

凡属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争斗必是政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当然也是一样。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中国劳动平民反对军阀制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但是，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

九、共产党之任务

中国无产阶级，同时须从事国民运动及阶级运动这种复杂的争斗，其职任非常困难，而其发展程度又非常之稚弱。所以他的争斗必与世界无产阶级的争斗有最密切的关系。此种自中国国民革命进而至世界社会革命之争斗，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标；而锻炼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任务。

中国共产党根据上述的理由，特定出最小限度的党纲，以为目前的要求如下：

1. 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

2. 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以办公益的生产事业。

3. 铁路银行矿山及大生产事业国有。

4. 实行无限制的普遍选举，选举期当在休假日。

5.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6. 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权。

7. 平民须有建议权，罢官权，撤回代表权及废止法律权；中央地方重要的国家职员须民选。

8. 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生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

9. 实行都市和乡村自治。

10. 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财政公开。

11. 废止厘金，征收所得税及遗产税；每年审定租税一次。

12. 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全国教育经费应严重保证。教员应享受年功加俸；到相当年龄应享受养老年金。

13. 改良司法，废止肉刑及死刑，免除一切诉讼手续费。

14. 废止雇佣军队制度，改行民兵制。军饷公开。

15. 供给并改良都市贫民之住宅；规定限制房租的法律。

16. 限制一切日常消费品的最高价额。



17. 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

- A、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
- B、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
- C、改良水利。
- D、改良种籽地质；贫农由国家给发种籽及农具。
- E、规定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最小限度。

18. 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

- A、废除包工制，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制（工会议定雇用条件）。
- B、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做日工者续做夜工。
- C、每星期应有三十六小时以上的继续休息。
- D、女工与男工之工资待遇一律平等；生产期前后六星期之休息，不扣工资。
- E、禁止雇佣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十四岁至十八岁者每日工作不得过六小时。
- F、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监察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
- G、制定强迫的劳工保险法（灾病死伤的抚恤等），工人有参与办理保险事项之权。
- H、救济失业之工人。

此草案通过于第三次中国共产党大会，作为底稿；并议决令各地方郑重讨论后，尽一九二四年一月前将批评、修改及增补之条文意见等，汇交中央局，以便交由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带往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作最终之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第一章 党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

第三条 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四条 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第二章 组织

第五条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五人之处，亦当有组织，公推书记一人，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于中央。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

第六条 一地方有十人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七条 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



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

第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

第十一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三章 会议

第十二条 各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之。各地方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其有特别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组长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月一次）。各区每三月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每五人有一票表决权。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

第十三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三分之一之区代表全党三分之一之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四十人以上者得派二人，六十人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四十人得加派代表一人。每地方十人有一票表决权。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但有无表决权由大会决定。

第十五条 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六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七条 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

第四章 纪律

第十八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九条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第二十条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相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一条 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之（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或（之）命令。

第二十二条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党纲宣言章程及中委（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三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四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五条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六条 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 （二）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
- （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
- （四）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 （五）不守纪律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五章 经费

第二十七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百元者缴二十分之一；在一百元以上者缴十分之一。失业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八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条 本章程由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1）}——二十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注释

（1）此处之“七月十日”系“六月十二日”之误。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一）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议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管理各区各地方之行动，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并管理派遣做青年，妇女，劳工，农民等工作之职员。

（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三) 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

委员长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

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

(四)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每四个月开一次，中央局每星期开会一次。中央局自己或经中央执行委员四人之请求，可召集特别会议。在请求书上须说明开会讨论之问题及其理由。

(五) 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

(六) 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但召集临时全党大会之议决，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取决。

(七) 中央执行委员会，须在全党大会开会日期前至少两月通知召集，附寄议事日程草案，并请地方于通知后一月内交齐议案。各地方议案须互换。

(八) 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在开会一月之前寄与地方。

(九) 中央执行委员会财政报告，由大会指定审查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不得当选）审查后报告大会。

(十) 如有本党三分之一之区代表全党三分之一之党员之请求时，执行委员会必须在接到请求书之一月内召集本党临时大会。请求书上必须说明请求召集临时大会之理由。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听了赴第四次国际大会代表报告之后，大会决议：

(一) 对于第四次大会所议决各案愿切实履行。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二) 现时的世界大势是：世界革命潮流日益低落，反动的势力弥漫全欧，苏维埃俄罗斯的生存及发达日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全世界无产阶级此时的重要任务是在要求资本家政府承认俄国与俄国恢复和平的通商关系，以拥护他们的唯一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摧残。

(三) 世界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使劳动阶级的地位沦落，劳动阶级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所得工资尚不能维持其生存，同时劳动阶级内部有改良派分裂无产阶级，力助资产阶级破坏罢工及示威运动。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的口号是为劳动运动的统一。

(四) 对于东方问题的决议案：大会特注重其在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二种工作：即一面为国民革命，为达到殖民地的政治的独立奋斗；一面须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间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

(五) 大会承认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此次由联合的基础之组织，改组到集中的基础之组织，并以为这是进到组成一个集中的国际大共产党的第一步表现。

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一) 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二) 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财政交通工业几完全操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分，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所以半殖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四）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六）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七）我们在国民党内，须注意下列各事：（1）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2）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3）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内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4）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八）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目前政治的争斗，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



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

劳动运动议决案*

（一）中国目下劳动运动方取守势，党的活动须多于工会活动，恢复工会口号须在被封工会各工友中宣传，引起压迫下之工人作政治的斗争。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应从速召集全国各路代表会议讨论各路统一之工作，改造筹备委员会及讨论救济“二七”被难工友之方法。

（二）哈尔滨及山东两地在产业上及地位上皆甚重要，该两地方之劳动运动不可忽视。哈尔滨方面之劳动运动更宜作与苏俄工人联合之宣传，现时反对苏俄之趋向亟宜纠正。

（三）广东方面劳动运动，须注意新式产业之工人。至进步的手工业工人组织同时亦须整顿，促进其阶级觉悟。

省港澳三方面产业的及手工业的工人组织，须适用国民运动口号作统一运动。

香港地方在产业上甚为重要，在该地方之劳动运动须设法改职业组织为产业组织，以增加工人势力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之压迫。

南洋华工为数极大，须设法使其与国内工人发生密切关系，但须纠正其省界国界分别之趋向。

（四）中国妇女劳动运动以上海天津等处为最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

（五）工厂劳动运动须通用下列口号：（1）男女工资平等；（2）废止未满十四岁之童工；（3）推翻包工制；（4）星期日休息；以引起男女工人争取自身利益之觉悟。

（六）为养成劳动运动人才起见，在适当地点设立劳动教育机关，以启发工人宣传及组织之知识。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七) 劳动组合书记部今后之责任为组织天津哈尔滨山东上海等处已组成之路矿等工会以外之各种工会。

(八) 在半殖民地之中国手工业工人占多数，在手工业中之劳动运动中除加薪减时口号外，消费合作运动或要求红利运动亦宜注意，但须纠正劳资妥协之趋向。

(九) 大的产业工会，尤其是海员工会，须设法引起其与赤色职工国际联合。

农民问题决议案*

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青年运动决议案**

第三次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物上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

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根据本党第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之议决案极力参加国民运动。

妇女运动决议案^{*}

(一) 劳动妇女运动 在去年的蓬勃罢工运动之中，已表现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之重要与意义。但同时男工女工间之冲突亦随而发见。此种冲突之来源大致由宗法社会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还保留于男工之中，以致女工在工会中常感男工压迫侮辱之痛苦，因而另思组织女工会，此实为工人阶级分裂之危机，本党关于此点应尽力宣传，不仅要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至接触女工初步方法，或办工儿院，或办女工夜学，亦方法之一，并可斟酌情形因期制宜。

(二) 一般的妇女运动 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此等运动年来在各处皆已发生，但是既不统一，又不活动。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至我们指导此等运动的态度，亦宜注意：第一，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第二，阶级的主义的色彩不要太骤太浓，至使她们望而生畏。

(三) 妇女运动委员会及出版物 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起见，应设立妇女委员会以外，要在全中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精神的中心，应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央委员新成员简介

- ② 李大钊
- ② 谭平山
- ② 王荷波
- ② 朱少连
- ② 项英
- ② 罗章龙



李大钊

李大钊，汉族，1889年10月生，河北乐亭人，学名李耆年，原字寿昌，后改守常，曾用名李龟年，笔名孤松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大学文化。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早年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5月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起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1918年6月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之后，和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主编《晨报》副刊，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1920年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其间：在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并兼任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1924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1924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逮捕。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就义。

中共第三届、四届中央委员。

谭平山

谭平山，汉族，1886年9月生，广东高明人，字成斋，号鸣谦，曾用名谭聘三、谭诚齐，1920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广州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后被开除党籍），大学文化。

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东雷州中学校长。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21年春与陈独秀等领导成立广州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分部主任，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部长。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委，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兼农政部部长。1927年4月至5月任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27年8月），1927年6月至7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夏任中共中央农民部部长、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11月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开除党籍。1930年5月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设计委员，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10月起任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主要负责人。1948年1月在香港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3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一届、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三届、四届、五届中央委员（1927年11月开除），第三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27年8月），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6月至7月任职）。



王荷波

王荷波，汉族，1882年5月生，山西太原人，原名王灼华，曾用名满玉纲、汪一喜等，俄文曾用名彼得洛夫，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6年起在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做钳工。1921年组建浦镇机厂工会，任会长。1922年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先后组建了浦口铁路工会、徐州铁路工会、济南铁路工会、天津铁路工会。1923年8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1923年9月至1924年1月任中共上海地方执委会兼上海区执委会委员。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1924年5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1924年12月至1925年1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925年1月至1927年5月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1925年2月至1926年2月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先后在南京、上海、河南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并调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1926年5月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1927年2月起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书记，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铁路总工会书记、常委。1927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北方局组织部部长。1927年10月因叛徒出卖在北京被捕。1927年11月11日牺牲。

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届中央局委员（1923年8月中央决定任职），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7年8月至10月任职），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朱少连

朱少连，汉族，1887年3月生，湖南衡阳人，原名朱天资，字汉英，号孝莲，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北铁路学堂毕业。

1904年入衡阳中学学习。1912年毕业于湖北铁路学堂。1921年担任株萍铁路管理局行车部总司机。1921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至10月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1922年9月参加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任罢工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22年10月任工人俱乐部路局主任。1922年11月被选为湖南工团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之后参与筹备成立汉冶萍总工会。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央驻湘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26年3月至1927年7月任株萍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926年5月在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1926年9月回安源，成立萍矿总工会。1927年5月起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27年7月起任中共株洲地委宣传委员兼工运委员。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1929年1月4日在安源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29年1月8日在江西萍乡大西门外就义。

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

项英

项英，汉族，1898年5月生，湖北武汉人，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江俊、韩应、张成，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小文化。

早年在湖北武昌一家织布厂做工。五四运动后开始秘密从事工运活动，1920年曾领导所在工厂工人罢工。1921年12月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相继在铁路、工厂等组建工人俱乐部或工会，任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秘书干事、武汉市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1922年7月起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1922年8月起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总干事、总工会总干事、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4年8月至1925年1月为中共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后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1926年5月至1927年6月任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副委员长，其间：1926年6月至12月兼任上海总工会常委会委员，并曾兼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主任。1926年10月起任湖北全省总工会组织部主任、武汉市武装工人纠察总队总

队长。1926年12月起任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执委会组织部主任。1927年11月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28年2月至5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2月起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主任。1928年2月至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职至1931年1月）。1928年秋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11月回国，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主任。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8年11月至1930年2月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9年1月至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部委员。1929年11月在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主任。1930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1930年8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11月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1931年1月至10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二届中央执委会第一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部长、财政委员会代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主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委会第一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代主席、代副主席，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4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夏任赣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起任新四军副军长，12月起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1938年11月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书记。1938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辗转隐蔽，同年3月14日在安徽泾县殉难。

中共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中央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8年

2月至7月任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8年2月至7月任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至1931年1月），第六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曾任中央军委委员。

罗章龙

罗章龙，汉族，1896年11月生，湖南浏阳人，原名罗敖阶，字仲言，1920年冬加入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被开除党籍），大学文化，教授。

早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习。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1920年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任书记。同年冬加入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该组织在北京大学的负责人。1921年8月至1922年7月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委员，分管组织工作。1921年8月起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1922年至1923年6月任中共北京东城（北京大学）支部书记。1922年8月至1925年5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副主任，其间：1923年3月前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1923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局委员。1924年5月至1925年1月任中共中央宣传报刊部主任。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随后在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该会中国书记。1925年1月至1927年5月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1926年2月至1927年2月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总干事，1926年2月至1927年5月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1927年2月起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汉口市委书记、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湖南省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1927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党报委员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主任。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将其开除出党。1934年起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在湖南大学、



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1978年后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政协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5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

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开除），第三届中央局委员。



热点聚焦

- ① 论中共三大的历史意义
- ② 三大对党的组织建设意义
- ③ 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争论
- ④ 中共三大为什么要决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 ⑤ 在中共三大前后谁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
- ⑥ 中共三大及其后的中央机关
- ⑦ 瞿秋白与中共三大
- ⑧ 中共三大以后莫斯科召回马林原因探讨

论中共三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为了确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于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三大总结了“二七”惨案的经验教训，克服了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思想障碍，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孙中山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从而为实现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一、中共三大是党探索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认识上的深化和总结

国共两党首次建立合作关系，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是共产国际实施其“东方战略”的必要途径。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需要在东方各国特别是在邻近的中国寻求合作的盟友。为此，共产国际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和世界形势的基本格局，把自己的活动范围由欧美地区进一步扩展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确立其“东方战略”，认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通过东西方革命运动的相互支持，结成强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以推进世界革命。其次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封建军阀是最主要的敌人，是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的根源。国共两党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都需要寻求政治上的同盟者，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于是形成了两党可以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

共产国际对于国共建立合作关系，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直接的指导与帮助，曾先后派马林、越飞等来中国，具体进行这项事宜。然而，中国共产党将列宁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付诸实现，并非一帆风顺。在这

*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党史网，2011年12月5日，<http://www.zggzds.gov.cn/gzhdjnhd/1502.jhtml>

个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首先是对统战对象的选择，受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使节的影响，最初看重伪装进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广东军阀陈炯明，而后才转向了孙中山国民党。其次是党内对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从建党到中共三大前，较大的争论有3次：

第一次：中共一大。党的一大最早提出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与会代表讨论党纲时，涉及到是否与其他党派合作问题，出现了争论，有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由于大多数人对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基本问题认识不清，所以没有作出专门决议，只是在《第一个决议》中表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对现有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和在广东作实地考察后，建议中共领导人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而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但遭到中共领导人的拒绝。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申明6点理由，反对马林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这一切表明，党当时尚不具备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第二次：广州会议。1922年4月上旬，应邀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他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多次会谈。孙中山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苏俄的友好感情，表示愿意与苏俄建立联系。但当达林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外联合”的建议时，却遭到孙的严词拒绝。鉴于此，在达林的建议下，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干部于4月底召集会议，研究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达林提议中共在保持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应加入国民党，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大多数人不同意“党外联合”，但反对加入国民党。会议虽未能通过协议，但预示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了。”大约半个多月之后，陈独秀5月23日在《广东群报》上发表《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采取态度》一文，率先提出了共产党愿在同一目的之下，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其他党派，“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提出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反对封建军阀的联合战



线。接着，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原则，标志着党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初步形成。不过，当时党内大多数人仍主张国共“党外联合”，反对两党的“党内合作”。

第三次：西湖会议。1922年8月，共产国际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要求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部组成自己的团体，同时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显然，中共二大通过的“党外联合”的决议，与共产国际“党内合作”的指示是不相符合的。为此，第二次使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次向中共提出：共产党员“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当时，因中共二大刚开过不久，不可能很快地再开代表大会，所以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于8月底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起初，与会者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担心中共加入后会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共产党的独立性。但通过马林的耐心解释与说服工作，会议勉强同意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中共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样，西湖会议由“党外联合”转变为“党内合作”，比党的二大前进了一步，成为中共政治主张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正如陈独秀所说：“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以后我们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中共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下列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一是共产国际专门作出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又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尊重国际纪律，服从国际的决定；二是中共成立不久，势薄力单，又不能公开活动，经过斗争实践，策略思想有了一定的提高，改变了过去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做法，认识到只有借助国民党这面旗帜，才能实现民主革命的纲领，以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三是国民党向来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居，孙中山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他既需要中共的帮助，又反对与共产党“平起平坐”。在这种情况下，党作出必要的让步，将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发展。否则，统一战线将是一句空话。实践证明，这是党在创建之初的一种正确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对列宁

殖民地革命理论和策略思想的具体运用。

国共两党的联合，固然还取决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变化。孙中山自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后，先后发动和领导了讨袁战争和护法运动，虽然在人民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所有这些斗争都失败了。1922年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退避上海，蒙受其有生以来最沉痛的打击。处于危难绝望之中的孙中山，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支持和真诚帮助。是时，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等在上海分别拜访孙中山，向他表示与国民党合作的愿意；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正确总结失败的教训，下决心寻求新的力量和途径，毅然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西湖会议之后，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加入了国民党，但“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所以说，西湖会议决定加入国民党，还只是抽象的理论。直到“二七”惨案的发生，才使中共对建立统一战线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认为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独立的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必要有各革命阶级的援助。”而孙中山和国民党通过“二七”斗争，一方面同情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则看到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从“二七”失败以后，国共两党才加快了联合的步伐。

以上可见，党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与探索，对孙中山国民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同时对于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认识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中共三大以前，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全党始终没有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所以在三大会议上，再次爆发激烈的争论，此乃合情合理之事。经过尖锐争论，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既是前期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继续和深化，又是以代表大会的形式对这一探索的总结。



二、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方针与组织形式，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序幕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1923年1月，共产国际专门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和工人运动尚不强大，所以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共应当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支持国民党，但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也绝对不能隐蔽自己独立的旗帜。这个《决议》推动了国共合作的进程，并成为中共三大决定建立国共合作的指导方针。此时，中共党内已经没有人原则上反对加入国民党了，但有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为国民党的发展，我们合作到何种程度？应在哪些问题上批评国民党？”等等。

为了确定国共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国际派遣代表马林参加筹备并亲临大会指导。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月的决议，大会着重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要争论问题有二：第一，关于全体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马林、陈独秀等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有指示，“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认为中国目前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它途径”。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一切工作应该集中到国民党”。张国焘、蔡和森等反对陈独秀的意见，担心全体加入会丧失党的独立，会使党腐化。认为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起革命作用，“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这是取消C.P.存在的主张”。第二，关于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等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又不能公开，主张“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张国焘等后来虽赞成加入国民党，但反对产业工人加入，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加入国民党就会削弱共产党，

坚持党领导职工运动的独立性，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蔡和森甚至梦想再建立一个“独立工人党”。

经过两天激烈的争论，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有了统一的认识：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大会表决时，以5票的微弱多数（21票赞成，16票反对），否决了张国焘等人的主张，使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获得通过。这样，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党内经过长时间争论，终于划上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

如何看待三大的争论？党史学界早已摒弃其“路线斗争”或“机会主义”之说。争论的分歧表明，其焦点并不是反对或赞成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而是怎样实行联合战线，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方式。正如陈独秀所说：“大家都确认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而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也如魏金斯基所指出：“共产党人应怎样组织中国工人——是打出国民党这面国民革命运动的旗帜，还是直接由中国共产党去组织工人——这乃是党内争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党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分歧，真实地反映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不同认识，其中包括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党的基本任务、革命动力、统战对象、对国民党的认识、保持党的独立性问题。而争论的两种倾向，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争取领导权”。从双方的观点来看，各有其正确合理的一面，同时也各自带有其片面性，正如蔡和森在中共六大会上发言时说：“两种倾向都有错误都是很幼稚的，特别是我的左稚病。”陈独秀等人的意见，有利于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实行，但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等人的主张，虽能保持党的独立性，但其主张是使党的策略建立在幻梦的基础上。相比之下，陈独秀等人的意见，符合国民革命的发展形势和中心任务，更具有可行性和切实性。

笔者认为，争论中确实存在“左”的或右的倾向，其性质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探索中的不同观点，属于很正常的现象。再者，党员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



发表不同的意见，展开激烈的争辩，最后形成决议，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同时也说明党在逐步成长之中。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社会性质及阶级关系，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特别是党在国民革命中的责任，都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强调应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是中共三大的主要功绩。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形式的确定，使党“已经找到了实际工作的正确道路”。

但是，中共三大也有理论上的明显不足，主要是对国民党的力量估计过高，把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体；而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则估计过低，应处于辅助和从属地位。认为革命领导权应属于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从建党到中共三大，党在探索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过程中，从反对合作到同意合作，从主张“党外联合”到接受“党内合作”，充分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进一步结合的成果，反映着党的策略思想的不断深化和提高。这种理论上、策略上的提升，为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大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准备，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

中共三大以后，党中央由广州迁回上海。党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帮助国民党改组，推动国共合作的建立。其一，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强调“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其二，根据三大的决议，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强大推动力。其三，孙中山采纳了陈独秀和马林为其制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提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主要目标，是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人民群众，主要注意力放在宣传工作上，把国民革命运动真正建立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其四，党通过《向导》周报等刊物，对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一些错误主张和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提出善意的批评和规

劝。这些批评对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五，经过半年时间，国民党改组工作顺利完成，最后促成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三、中共三大确定国民革命为党的中心工作，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第一次转变，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所谓国民革命，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几个阶级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提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国民革命，并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致力于国民革命运动，这是中共三大的另一个功绩。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和《宣言》里，不仅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且对国民革命运动作了详尽的阐明，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认为“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而参加国民革命的意义在于：“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为此，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

因为建党初期，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性质，缺乏正确的全面的认识，提不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纲领和路线，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企图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想取得革命成功。这既背离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原则，又不符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实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党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经过斗争实践，到中共二大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开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转向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策略。认识到：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首先是民主主义；对现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不能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联合各革命派共同对敌。这表明党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开

始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闭幕词中指出：“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没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定了党要走的道路。”

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中共二大时，党的工作仍以反封建军阀的工农民主革命为重心，并没有真正转移到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轨道上来。二大只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没有制定出切合实际的现阶段斗争的目标和策略。虽说中共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但由于认识不足和宣传不力，“反对军阀”已成为全国普遍的呼声，而“反抗帝国主义”的声音则微乎其微。所以陈独秀在三大会议上说：“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很大的影响。”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共从1923年1月起，开始放弃使用“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口号，改称“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两者之区别在于：前者只提反对封建军阀，坚持国共“党外联合”；后者则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实行国共“党内合作”。这表明党已经开始实行由以反对资本家阶级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向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的国民革命运动转变，而且成为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中共三大以后，开始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并且意识到必须联合各党派各阶级进行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国民革命，才能战胜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取得最后胜利。

中共三大确定把国民革命为党的中心工作，使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于是完成了党成立以来把自身建设和工人运动为主要职任到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为宗旨的战略策略的转变，实现了工作重心的第一次转变。从此以中共三大为分水岭，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创建时期转变为大革命时期。所以党史上“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分期界定，是以中共三大为主要标志。

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开创了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掀起了大革命的新高潮。在组织上，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各级党部，党员由20万发展到30万，恢复了国民党以往的革命精神；共产党的队伍在3年内增长60倍，党员由400余

人猛增到 5.7 万余人。在军事上，创办黄埔军校和建立国民革命军，取得了统一广东革命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在工农运动上，出现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以两湖为中心的工农革命运动高潮。实践表明，中共三大确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及其“党内合作”形式是正确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中共三大加入国民党的决策，就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也就不会出现国共两党“双赢”的局面。

三大对党的组织建设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进程。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决定“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但由于共产党坚持党外合作方式，不被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所接受。1923 年 6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中心议题就是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

中共三大之后，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使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这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胜利。通过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影响力，增加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毛泽东在谈到中共三大开创的以国共合作为组织形式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时说：“中国的革命，从 1924 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 1924 年到 1927 年的革命。孙中山

* 节选自林元和：《中共三大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人民网，2006 年 7 月 12 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4582081.html>



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 40 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结果。”历史证明，中共三大开创的统一战线不但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法宝，至今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在党的建设方面，中共三大关于自身建设的很多尝试，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三大是党的历史上相当规范的一次全国党代会，有几个“第一”值得我们注意：（1）党的重要领导人同时出席了中共三大，共商全党大计，这在中共党史上还是第一次。作为党的创始人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均未出席一大，且须转移开会地点；李大钊、毛泽东没有出席二大。（2）中共三大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并由瞿秋白领唱《国际歌》。此后，在闭幕式上奏响《国际歌》的做法，为以后历届党代会和其他重要会议所沿用。（3）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中央领导机关的结构、职权分工、工作制度等方面的法规性文件。该“组织法”以党内单项法规的形式反映出早期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程序，都力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这标志着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走上了正轨。（4）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增加了“严守本党的一切秘密”的内容；在规范入党手续方面，第一次增加了候补期，规定“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5）三大通过的《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还首次明确规定：“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迫不得已在政界谋生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同时，我们党也开始注意到党员的思想意识改造和对党员的教育训练问题。

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争论^{*}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方面是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全

^{*} 陈峰、高敏：《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

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是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会上，党内同志围绕三个重大问题进行热烈讨论：

第一，关于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在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分歧，根源于争论双方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国民党性质的不同认识。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陈独秀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张国焘等则认为，“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会起革命作用，会去反对帝国主义者”。他还认为，“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所以“除国民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由于对国民党的认识不同，双方对国民党的态度存在着很大差距。马林、陈独秀指导思想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在他们看来，只要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不管是革命运动，还是劳动运动，都可以归国民党。蔡和森提出对国民党“不能过分相信，不能把工人无产阶级的一切工作都交给国民党”。

第二，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等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认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工作，应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张国焘则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担心全体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就会丧失党的独立。他们提出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和担任职工运动的中共党员，不必加入国民党，中共不能因加入国民党而牺牲自己组织的独立性。

第三，关于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这是大会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陈独秀等认为，保留产业工人就是减少国民革命的生命力，因而赞成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他还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而且非常幼稚，一共400多名党员，只能做经济斗争，党又不能公开，所以“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张国焘等反对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下，坚持中共领导职工运动的独立性。他们呼吁，不要把劳动运动从共产党的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至少应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开展工会工作”。

在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大会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

问题的议决案》。该《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就基本上结束了党内对加入国民党问题长达一年多的争论。

中共三大为什么要决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党的三大为什么要决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呢？这首先是和从“二七”惨案得出的血的教训分不开的。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开始后，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他调动了反动军警两万多人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在他的高压政策下，京汉铁路大罢工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但也确实表现出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斗争经验的不足。血的事实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工人斗争到一定程度必然遇到全副武装的反动军队的镇压，只靠罢工这一个武器，只靠无产阶级这一个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

其次，我们要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一番科学考察。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在几经挫折之后，当时并没有多少实力。但是，它有几个别的党派所无法比拟的优点。第一，这个党当时在中国还是有一定威信。因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民国。之后，孙中山为维护民国，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和外国侵略者以及本国封建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斗争。当时，在人们心中，孙中山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第二，这个党在南方已经建立了一块宝贵的革命根据地。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这个党在广东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拥有了一部分军事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在孙中山的政府控制的地区内允许各种革命力量公开活动，这是难得可贵的。第三，当时孙中山

* 陈峰、高敏：《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正在经历其一生中的最伟大的思想转变。从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一直站在民主主义革命立场，经过历次斗争失败后，迫使他不得不寻求新的道路。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对中国和其他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政策，以及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都给了孙中山以有力的影响，推动了他的转变。当时，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大抵我们革命，在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因此，他要整顿国民党，重新考虑用新的思想和政策武装这个党，以使革命获得胜利。这时，他从国际国内革命发展的新局面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要求苏俄帮助中国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要求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斗争。这种要求和希望，逐渐形成了“联俄”、“扶助农工”、“容共”（联共）的三大政策思想。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考虑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自然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历史证明，中共三大制定的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在这次大会的推动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很快形成。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不但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而且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低落的工人运动中走出来，在广阔的革命天地中锻炼自己。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后，两党就可以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从而为动员和组织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中共三大前后谁最早提出无产阶级 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

瞿秋白在1923年6月、9月和12月，就一再提出过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 陈峰、高敏：《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1923年上半年,《新青年》杂志曾进行了改组,由瞿秋白担任主编。6月15日正值我党的三大召开期间,《新青年》出版了改组后的第一期,并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在这篇《新宣言》中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尽管它的提法还不够精确,也并不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但是,它已经开始提出无产阶级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革命”中的“指导”权和“革命领袖的地位”。瞿秋白这时是《新青年》的主编,《新宣言》反映了瞿秋白的思想是无疑的。在这一期《新青年》中,瞿秋白写了一篇《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的文章。文章表明作者已经注意和认识到,在近代一切反抗旧制度的运动中,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重要性。

瞿秋白在党的三大上也提出过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与陈独秀等进行过争论。尽管至目前我们还未见到原始记载,但从瞿秋白在1927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长篇著作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在三大上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努力做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却是清清楚楚的。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瞿秋白在1923年9月撰写、12月发表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很明确地提出并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至社会主义领导权的思想。此外,还要附带说明一点,瞿秋白在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之后,特别是在他参与领导的五卅运动后,曾撰写了许多文章,非常明确和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他一方面明确地指出,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另一方面又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不是“天然”地和和平平地得来的,而是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争来的”,“夺来的”。他较清醒地看到,在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无产阶级只有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力量、明确和坚决自己的政治意识之后,才能领导一般平民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瞿秋白还把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共产党的领导等重要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得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

中共三大及其后的中央机关*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认真总结建党两年来的工作和“二七”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为加强党的建设，通过了修改后的党章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等决议，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不仅成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起点，而且确立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基本体制，在中共组织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革命形势发展，要求改进、加强中央领导机构

（一）中央领导成员少，个别领导成员犯有严重错误，需要改进中央领导机构。其一，张国焘搞小组织，严重影响党中央的团结统一。蔡和森在1926年的报告中指出，张国焘在二大及会后，以“左”的观点和简单粗暴态度“攻击同志”，“引起全国同志不满意”。张等“反对‘劳动组合书记部’与中央组织发生关系……”，8月中央西湖会议，严肃批评小组织“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明确指出“应当不是另外组织活动的分子，而要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推进全党进行，如这问题不解决必定会发生派别，所以小组织的组织是不对的”。“决议建立《向导》，即解散小组织。”其二，中央领导成员太少，经常不在一起，没有固定办事机关。陈独秀在三大报告中开头就说，“中央委员会的人太少了，不能收集很多材料。”“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个人。”后称“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委员经常不在一起。这样就使工作遭到了损失。”他又讲“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进机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猖獗的反动派，在京汉大罢工以后，就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改进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据李维汉称，1923年初抵北京向中央汇报，“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座。……中央还决定我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接替即将调至中央

* 王健英，《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5期。

工作的毛泽东工作。”说明在北京党中央确着手改进，充实中央机构。但“因为上海迫害得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还是不可能改进中央机构。”

（二）实行国共合作，要保持党的独立性，需加强中央领导。西湖中央全会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即加入了国民党。这一阶段，党中央对国共合作后如何保持党的独立性，存在不同主张。陈独秀赞成“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口号”，认为目前“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而蔡和森等则认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当时共产国际决议明确指出：“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因此，需要统一党内思想，加强充实中央领导机构。

（三）党的发展及现状，需要重视党的建设，加强中央领导。二大后的一年，全党党员由195人发展到420人。仅1923年上半年“入党的人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党领导掀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特别“二七”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扩大了中共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但是党的力量总体上说是相当弱的，与革命任务的艰巨性不相适应。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党内存在的问题：“我们在京汉线上有最好的组织，但是在罢工时瓦解了。”“郑州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瓦解了。”“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他尖锐指出，“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他对各地组织进行了讲评，“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最近才纠正过来。”“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党组织的这种现状，迫切需要改进、加强中央领导机构，以加强党的建设，适应全国革命新发展的需要。

二、三大重视并决定加强中央领导机关的建设

(一) 修改党章，增加中央领导成员，调整了领导分工。其一，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改为“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增多，既适应了全党党员增多和地方组织发展的工作需要，同时为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关提供了可能：既能为保持中央领导持续稳定保留原有的多数成员，又便于从地方选拔优秀干部充实中央领导集体。其二，将原规定“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修改为“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其重要变动是，原规定由委员长兼“会计”改为不兼，专设会计。这样使中央主要领导人减少了行政事务工作，便于集中精力抓全党人事，抓党务；原规定其余委员“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既过于空泛难以落实，又易引起把“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与“党务”脱解。改为“分掌职权”虽较笼统，但总是协助委员长抓“党务”各方面的工作，在《组织法》内作了明确规定。

(二) 制定出第一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确立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基本体制。根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一大“党纲”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纲领并说明“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细则另订”。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等。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织细则，仍未能制订。三大总结了建党两年来中央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出党历史上第一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内容共十条，分别对中执委员会的性质与职权，组织与分工，中央局职权与分工，会议的召开、主持、表决、准备，财政审查，召开临时大会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主要有：1、明确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议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管理各区各地方之行动，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并管理派遣

做青年、妇女、劳工、农民等工作之职员。”虽用“指导”一词，但职权却是“管理”全党“之行动”、“管理派遣”做各项工作的干部，实际是“领导”性质，即应是全党最高领导机关。2、规定“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鉴于二大后“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组织法》正式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固定的常设机构中央局，“以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务”，由全会从委员中选举五人组成，集中住于一地，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另外四名委员则派驻各地，代表中央指导该地党组织工作。这样，既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内有了稳定的组织，不因委员分散活动而影响中央的集中领导，又使中央局能通过驻各地委员及时了解实际情况，倾听党员意见，有利于中央局决策切合客观实际。从三大起，中央执行委员会内正式设立常设机构中央局，到五大时正式改称“中央政治局”，此后，一直成为党中央的重要组织，故实际是确立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基本体制。3、明确规定了中央局的职责。“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委员长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党章已规定“总理党务”，自然是委员长主要职责。“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显然，此秘书并非委员长秘书，而是协助委员长负责处理党中央、中央局的日常工作，是仅次于委员长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即主管除文秘外的中央和全党的行政、财政等事务工作。以上这种分工，较过去合理，使委员长摆脱大量文书、行政、财务事务性工作，能够集中精力抓全党人事；有专人同各地联络通信，负责起草中央文件，加强了全党经常性党务管理和组织宣传；有专人负责财政和行政，便于加强党的秘密工作的联系和行政管理。4、规定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集体领导的措施。如“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开全党大会“前至少两个月通知召集，附寄议事日程草案，并请地方于通知一月内交齐议案。各地议案互换”；中执委报告“须开会一月之前寄地方”。这

些规定，有利于具体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有益于密切党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便于中央决策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防止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三、三大改选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三大选举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强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应以工运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三大代表中有十几名工人代表，大会对工人运动，特别“二七”罢工讨论较多，因此第一次选出三名产业工人王荷波、朱少连、项英为中央执行委员，选出产业工人邓培、张濂光、徐梅坤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14名成员内，有6名工人出身，占42.8%，是党的历届中央领导成员中最高的。

（一）改选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据瞿秋白192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记载“第三届大会选举：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另据译自俄文似系三大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称，三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章龙、谭平山、毛泽东、王荷波（京浦铁路工人）、韩德龙（译音）（京汉铁路工人）、周沙良（译音）（萍乡煤矿工人）；候补委员：李汉俊、邓中夏、丁培（京奉铁路工人）、张良工（译音）（京汉铁路工人）：其中陈独秀是中央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是秘书。”两个名单所讲人物相同，仅几个人物姓名有出入。韩德龙应是项德隆，即项英原名；周沙良应是朱少连；丁培应是邓培；张连光、张良工应是张濂光。准确的名单应是，正式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候补委员：邓培、张濂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二）瞿秋白的名单应是准确可信的。其一，瞿秋白是三大会议参加者，并参与会议的文件准备和会议组织领导。他于6年后作报告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所谈史实均较准确。特别所谈当选名单与三大后写给国际的报告内名单一致。他对当选的正式委员全部标出当选票数，如无确凿根据，决不会那么写。其二，正式委员当选票数，同本人在全党的地位、影响，在代

表们中的声望，比较吻合。其三，三大与会代表决非30人以内，应是40余人。如大会后写给国际的报告称，“有表决权的十九人，有发言权的十余人。来宾和非正式代表十余人”。据徐梅坤等回忆称，分为正式代表与列席代表。依此理解“非正式代表”应是“列席代表”。这样正式与列席代表加起来，显然超过40人。投票选举时，似与会者均参加，故陈独秀以40票当选。（三大与会者名单另有专题考证）

（三）三大究竟是瞿秋白、向警予还是张濂光、李汉俊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是党史界长期说法不一的问题。称瞿秋白当选，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注释。称向警予当选，见刘昂《回忆敬爱的向警予同志》、《辞海》历史分册。笔者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初稿）内，曾倾向于认为瞿、向当选。但经过多方查核，未见可靠根据。依现有文献史料，特别是瞿秋白的中委名单，他明确肯定是张濂光、李汉俊当选，没有他与向警予，这应该是准确可信的。除已讲理由外，再补充说明几点。其一，李汉俊虽未与会，但当选亦合乎当时实际。他在1922年8月中央西湖会议上，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应算已补选为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他在武汉积极进行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事实上并未消沉。同年10月成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被推选任教育委员会主任，投身于武汉工人运动。1923年1月底，他随陈潭秋、项英等赴郑州，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尔后回到武汉参与组织二七大罢工。在反动军阀追捕下，潜往北京暂避，曾“与李大钊经常交谈”。积极参与策动鄂籍国会议员胡鄂公等弹劾吴佩孚镇压工运。他在武汉和工人代表中还是颇有影响的。其二，张濂光是江岸铁路工人，与林祥谦是福建同乡，是江岸工人俱乐部领导成员，分管财务。是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成员，当选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二七大罢工时，他是江岸地区斗争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工会特派代表”，同项英、李震瀛等几次同反动当局交涉，表现突出。“二七”惨案后，他负责济难委员会，主持对被害被捕工人家属救济工作。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擅离岗位投靠奉系军阀后，他似被推任委员长。他被选的可能性很大。其三，三大会上对二七罢工很重视，讨论较多。与会代表中过半数参加了二七大罢工。陈

谭秋作了“二七”惨案、孙云鹏作了二七被捕工人救济、张国焘作了铁路工会情况等报告。加上国际代表马林强调中央委员会组成，“应以工人运动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张濂光作为全国最大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的代表，李汉俊作为党创始人之一，武汉工运领导人，他们当选，应是符合当时实际工作需要的。

（四）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的组成与分工。三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会，除邓中夏、李汉俊外，其余成员均出席。张濂光似亦与会。会议选举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五人组成中央局，推选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中央局委员长，总理全党党务。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蔡和森分工仍然主编中央机关报《向导》。谭平山分工主持国共合作事宜。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成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机构。中央执行委员其余四人，分派各地。李大钊驻北京，王荷波驻上海，朱少连驻安源，项英驻武汉。他们代表中央指导地方党工作。自7月下旬至9月上旬，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和陈独秀等先后抵达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广州又迁回上海。中央局机关秘密地位于闸北区三曾里一座二层楼。毛泽东与杨开慧，蔡和森与向警予，以及罗章龙，对外以兄弟相称。这里成为中央局活动和同各地组织联络、办事的处所。9月10日，中央发出通告称：“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毛泽东因送杨开慧、毛岸青回长沙，并指导湘区委工作，后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1924年2月中旬返回上海，仍担任中央局秘书。

四、三大后中央机关的各部门

罗章龙回忆称毛泽东赴湘，“改由我任秘书兼主持宣传部工作”。《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称，“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各部门”。经考证，三大会后党中央并未立即设立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查历史文献，党中央正式设立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工农部，是1924年5月才决定的。三大以后中央机关的工作部门，主要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央铁路委员会，中央教



育宣传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向导》周刊、《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中国共产党党报》等。

（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说“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不存在了”。包惠僧称“1923年冬……就没有劳动组合书记部了”。罗章龙讲三大后中央工作部门，也没提有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些并不准确。据三大通过的《劳动运动议决案》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又称“劳动组合书记部今后之责任为组织天津、哈尔滨、山东、上海等处已组成之路矿等工会以外之工会”。三大后8月5日，中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代表中央在上海地方兼区委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劳委会与劳书部负责人应一致。”1924年5月以前的《上海地方报告》也称，“我们党在上海也算做过几次工人运动（书记部及上二届地方）”。以上历史文献记载充分证明，三大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未撤销，仍然存在。另查9月5日与18日报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写传单、发贺信纪念安源大罢工胜利一周年。邓中夏称“‘二七’失败后，我们已不常用书记部的名义去做职工运动，因为我们此时最注意的是去成立产业总工会，凡属某产业的职工运动即用产业总工会去做”。三大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应仍是邓中夏。有材料讲，三大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实际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新的对外名义。主任兼中共党团书记邓中夏，秘书李启汉（1924年10月13日出狱）。

根据考证，三大以后原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与工作，分成为三个部分：其一，仍然由邓中夏负总责。他住在上海闸北区宝山路宝山里总弄口西一座楼下。《劳动周刊》作为机关刊物继续出版。主编董锄甲。1923年底，由张秋人接替他工作。成员袁达时派赴安源，李震瀛、陈为人在东北哈尔滨和大连。其二，成员张国焘于8月底赴北京，主持成立中央铁路委员会，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主编《工人周刊》。成员吴汝铭参加。其三，成员王荷波、王振翼、林育南等参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组成劳动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荷波。根据毛泽东代表中央的提议，王荷波同时亦是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9月2日起，他接邓中夏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主要负责上海及江浙皖的劳动运动。1924年1月由李立三接替王荷波，任改称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副主任

先后有王振翼、甄南山、徐梅坤（徐患病由瞿秋白代理）。主要工作人员有林蒸（似系林育南）、许德良、陈其寿、刘拜农（刘伯伦）、刘华（刘剑华）等。

（二）中央铁路委员会。对外称“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三大《劳动运动议决案》称，“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应从速召集全国各路代表会议讨论各路统一之工作，改造筹备委员会及讨论救济‘二七’被难工友之方法”。这说明，三大以前“二七”惨案以后，已经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三大则决定把全国铁路工运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出，划归“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负责。另据1923年11月“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委会议《中央局报告》称，“中局直辖（辖）之劳动运动，惟路工，兹据铁委报告”；《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称，“由现在之铁路委员会派人分往各路接洽”，11月16日张国焘在通信中称，“我现在在北京工作……在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个委员会里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对外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三大后对内成立了中央直属的“铁路委员会”。中央决定由张国焘主持工作，任书记。“铁委”成员似有王荷波、邓培、张昆弟、吴汝铭、孙云鹏、郭恒祥、史文彬等。张国焘同妻子杨子烈住于北京腊库16号杏林学社内。“铁委”办事处（对外“筹委会”）住于北京后门铁匠营21号。工作人员有彭礼和（彭子均）、李斌（李风林）、杨子烈等。机关报《工人周刊》，主编先后吴汝铭、张国焘。1923年12月30日，该刊被迫停刊。1924年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了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推选孙云鹏为委员长，郭恒祥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总干事，担任中共党团书记。5月23日，张国焘、杨子烈和彭礼和、李斌遭北京反动当局逮捕入狱。此后，中央“铁委”结束，其工作统一归新成立的中央工农部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

（三）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对外用“社会科学会”的名义。三大后，10月15日中央局通知称，“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两中局兹组织教育宣传委员会，其组织法已印附寄。各区域地方应按该组织法，推定负责者一人为该会委员”。《组织法》规定：“教育宣传委员会由党及青年团两中央协定委派委员（十七人）组织之；其政治上的指导直隶于党中央，并对之负责”；该会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编辑部：设二主任：“教育宣传委员会”常会，由“两

中央各一人，五部主任各一人，但编辑部二人”参加，“当于此人中选一书记”。经考证，书记由中央局会计罗章龙兼。委员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林育南、高君宇、萧楚女等。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统管的党中央机关报和理论刊物有：“一、《新青年》季刊——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主编瞿秋白。在广州出版了4期后停刊。“二、《前锋》月刊——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主编瞿秋白。1923年7月1日在广州创刊，同年9月后迁至上海。共出3期，于1924年2月停刊。“三、《向导》周刊——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主编蔡和森，编辑高君宇。该刊在上海出版。“四、《党报》（不定期刊）——党内问题讨论及发表正式的决议案报告等之机关”，即《中国共产党党报》，主编陈独秀。1923年11月30日在上海创刊，共出了4期。

“中央出版委员会”，据罗章龙回忆讲，是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局会议决定，由党及青年团中央合组成。委员有罗章龙、徐白民、恽代英、顾作之、苏新甫等。“并指定张伯简、成伟、郭景仁等参加专门筹议有关出版事宜。……由徐白民任上海书店经理。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建立全国书报刊物发行网。”“决定自办国民印刷厂……胡（倪——笔者）忱天任经理。”

（四）中央妇女委员会。三大《妇女运动案》称，“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起见，应设立妇女委员会”，“应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据查，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向警予。委员有杨之华、陈比南（陈碧澜）、王一知、李一纯、刘清扬等。另三大后9月27日，向警予与沈雁冰被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指派为国民运动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1924年2月，向警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助理，主持妇女运动。4月1日《民国日报》报导：“决于女党员中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连日由妇女部职员向警予女士接洽……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由上海执行部妇女助理兼任。”即由向警予主持。《妇女周报》，向警予是主编之一。1923年8月22日在上海创刊，以“妇女问题研究会、妇女评论社”的名义出版，属于《民国日报》副刊，实际由中央妇女委员会主办。另有《妇女日报》1924年1月1日在天津创刊，是中共指导全国妇女运动的刊物。主编刘清扬，编辑李峙山、邓颖超。

(五) 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办、实际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培养革命人才的高等学校。校长于右任(国民党员)，代理校长邵力子，总务长邓中夏(邓安石)，社会科学系主任瞿秋白，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中学部主任侯绍裘。附设平民学校主任卜士奇。教员：蔡和森、李达、施存统、张太雷、沈雁冰、恽代英、安体诚、杨贤江、董亦湘、高语罕、萧楚女、田汉等，均是中共党员。1924年5月统计，上海大学共有党员16人。

瞿秋白与中共三大——读“马林档案”*

瞿秋白对于中共“三大”有重要的贡献。他负责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并就此草案向大会作报告，还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四大”情况的报告；他积极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为促成党的策略方针的历史性转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是史学界的共识。但是，有些论著在关于中共“三大”的阐述中把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归纳为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反对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全体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另一种是陈独秀、马林、瞿秋白等主张国共合作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笔者认为，把瞿秋白与陈独秀、马林的意见相等同是不符合史实的。这种概括可能受了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纲要)》中提法的影响。过去由于没有见到中共“三大”讨论的原始史料，也就难以直接确认瞿秋白在中共“三大”讨论中的具体意见。

“马林档案”的公布，为我们提供了瞿秋白在中共“三大”讨论中的具体史料，对于了解他在“三大”期间的思想有重要价值。本文拟就“马林档案”中马林对瞿秋白的评价、瞿秋白《致季诺维也夫信》和瞿秋白在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思想作一简析。

一、马林高度评价瞿秋白

马林是荷兰人，共产国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曾在荷兰殖民地爪哇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他在共产国际“二大”介绍了在爪哇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为大会所肯定，受到列宁的赞赏，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

* 叶孟魁，《常州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员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会后，经列宁提议，被共产国际委派为共产国际首任驻华代表。马林来华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他自己在爪哇的经验，在孙中山不同意国共“党外合作”的情况下，提出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终于实现了国共合作，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马林的历史功绩应予肯定。

马林来华工作两年多。瞿秋白 1923 年初才从苏俄回国工作，两人在工作中的联系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主要是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广州，中共“三大”前后联系密切。当时瞿秋白与马林、张太雷等同住在“春园”，共同为中共“三大”起草决议和从事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

“马林档案”中涉及瞿秋白的史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马林关于国民党改组的设想及干部人选；二是马林关于中共“三大”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会议笔记中瞿秋白的发言要点，计 16 条；三是马林致共产国际领导人信中对瞿秋白的评价。马林在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的信中，赞扬瞿秋白是“李大钊教授和他们最好的助手”，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写的《赤都心史》“获得陈独秀的极好评价”，他“的确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马林在致斯大林的副手勃罗伊多的信中进一步赞扬说：“瞿的表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显示出他是中国党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现时“唯一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并想以此给中国党奠定巩固基础的人。”马林肯定瞿秋白坚决贯彻共产国际决议，为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方针作出的重要贡献。马林看到他身患重病却不分昼夜地为党拼命工作，不仅为大会起草党纲等重要文件，积极参加大会讨论，还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和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的主编。前者创刊号于大会期间（1923 年 6 月 15 日）出版，后者创刊号于大会结束后的 7 月 1 日问世。在这两个刊物的创刊号上，瞿秋白共发表论文 9 篇、短文 3 篇以及《国际歌》译词、《赤潮曲》等。《新青年》季刊筹备期间，编辑部几乎是瞿秋白一个人搞起来的，不仅要组稿写稿，而且自任设计、校对等工作，封面图案均系他亲自设计。马林鉴于这些极为感人的情景，充满钦佩和惋惜的心情说：“瞿秋白在最近这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做的工作太多了！”现在他已精疲力竭，在一个较长

的时间内绝不能从事繁重的工作。可惜他的健康这么糟。在广州的德国医生为他做了检查，结论是他只能做一点翻译工作。

二、关于瞿秋白《致季诺维也夫信》

马林在中共“三大”闭幕时写给共产国际领导人信后附言：“瞿秋白同志写的有关中国形势的俄文信一并附上。”但是在马林档案中未见瞿信。笔者认为此信即收录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中的《致季诺维也夫信》，理由如下：（一）从写信时间看。瞿信是1923年6月21日即“三大”结束的次日写的。马林信的时间较瞿信早一日，即6月20日，系打字件。也就是说，“三大”结束的当天马林立即致函共产国际报告“三大”情况。俟次日瞿信写就后一并发出。（二）从信的内容看。瞿信中的观点与马林的“三大”讨论笔记中瞿秋白发言要点的内容基本一致。瞿信是以“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的身份用俄文写的，这与马林信后附言一致。（三）从瞿秋白与马林的关系看。“三大”前后他们联系相当密切，不仅同住“春园”，更主要的都在为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而努力，为起草“三大”文件共同合作，都反对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同时，马林对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奉献精神可谓十分钦佩，所以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致函共产国际并将瞿信一并寄上，说明他对瞿秋白的信任不同一般。张国焘说，瞿秋白与张太雷都是马林的助手。也可说明其间关系之密切。

从瞿秋白《致季诺维也夫信》的内容可知，他之所以在“三大”刚闭幕即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直接致函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还不能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势，希望能得到共产国际与苏联更多的指导与帮助。

三、关于瞿秋白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

中国“三大”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并确立以党内合作形式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问题。从“马林档案”中瞿秋白的发言纪要、瞿秋白《致季诺维也夫信》等文献中，可清晰了解瞿秋白关于党的这一重大策略方针的思想。



（一）关于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瞿秋白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一方面，“中国，作为‘国际殖民地’和整个充斥外国大工业商品的市场，不能独立和正常地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同时，“军阀财阀（官僚资本）勾结帝国主义，扰乱经济，为资产阶级的发展之直接障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严重阻碍中国社会之发展，迫切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瞿秋白指出，遭受剥削压迫痛苦最深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以“更革命的途径”和“更尖锐的方法”进行斗争。他在中共“三大”前夕所写《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首次将中国资本主义区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部分。指出前者与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后者具有两面性，其中“商业资产阶级没有自由”，经营的是外国货或为外国资本家提供原料，“依赖国际帝国主义”；而工业资产阶级还十分年轻，“谈不上同国际资本家竞争”。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力图摆脱其束缚，又具有妥协性，“他们有时接受帝国主义方面的‘帮助’，以威胁督军们，有时向督军们摇尾乞怜，请求他们站在‘政府’的立场维护民族工业的利益”，但是不能说，“中国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的要求，因为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会使他们有可能得到规模大得多的发展”。他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对抗力”，它“恨帝国主义”，所以“中国经济之反抗外国资本，必不可免”。基于上述，瞿秋白认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即反帝反封建，而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国民党“仍保持着自己的革命纲领”，因而国共合作与各革命阶级的联合，自然是客观的需要。

（二）关于通过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瞿秋白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力量，只有它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然而中国无产阶级还年青，人数少，“在目前的中国，仅仅靠如此薄弱的无产阶级，尤其是靠上几十名共产党员是无法完成民族革命的。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群众性的民族政

党”。现时中国唯一重大的政治集团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是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现实途径。

针对党内的思想状况，瞿秋白提出要以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尽管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只注重联合军阀”等弱点，但是它在孙中山领导下，吸引了不少革命分子一直坚持其革命纲领，在民众中“为自己争得了威望和人民的同情”，它是在不断地进步。因而应把它看作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一支力量而去争取团结它。瞿秋白强调指出：“不能忽视这个党，反对它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而让对它听之任之也就等于有意识地削弱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党正确的方针是：“担负起改组国民党的任务，以补充劳动人民成分，来扩充国民党，巩固它的革命立场，并以此加强共产党对它的影响。”他还强调，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而成为真革命的群众性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政党。这实质是强调在实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责任。

（三）关于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共产党的独立性

瞿秋白在论证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同时，还对在策略方针上的错误观点进行深刻分析与批评，既着重批评张国焘为代表的“左派共产党员”反对国共合作的错误观点，又强调坚持党的独立性，反对陈独秀忽视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思想，自觉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瞿秋白在致季诺维也夫信中指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谓“左派共产党员”反对国共合作的策略，看起来似乎很“革命”，其实“这些同志本身动摇得很厉害”，他们担心我们党和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溶化”，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担心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力量发展，认为帮助国民党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是不相容的，强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瞿秋白认为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他在“三大”发言中，首先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能把不同阶级“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的“坚强的群众性的民族政党”，所以我们应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使其发展成为这样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组织。



他说：“如果我们不引导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那怎么能希图国民党发展呢？”怎么能“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指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策略，要么“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他质问“哪种办法更好？”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不主动争取团结这支革命力量，就等于有意识地削弱民族革命运动。

其次，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就会发展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他指出：“不要害怕资产阶级的壮大，因为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在壮大。我们不能采取与他们分离的办法阻止他们的发展。”也不必担心国民党发展，因为“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瞿秋白的深刻分析所显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为国共合作之后的历史所证实。

再则，关于以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党是否会被“资产阶级民主溶化”的问题。瞿秋白认为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既正确地回答了张国焘、蔡和森等的担心，又提出了与陈独秀根本不同的正确指导思想。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保持共产党独立性的问题。

在中国“三大”，瞿秋白与陈独秀等力主国共合作，但陈独秀又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瞿秋白坚决不同意的。

首先，瞿秋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战略策略思想，指出：无产阶级要达到它的最后目的——共产主义的胜利，“只有通过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才能保证他们取得这一胜利”。因而无产阶级应当以自己为主体，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包罗一切革命派，导之向真革命，才能有实力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战。所以我们主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发展成为有明确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的革命政党，以推动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准备“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而不是在这个合作中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其次，瞿秋白认为要避免在与资产阶级联合中被“溶化”，或被“资产阶级民主溶化”，必须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早在1923年2月瞿秋白就提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他在为《新青年》创刊号（1923年6月15日出版）写的《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他强调，“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而陈独秀却在《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出版）的《本报露布》中声明，“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自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两相对比，泾渭分明。瞿秋白还认为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以避免在与资产阶级联合中被“溶化”。二是必须“在民族运动中组成强有力的劳动群众的左翼”，这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阶级基础。他在大会发言中明确提出，实现国共合作之后，要继续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我们不会放弃对工人进行的宣传，它同国民党的工作没有矛盾”。指出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不同于国民党开展的运动，不能把工人运动都归于国民党。在他起草的“三大”党纲草案中指出必须重视农民，无产阶级要“促醒农民，与之联合”，组成强有力的联盟，否则“革命不能成功”。瞿秋白在季诺维也夫信中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们能在民族运动中组成强有力的劳动群众的左翼，保持党的独立性，我们就不要害怕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溶化’”，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必然能在这一斗争中“变得更坚强、更自觉和更有战斗力”。

上述可见，瞿秋白在“三大”，虽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可能都认识清楚，如也赞同共产国际决议中关于中国工人阶级“还不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不正确的估量，对国情的了解还有待深入，但是他自觉地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既反对张国焘“左派共产党员”的错误观点，又反对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指导思想，对“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说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主要代表之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高度赞扬瞿秋白，称他为中国共产党“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已显示出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

中共三大以后莫斯科召回马林原因探讨^{*}

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党内合作。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林的主张终于在中共党内以文件的形式得到肯定和落实。但是怎样将文件的原则精神在具体实践中操作和运用，则有一大段的路程要走。本来马林是想接着走下去的，谁知莫斯科中途走马换将，致使马林带着遗憾离开中国。本文根据有关资料，试图对莫斯科作出这一人事安排的原因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和作者。

一、马林失宠于莫斯科

马林在中国制定的斯内夫利特战略，从提出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形成正式文件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虽然他的主张为苏俄在中国打开外交僵局提供了重要的新思维，但在共产国际有维经斯基等人的不同看法，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先是陈独秀的不理解，后是张国焘和蔡和森的激烈反对。在这个过程中，马林逐渐失去了莫斯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从1923年3月到8月间，马林从中国写出和收到的一些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1923年3月27日，维经斯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写信给马林说：“收越飞电报一则，他坚持让你留在中国，并要求寄钱给你。我尚未回电，因不明了该电报来由。我从未对越飞说你不应留在中国，也从未说将不给你寄钱。”但是从同一天维经斯基给莫斯科的萨法罗夫（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电报中可以看出，马林是否继续留中国似乎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间有过讨论。电文如下：“建议在党代会和工会代表大会（指中共三大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引者注）结

^{*} 张秋实，《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

束前让马林留在中国。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我们判断，马林正在失去共产国际昔日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1923年5月31日，马林在广州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更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说：“亲爱的布哈林同志：3月21日曾致函与你谈我的私事和困难，至今未见回信。我不得不下决心。无论如何必须让我的妻子启程到俄国去，因为从她的情况看，再晚些时候就不宜长途跋涉了。”这表明马林在生活上明显地存在着不太容易克服的困难。他在3月份给布哈林写了一封信，希望急于得到答复，但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布哈林一直没有给予回答，显然是不便于或不愿意回答。

马林在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继续写道：“张国焘同志由莫斯科返回，我从他那里得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对我们的人同国民党联系这件事，还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于1月份通过的提纲（指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引者注），他们在那里仍然那样解释，我简直不明白究竟怎样才能认真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就在同时，政治局（指俄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决定给国民党的支持，要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所能给予的支持大许多倍。”显然，马林在抱怨共产国际不支持他的工作。换句话说，也就是马林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应有的支持。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马林告诉布哈林：“党的中央委员会已到广州。那是中央委员会可以合法存在的唯一城市，可以在那里举行会议。会议将于6月10日开幕，会后，也就是7月初我将考虑踏上归途。”

马林之所以说他将于中共三大召开后回国，是因为共产国际已于1923年1月对他的任命有所改变，在此以前，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而此后则是共产国际海参崴局的第三名委员，参加中共三大的国际代表之一，其他的任命都被撤消。既然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而只是共产国际海参崴局委员、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之一，那么，中共三大闭幕后，他自然应考虑踏上归途。但实际上，马林还是很想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以



便从现实层面全面启动他的斯内夫利特战略实施工程。因此他在 5 月 31 日给布哈林的这封信中谈到：“孙现在已经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这里专门致力于帮助国民党的改组 and 开展一个强大的反帝宣传运动，那会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我认为，只有我还象以前那样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留在这里，才能做到这一点。孙要我参加国民党，直接代他从事党的改组工作。当然我的生活问题这样可以得到解决，可是如果没有取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如果我不能仍然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即不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付工资），我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接着又写道：“对我来说，我个人的一切困难问题，尤其是我的经济困难问题，都将因我接受孙的建议而得到解决。但是，在收到你的信，了解你的意见之前，我不会作出最后决定。这个意见对我至关重要。如果我加入了国民党，参与改组工作（我已经替孙拟定了一个计划），我愿意同时也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的代表，那么我可以无偿地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并能照旧完成我现在的工作。”但是，马林的这封渴望布哈林给他“至关重要意见”的信又没有得到回答。6 月 20 日马林在广州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时说：“自从 5 月 31 日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无音讯。”

可见马林确实遭到了莫斯科的冷遇，已经失宠于莫斯科。以下信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

1923 年 6 月 20 日，也就是中共三大闭幕的这一天，马林在广州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写了一封信，并嘱咐将信的复印件交萨法罗夫亲启。在谈了一些中国的形势和三大的有关情况后，马林写道：“现在我来谈谈这封信的最后一点。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内，如果有中国同志在场，谈话时在一定程度上要谨慎。一位同志（我指的是张国焘）回来后，特别在那里的同志们中间引出了‘这样一些论点’，例如，在中国问题上拉狄克和萨法罗夫是左派，布哈林是中派，越飞和马林是右派。这样的情况本不该发生。”但是，“这样的情况”却发生了，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左中右三派的说法在会议上流传。它无疑增加了张国焘等人在三大上反对马林的心理砝码，给马林指导召开中共三大工作带来了困

难。所以马林有些气愤地写道：“张国焘从莫斯科回来后，本可以十分秘密地告诉北京少数几位同志说，因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不满意马林的工作，将发电报来把他从中国召回，但东方部同这样一些年青同志的谈话却缺少这些东西。”

1923年7月18日，马林在广州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在谈了一些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情况后，于信的末尾写道：“与孙中山的联系现在通过俄国驻上海办事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绝对没有必要把我留在这里处理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外交联系。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可根据我送去的情报决定是否需要派人前来。但是，无论如何，请回答我本月发出的电报，况且，不该让我总这样滞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电报，你们还是照老样办事：只寄新闻简报，而不给我一分一文生活费用。给我新闻简报表明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即使一个老共产党员，也需要钱维持生活。”

马林在1922年8月第二次来华时，一方面他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说服中共实行国共合作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作为苏俄外交官越飞（继任者达夫谦）的助手来到中国，帮助苏俄出使中国的全权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建立联系。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马林的任务都完成得不错。但是，我们从上面几封信可以看出，到1923年春夏期间，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俄外交人员委员会，对马林似乎都缺乏热情。这使马林感到不解、痛苦和无奈。

二、莫斯科召回马林的原因探讨

加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方针的贯彻落实从现实层面即将全面启动之时，作为国共合作的首倡者马林本应继续留在中国，但是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马林被召回了莫斯科，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使命。

第一，马林在制定和落实“斯内夫利特战略”的过程中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人存在着争论和分歧。

1922年马林刚提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时，中共中央委员会的5个委员一致表示反对，1922年4月6日和30日，陈独秀两次



写信给维经斯基，陈述反对理由，表明不同意马林的主张。西湖会议也因思想分歧较大而发生激烈的争论。到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张国焘和蔡和森对马林的主张更是激烈反对，特别是张国焘自莫斯科回来，知道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实施斯内夫利特战略有不同意见后，更增加了反对马林的心理筹码。虽然最后大家接受了马林的意见，但心理上总是有些想法。由于马林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的背后站着一个巨大的共产国际，中共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即使有什么不同意见也只能自己消化。但是，这样一来马林与中共党人之间的关系就难以和谐相处，在推行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增加他与中共领导人合作的困难。也许莫斯科中途走马换将有这样一种考虑。

第二，在对张作霖的评价和中东铁路权益的归属问题上，马林同苏俄领导人存在着不同看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东北三省主要是日、俄的势力范围。1897年至1903年，沙俄为了扩大对华侵略，在东三省修筑了一条东清铁路。该路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西到满洲里，两端连接西伯利亚铁路，向南经长春直达沙俄侵占的大连和军港旅顺口。日俄战争以后，长春以南的一段被日本占领，称“南满铁路”。这样贯穿东北三省的东清铁路以长春为界，以南归日本管理；以北归旧俄管理。也就是说，长春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铁路权益交换站。辛亥革命后，东清铁路改称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局设在哈尔滨。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指出，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放弃沙皇从中国攫取的满州和其他地区；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等。这其中当然包括中东铁路的权益。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慑于苏联红军强大攻势而败退至东北三省的白俄分子得到张作霖的保护以后，关于中东铁路的权益问题便成为苏俄与北京政府谈判过程中一个绕不开的礁石。苏俄关于中东铁路的谈判方案是，主权归中国，管理为中苏混合管理。

1921年12月7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给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代表、使团团团长派克斯的电报中说：“我们讲中国管理，让中国全面管理铁路，条件是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这种管理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保障。所以这里讲的只是在法律上承认中国管理情况下的混合管理。”当然，中国政府不接受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1923年1月间，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达夫谦（越飞的继任者）派马林“到奉天拜访张作霖将军，讨论中东铁路问题以及他与东北地区白俄的关系”。马林带着孙中山（因孙与张关系较好——引者注）的介绍信，以柏林《国际新闻通讯》记者身份前往。这次奉天之行使马林在中东铁路问题和对张作霖本人的一些看法上与苏俄领导人发生了分歧。俄共（布）、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一直把张作霖当作是仅次于日本人的最危险的敌人，有的人如维经斯基更把张作霖看成是日本人的走狗。而马林经过调查和观察则认为，张作霖在东北推行的是自己的中国政策，只不过在涉及日本人的问题上很谨慎，因而把他看成是日本人的工具或走狗是完全错误的；张作霖不仅很精明，而且有容纳贤达、剔除庸碌之辈的本领，他在东北的地位很稳固，他的奉天省绝对是中国所有省份中最有秩序的省份；谈到中东铁路情况，张作霖认为情况十分复杂，不仅俄亚银行，还有列强也在插手，是件十分棘手的事，他愿意同俄国政府的代表就这个问题在奉天展开讨论；张作霖表示，对俄国仍然认为他支持东北的白俄从事反俄运动一事无法解释，他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不能容忍俄国人在他的辖地进行活动，对俄国难民救济费每个月要花掉15000元。但是他听说，如果把这些人赶回俄国，他们就会被枪毙，因此，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他反对把他们驱逐到俄国境内。他表示很想同新俄友好相处。奉天之行使马林得出了与俄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说：“总的说来，张作霖给我的印象并不比民主主义者吴佩孚给我的印象差。尽管吴佩孚发表许多漂亮的宣言，又给俄国同志写信，但他近几日却用最残暴的手段来镇压他自己挑起的一次铁路工人罢工。”

另外，在中东铁路的权益归属问题上，马林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东铁路权益应当归属中国，不应该由中俄共管。在他看来，中俄共管会给人不好的印象。这同马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苏俄对殖民地和半殖



民地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毫不含糊，在民族问题上友好，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即使在外表上，也绝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国家有丝毫相似之处。因此，他认为苏俄在自己的政策中，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者，揭露他们的欺骗行径，而且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苏俄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他强调，俄国的政策才是表明革命的俄国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区别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显然，马林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包括对中东铁路权益问题的看法）与苏共及其领导人确立的总的对华政策存在着分歧。因为苏共（布）领导人（由于列宁病重，这个时候主要负责人是斯大林）固执地坚持苏俄在中东铁路的利益，这使马林失去了苏共领导人的信任。

第三，中共三大以后，在推动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全面实施国共合作战略方面，马林力不从心，收效甚微。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虽然成功地制定了国共合作战略以反对北京政府，但是，马林在中国的成功主要仅在于制定战略，而从实施这一战略来看，他的成就甚微。主要有列原因：一是自从1923年1月《孙越宣言》发表以后苏联政府没有得力的外交使者在中国从事外交活动，马林承担了苏俄政府外交官的部分任务。越飞在宣言发表后不久，先是生病，接着去了日本，他的继任者达夫谦外交才能并不突出，因此，马林有不少时候承担着苏俄政府外交人员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无疑要分散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实行国共合作战略方面的精力。张国焘回忆说：“他（指马林——引者注）不仅促成了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这一件事，更奔走于孙中山先生与越飞之间，后来孙、越的见面主要也是由他促成的。我们只看见他时而北京，时而上海，跑个不停。我们还曾讥笑他，不免放弃了共产国际给予他与中共联系的任务，专做上层政治活动。事实上，当时他对于中共日常工作的注意力，确也渐渐减少。”但是马林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看不出，我的工作由于与越飞的共事而受到了损失。相反，在越飞来之前，我一度想遵循与外交人民委员会不往来的这种方针。起初在12月21日戈尔特（荷兰共产党员，最初曾支持共产国际的建立并为之做出贡献，但很快就持极左立场，不断批评俄国人对共产国际的控制——引者注）告诉我，俄国把[共产]国际作为政治工具从而损害了革命时，

我曾回答说共产国际应保证苏俄的存在。在西欧，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方针是不同的，在那里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关系。在日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会之间那种比较密切的关系，目前也完全适用于中国。”

马林认为他致力于苏俄政府与孙中山南方政府的外交活动，同样也是在履行共产国际代表的职责，但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对此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二是由于中共对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的战略有不同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对他的力量，因此，马林在制定斯内夫利特战略过程中，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工作方面。他先是做李大钊、陈独秀的工作，说服他们接受他的观点，然后再与他们一起在党内做工作，说服同志们接受他的主张。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刚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瞿秋白的大力支持，因而成功地说服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党内合作。马林因此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这必然要影响其他方面的工作。三是马林在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方面缺乏成效。孙中山只对苏俄的援助和军事战争感兴趣，对改组国民党的积极性则不高。他拒绝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马林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当时孙中山在全神贯注地研究他“能不能征服陈炯明并保住地盘”这个问题，因此总是把马林提出的改组和宣传国民党的问题置于一边。马林给越飞和达夫谦写信说：“后来我向孙谈了改组国民党和政治宣传的必要性问题。这次的回答是：在解决广东问题之后，我们就能着手进行。我建议他尽快派代表到莫斯科，他未置可否。相反，他声明，现在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显然，他最感兴趣的是这一点。”在稍后的一封信中，马林不无悲观地写道：“现在，我对他（指孙中山——引者注）毫无办法。你们随时可以通过上海找到他。我们中央委员会感到，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健忘的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看来，马林有些无能为力了。正如陈独秀所言，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马林因此垂头丧气地回到莫斯科。在马林提出“斯内夫利特战略”的初衷里，共

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改造国民党，要改造就有批评，因此马林一直坚持共产党员有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但是，孙中山不喜欢这种批评，马林则无可奈何。马林的这种无奈状况是当时苏联不愿意向他提供资金和武器装备去做国民党的工作造成的。

总之，由于当时苏联对华政策的最高利益是维护苏联的民族利益，因此，马林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立场观点与苏联最高当局追求的目标相悖时，莫斯科已经不再信任他，并决定派另一个人带着足够的孙中山急需的资金和武器装备来华，使孙中山的国民党和中共听话，迅速改组国民党成为一个“全国性政党”，全面实施“斯内夫利特战略”。这个人就是鲍罗廷。

1935年8月，马林就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伊罗生谈话时说：“在我知道越飞要离开、加拉罕和鲍罗廷到来之前，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1918—1934年，塔斯社的前身——引者注）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时，我就离开了。在哈尔滨遇到了正来华的鲍罗廷。”

准备返回苏俄的马林与秘密潜入中国的鲍罗廷，1923年8月意外地在哈尔滨相遇，这个历史的巧合便成为莫斯科高层决策马走鲍来的历史性“交替”的标志。



党史细节

- ⑤ 斯内夫利特笔记：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
- ⑤ 斯内夫利特笔记：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 ⑤ 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 ⑤ 党的三大
- ⑤ 第三次代表大会
- ⑤ 瞿秋白三大中央委员问题的质疑
- ⑤ 罗章龙谈“三大”会计
- ⑤ 党的“三大”不存在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 ⑤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
- ⑤ 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

斯内夫利特笔记：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

（1923年6月12日—20日）

I. 我想了解中国同志的想法，便向瞿秋白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告诉我，我应该怎样阐述共产国际提纲中的观点和我在会上对提纲的解释？我是否需要对中国形势做一番分析并将其与其他东方国家加以对比？”他回答道：“不用这个办法。必须很具体。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

尽管我不拟做什么深入的理论分析，而且也会尽可能注意那些较细微的论据，但我不能完全依从这个建议。

II. 首先我表示强烈反对说什么陈独秀或我想解散我们的党这样一种观点。会上没有明说，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观点已经显现出来了。我在这里充当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我懂得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守的纪律，我从未想要搞垮中国共产党。我为什么要在中国工作？我以为若相信我打算搞垮党，那简直是愚蠢的。

另一方面，崇拜国民党——是绝对错误的。

III. 我要严肃警告那种把同志们划分为左派和右派的做法。这是张国焘在讲话的最后做出的，而且尽管很容易划定张三左李四右，我还要说明一个实情，即在一个年青的组织里很少有同志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他认为张三左李四右。

IV. 陈独秀发言之后，在整个这次讨论过程中有些东西不对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本应是讨论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国际运动的总参谋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的指示应是党必须遵循的命令，而张国焘和蔡（和森）在讨论时的发言证明他们把这些指示忘得一干二净，反倒设法去寻找开展党的工作的可能性。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张国焘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让那些已参加国民党的人留在国民党内
的命令所做的解释是绝对错误的。然而，我们还记得，上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就已经命令共产党员（不仅是南方的党员）加入国民党，今年1月指示中
“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这句话又肯定了8月的指示，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了它的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
不可能发生下述情况：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既然已决定接受上年8月的指示，
现在又竭尽全力去让全党都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总指示均属无效。而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不可能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不可能认为他们一面在北京
帮助建立一个新的国民党组织，同时又建议，既然北方没有国民党支部，我们
的党员同志就不必去努力发展支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料想，甚至在中国共
产党内也有某种纪律，它不会模棱两可地为中国制定决议，而使这样或那样足
智多谋的发明者得以炮制论据，让消极抵制及破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的
行为得逞。

V.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纲中的第二条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
所以国民党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应当协调起来。蔡和森与张国焘的发言
中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一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指出“工人阶级尚
未分化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可是和森却反其道而行之，设想建立一
个独立的工人党。我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不同意和
森的幻想主义。

VI. 这届党代表大会的任务只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为基础勾勒党
明年的策略。我们应努力予以回答的问题，并不是应否加入国民党，我们的党
员是应通过加入这个国民党去完成共产党的任务抑或是应将我党人力集中起来
去为尚未分化成完全独立的力量的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工人党。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的两个决议解决的并不是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像张国焘在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内以及他与国际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多次讨论之后所说的那
样——执行既定指示。

VII. 我们面临的是一些很具体而实际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在国民党内工作。
我们应该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说服同志们接受同样

的作法？我们应当怎样把本来就不大的力量分开去做工会工作和政治工作？我们怎样才能使大家相信，我党领导人的教育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

VIII. 在对这些实际问题谈出自己的想法之前，我必须对张国焘与和森的讲话另做几点说明。我依据的是我得到的译文，所以要有言在先，我的回答中可能会有错误。

和森极力坚持关于工人党的思想，他力图证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没有价值。和森只见到昨天，甚至只看到今天，但看不到明天。他的思维方法是静止的而不是能动的。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部分地是从封建分子、官僚和军阀发展而来，虽然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与外国资本家经常有密切联系，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民族利益与外国资本家是对立的。在国内政治中，商会的要求是完全革命的要求。他们希望消灭辛亥革命未予摧毁的封建政权。废除督军制和建立立宪制的愿望都已经表现出来了。他们企图用妥协的办法达到实施这些要求的目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要求是革命的，而且马克思很早以前就指出“民主、共和国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把劳工运动的革命力量集聚起来的最好的政权形式”。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不能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没有价值。和森同志不能辩证地分析形势，他错误的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他打算建立一个独立工人党，以为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应该懂得，工人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是有依附关系的。

IX. 张国焘认为我们现在只能做反日运动而不能做反英运动，这种说法是令人惊奇的。我们不难理解，国民运动本身表明它就是一场反日运动。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日本产品的竞争要比与其他国家工业的竞争激烈得多。日本帝国主义的方法更加露骨而且更加严重地伤害中国的民族感情。但是在英国人败北之前，中国的国民运动只能是反日运动这一点对我是很新鲜的。一旦中国的工业进入产品竞争领域，中国人就会发现英国人是对手，便要像现在反日一样采取反英立场。我们应该指出下述事实：提高税率的要求是针对各外国资本家的。法国要求作金法郎支付庚款与上海英国巡捕虐待童仆唤起了与现在的反日情绪相同的反对英法的反帝感情。

事实上，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太肤浅太片面，它把英帝国主义的罪恶忘得一

干二净，这并不意味着不管宣传多么得力，都不能传播对帝国主义的清醒认识，不能导致全面的反帝运动。

X. 和森和张国焘两人将把我党的策略建立在幻梦的基础上。

列宁的重大作用乃在于他密切结合俄国实际，在于他善于运用革命策略。拉狄克论述过这一点。

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中的列宁与反对派；

马克思论革命者的任务。

XI. 夸大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成绩是可笑的。我们接触到的工人状况怎样呢？我很惋惜，我与他们接触不太多。我只是调查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接触工人较多的那些同志的想法。我要说明一个事实即毛（泽东）、王（荷波）、邓培和王用章同志所提供的情况有一个共同点：工人们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较肤浅。

目光敏锐的王觉察浦口工人中有拥护君主制度的倾向，工人内部至今仍认为政治不是他们的事。王又说香港工人在中国属最先进者，他们的政治感情是民族主义的。

毛对我解释说，最高利益当是日常生活问题，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

我从邓培和王用章谈的情况里也得出同样的印象。

即令湖北有了成绩，我们也不能忘乎所以，我们是怎样组织铁路工会的？联络部指定的能真正胜任组织工作的是些什么样的同志？我们为什么不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而打着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到工人当中去？

几万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天津工作的成绩又怎样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取得了经验，能进一步开展工会工作，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人党的想法与工会混淆起来而犯错误。

张国焘向往工人掌权，他愿意同千百万人一道工作。毛同志告诉我，湖南有3000万人和3万—4万现代工人。他对工会组织已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甚至认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

这140万工人分布情况怎样？纺织业和烟草业有多少女工和童工？这些工业部门的生产有哪些是外国列强所控制（这意味着工人中的民族感情会自



然发展)？

这些现代工人的政治利益应居于国民运动中一切利益的首位。

XII. 我们办了一份小的周报，试图靠它去培养国民运动的革命性，现在也仅只几个月的时间。一旦我们认真把这个任务抓起来，那就一定会有成绩。我不像毛那样悲观，认为中国国民运动唯有在发生世界革命之后才能成功。无论如何我们不该推测哪一个首先发生，但不管怎样我们应像现在这样去实干。

XIII. 工会的发展是可能的。真正的工会联合会取代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时期很快就要到来。我们在这些工会里继续工作以发扬革命精神并对来自各方面的改良主义倾向持反对的立场。

我们的工会工作也处于困境。第一次发动之后，许多起罢工迭遭失败。基督教青年会不断地在工人中制造改良主义倾向。

我们将与之斗争，同时向工人证明，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方能发展自己的势力。

这种革命斗争在目前时期将主要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

XIV. 现在既然已有了提纲，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我们要把国民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发展工会和发扬革命精神，这对于完成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有帮助的——这些都没有疑问。问题是怎样在国民党内工作？

陈独秀的提纲中做出了回答。反对国民党的纯军事活动，反对它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封建代理人的勾结。持这样的立场我们就能推进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我们促使国民党把国民运动领导起来。一些同志想稳操胜券，某些十分谨慎的人则要等待国民党变好了我们才给予帮助。这些同志从而放弃了完成我们首要任务的可能性。革命者既不能采取这样的做法，也绝不能据推测做出决定。

XV. 听说有人担心我们让工人加入国民党就扼杀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是因为考虑到可用这种策略最有效地增加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加入的。国焘说，我们的精神力量很强大，因此，我不怕跨党的中国共产党员接触其他的倾向。既然共产党人可以跨党，为什么工人、商人就该在国民党之外呢。我相信我们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凭这个策略我们能取胜。当我们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翼时，我们应该考虑后果，但是我们不必如此缩手缩脚，担心这会妨碍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的政党。

XVI. 各次讨论证明我们自己的组织里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我们出版自己的宣传材料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有三重任务：靠教育工作加强我党党员的精神力量；靠我们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进行强有力的工作去发展工会；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一点，就是靠我们坚决支持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国民党这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得以发展，——这样我们就把全中国的力量动员起来，它们将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中做出重要贡献。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动员农民，做这项工作时，我们保持我们共产党人的名义。即使考虑变换名义那也并不是机会主义性质的。以我们的名义可以去完成我们应完成的任务。一些同志急于取消共产党以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工人党”或如他们梦幻中的工农党，这些同志说，能集中全力做国民运动的并非只有一个政党。我们也这样想，而且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国民革命的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才将存在并发展下去。

XVII. 必须使陈的提纲获多数票。提纲的特点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是绝对一致的。作为一个有严明纪律的集中组织，共产党有责任向共产国际表示，党凭其精神力量能够发展起一场有强大的国民党参加的气势磅礴的国民运动。

斯内夫利特笔记：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1923年6月12日—20日）

—

瞿（秋白）：

- 一、虽然资本家来自封建阶级，但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
- 二、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
- 三、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尽相同，可分两种。
- 四、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们将会革命。

五、只有国民党能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

六、不要害怕资产阶级的壮大，因为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在壮大。我们不能采取与他们分离的办法阻止他们的发展。

七、任何事情都在发展；我们不能证明国民党不再发展。国民党从一个没有纲领的政党成长为一个有纲领的政党，现在已接近于一支真正的社会力量。虽然危险，却是正确的通路。它已觉察到工人的力量。

八、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

九、我们已经阐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如果我们不引导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那怎么能希图国民党发展呢。

十、如果我们等国民党发展以后再参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

十一、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十二、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

十三、在建立国民党支部时，我们不要去抓取组织权和指导权，这是在助长老国民党的办法得以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将改变其策略的组织。

十四、工会运动不同于国民党开展的运动，工会从事的国民运动是利而无害的，他们可以宣传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这我们的纲领是一致的。

十五、我们不会放弃对工人进行的宣传，它同国民党的工作没有矛盾，可以继续下去。

十六、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

广州，邓（中夏）：

一、如果我们不在北方发展国民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呢？

二、我们的重要问题是应否让国民党得到发展。

三、国民党是一个内部利益迥异的政党，很难改造。

四、让孙中山听取新党员的意见十分困难。

五、国民党改组形势日趋好转，因孙中山和其他人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改革。

六、批评国民党热衷于搞军事行动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不加防卫而让沈鸿英得逞。

七、批评国民党轻视群众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党内有群众。

八、没有人反对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但我们不是为国民党工作，以后我们应改变合作的政策。

九、建议劳动组合书记部承担我们的工会工作。

毛（泽东）：

一、国民党是否就不能发展——这是个问题。

二、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

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

四、希望在中国实现国际合作，出现一个和平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将非常迅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大量增加。

五、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他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

六、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七、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分。……

唐山，邓培：

他同意陈的观点。



李（大钊）：

- 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
- 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 三、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

林（育南）：

- 一、我们讨论中的分歧点在于工会工作和党。
- 二、资产阶级不可能是革命的因素，无产阶级必须领导。
- 三、工会运动令人乐观。
- 四、两党共存时，不要怕分裂。他们能够为同一目标合作。
- 五、国民党重要人物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可以合作。
- 六、我们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站在他们一边，不能对他们的改组抱有希望。他们不会听取我们的意见。
- 七、反对工会运动。
- 八、我们必须由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或是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运动，因为单纯由一个阶级组成的政党是一个强大的政党。
- 九、如果国民党失败，应为成立一个新政党打好基础。
- 十、必须让群众知道我们党的存在。
- 十一、不加入国民党我们也能帮助做国民运动。
- 十二、如果我们在北方对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倾向）让步，我们便向北方工人介绍社会民主党。
- 十三、我们应该揭露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倾向，有必要成立一个工农党，因为不能用我们共产党人的名义。
- 十四、反对替国民党介绍党员。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党保存力量。
- 十五、他同意加入国民党。因为在南方加入国民党可使我们得以开展工作。
- 十六、他介绍了共产国际二大和四大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

二

一、中国目前的任何革命运动都必将是一场国民运动。

二、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都具有国际性。

三、国民运动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国民党，不赞成这种必要性的人会陷入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错误。

四、可以向党外而决不应向党内宣传中国工人力量的强大，在党内宣传会使我们产生错觉。

五、是我们的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是我们的党加入国民党。

六、无论是国民运动或工人运动，都需要联合行动。

七、我们不应因怕加入国民党有危险，而留在党外，这不是革命的工作方法。

八、因为我们要发展国民党，所以我们加入国民党；如果我们现在不为国民党工作，加入国民党就毫无价值。

九、工会不同于党，但我们可以把二者统一起来看。

十、我们一方面有责任发展国民运动，另一方面也有责任建立工会。

十一、我们不是同国民党争党员，我们只是吸收有阶级斗争觉悟的工人。

广东支部：

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

长辛店：

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

北京：

在北方我们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蔡（和森）：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1. 与国民党联合，组成统一战线。
2. 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

指责陈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认为这是违反上述决定的。

中国有4种力量：

1. 军阀（排除在革命军之外）。
2. 大资产阶级——商会。
3. 小资产阶级，要打倒军阀，也想要和平。
4. 工人——可从他们去年的行动如唐山罢工和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来了解他们。

大资产阶级由军阀和官僚组成，因此不反对军阀。

上海实业界求助于军阀，他们的财政资本依赖于军阀政府。他们的政治要求是废除督军，裁军，宪法，清理国家财政。这些要求在性质上并不是革命的。他们要求政府和军阀作出让步。例如俄国1905年后大资产阶级能和军阀妥协，中国大银行的资本是国际资本。中国资本和国际资本合作的可能性大于他们之间冲突的程度。国际资本将对中国资本让步，例如华盛顿会议期间英美资本家对于提高中国关税问题的态度。

上海商界对严刑拷问和临城事件的态度。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二者要联合起来。

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不能说除国民党外，没有其它的民族主义政党。当然国民党是民族主义政党。孙中山不仅倾向于向军阀妥协，而且也向帝国主义妥协。

国民会议比国民党更具有国民革命性。

如果目前中国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那么工人就不需要独立的政党。

例如在爱尔兰，民族精神太强烈以至不能组织工人运动。

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不是破坏国民运动，而是促进这个运动。

没有证据说明在国民运动中不能有两个政党存在。

大部分工人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

陈独秀的回答：

1. 关于反革命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的一切情况都是确实的，但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他的结论应该是，我们要为民族革命而工作。

2.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正如蔡所说，是革命的。

但是他却不想建一个能容纳广大农民……和实业家等人的政党。

3. 国民运动非常高涨时，我们才能加入国民党，这是机会主义思想，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

4. 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它途径。

5. 当谈到国民党的缺点时，他犯了和过去广州同志犯的一样的错误。重建国民党是我们的职责。

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不是联合战线问题，而是在国民党内工作。

7. 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而不是如蔡所说等国民党情况好转时，我们再加入。

张国焘：

如果国民运动允许无产阶级存在，我们可以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参加国民运动。

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在中国开展国民运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英美资本的影响使中国资本家不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我们现在只能发动反日运动，不可能发动反英美的运动。建立一个反对日本的政党是可能的，反日运动对我们无产阶级有利。

将来，只有当英美帝国主义败北，中国反对英美的国民运动才可望掀起。

国民党不可能同英美斗争，即使得不到英美援助，也是如此。如果国民党开展反日运动，他们就能得到英美的支持，但将失去同盟者张作霖和段祺瑞。

如果国民党反对英国，它就将成为一个非法组织，这是国民党不能接受的。

虽然中国反军阀的气氛非常强烈，但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在此基础上开展一场革命是不可能的。只能有一场妥协的革命，它将得到某些军阀的支持，与印度和土耳其不同。

如果国民党成为一个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的政党，它将会成为一个非法的政党，这样，就很难有机会发展。

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能迫使它就范。



如陈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我们有 140 万产业工人。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党在北方工人中占有主导地位。农民至少有 1600 万，他们是消极的。他们反对战争，组织了自卫队。要注意农民。虽然我们是弱小的，但我们的精神力量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要强大。

至于小资产阶级，我们促使他们组织起来。

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

马林从莫斯科带来一个指示，命令我们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又带来了经过充分讨论而作出的这个决定，指示说，那些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同志，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

如果我们不能改组国民党并被迫退出国民党另组一个政党，而后者又与国民党发生冲突，这将是一种损失。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我们就能避免和国民党发生冲突。

我们至少应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开展工会工作。李（大钊）教授在北京的工作证明把国民党老党员容纳在区党支部内是很困难的。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

希望这次会议将通过略左一点的决定。

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我离开多年战斗和工作的中共北方区委，去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这次会上，我被选进中央局工作。

“三大”前后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

* 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举行。这是二十年代我党最重要的一次全国大会。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是年五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决定在下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北方区选派代表出席，代表人数根据北方区内党员人数比例，约十至二十名党员中选派一人。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次为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事后，发通知到所属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的党组织，说明中央即将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同志们重视这件事，及时选派代表。对较为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南口、洛阳等产业工人区，要求他们选派当地的代表参加。

通知发出不久，又接到“钟英”（当时中央的代号）给李守常和我的信，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情况；补充了出席“三大”应该注意的事项，多半属于事务和保密工作问题；信中还要求李守常和我都出席“三大”。当时北方区委书记是李守常，我是区委委员，兼管组织工作并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央希望我们去，以便于全面了解北方区的工作情况。我们两人也经群众选举，通过为出席“三大”的代表。北方区在所属铁路、矿山及地区支部，经选举产生出席“三大”代表共十二人，居全国各区代表人数之首位。其中有：

李守常（北方区委代表）

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兼全国铁路系统党团代表）

王荷波（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仲一（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 俊（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张德惠（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何孟雄（京绥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邓 培（京奉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孙云鹏（正太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陈 涛（北京地区工会党团代表）

刘天章（陕西中共支部代表）等



为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们分批出发，尽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我是先坐火车到天津，转乘海轮去上海，再坐船到广州的。和我同船到广州的有湖北代表项德隆。到广州后，我们立刻换上了一套半长不短的“唐装”，一副广东人打扮。广东区委派有专人负责接待。当时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是“管东渠”。我没有固定住所，时而在谭平山家中，时而在广东区党委机关，有时还住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开滦罢工期间，他曾亲来北方，深入基层，视察工人情况，与我过从较密）。我第一次到广州，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次开会都有人来指引，带我们去会场。广东区委同志担负大会后勤工作是很尽力的（当时一些中央负责同志也没有住在大会会址）。

出席大会的代表，除上述北方区代表外，还有南方各地代表，他们是：

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朱绍莲、林育南、项德隆、陈潭秋、恽代英、王用章、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嵩等。

还有一些代表和没有表决权的列席人员、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的代表等。总计有三十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代表的组成，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以铁路和矿山工人运动中涌现的新人物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前两次大会所未有的。

“三大”的筹备工作从五月就开始了，到正式开会约近一月时间。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各地代表齐集广州后，在正式会议开幕之前，上届中央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准备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三大”的各项问题，由国际代表马林主持。

在扩大会上，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革命斗争的概况，并强调了建立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文件，是关于指导国共合作问题的。文件是由英文打字机打印的，由翻译译成中文，全文有几百字，大意说：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革命发展很迅速，前途很乐观，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共同革命。这个文件无疑对这次会议起了指导作用。这次会议起草了政治报告和准备了决议案。

“三大”的事务性准备工作和生活安排，统由广东区委谭平山、刘尔嵩、

阮啸仙等人负责。

“三大”正式召开前，马林还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对工人代表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做工人运动，对国共合作多不理解，马林的谈话就很必要了。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马林在提到“三大”的组织路线时指出，下届中央要多选一些工人同志到中央来，包括长期在基层做工运工作、能联系群众的同志。他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除国共合作的政策外，还谈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在大会期间，马林是每会必到的。

大会的地址，是在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即陈独秀的住所。他家有一间较宽敞的客厅可作为大会会场。会议有时也在春园马林的住处召开。会议的日程安排有：国际代表的报告，“二大”中央报告，各区工作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还成立了若干小组，分别起草决议和文件。这次大会通过并公布的文件和决议有：

- 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 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 三、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 四、劳动运动议决案
- 五、农民问题决议案
- 六、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 七、青年运动决议案
- 八、妇女运动决议案
- 九、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 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 十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国共合作”的问题，是“三大”的中心议题。这个问题在报告和决议案准备小组会上讨论费时较多，最后大家接受了国际代表的意见，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从酝酿时算起，时间就比较长了。早在建



党初期，苏俄和第三国际就着手联合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当第三国际派代表东来帮助建立中共组织时，苏俄政府也同时派人来中国活动。先是在陈炯明驻防漳州时，苏俄曾派某海军大将亲率军舰悄悄进入闽南，访问陈炯明，表示愿以军火资助陈扩充军队。陈当时受宠若惊。但是，由于漳州海港设施简陋，海轮不能入港，无法起卸大宗军火，致未实现。一九二〇年冬，陈炯明攻占广州后，引孙中山入粤，于是联合国民党事复又积极进行。

中共“一大”前后，陈独秀曾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随后，陈又介绍国际代表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当时马林化名为西蒙博士（Dr. Simon）。张太雷系马林的翻译，亦随同前往。双方在会谈中，广泛涉及苏俄对远东的各项政策。一九二一年岁杪，马林始返沪。旋又到北京，在北方区委会上报告赴广西与孙中山晤谈情况。其双方谈话内容：（1）有关革命的三民主义理论问题，赋予三民主义以革命内容。（2）建立有广大工、农、学生为基础的群众性的新型政党，涉及未来国民党的改组问题。（3）建立革命性新军队，同时改造旧军队，设置军校改革军事教育。（4）苏联以实力援助广州政府，包括财政、经济、军用物资与专家等。

经过这次双方会谈，孙中山同左右详加研究与突破现状有关问题。这样酝酿经年，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工运兴起后，孙对中共与苏俄才有了新的认识，最后，孙中山终于下了亲俄决心。他对左右亲信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说：苏俄是社会主义大国，国力强盛，可与为友。中共是中国新兴势力，我们在推翻清朝革命运动中，黄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二百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革命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动中外，其势尤不可侮！左右听后，亦以为然，联共政策，遂确定下来。

在这期间，国民党酝酿改组。一九二二年九月六日，成立修改党章起草委员会，并延聘陈独秀加入委员会。十一月十五日提出修改草案，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公布党章，同时发表宣言后成立上海执行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孙中山得滇军杨希闵、刘镇寰之助，击败陈炯明。一九二三年三月孙再回到广州，国共合作条件遂经双方正式商定：即自上而下，在中共

协助下改组国民党（包括中央及地方），接受苏俄各种援助（包括军事，意识形态各方面），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在此之前，一九二二年十月，越飞（Jeffe）来华，旋赴日本与廖仲恺会谈合作问题，表示愿提供物质援助，并晓以利害。越飞后来又访孙中山，双方谈话结果，发表了一个公报，即所谓“孙越宣言”。

又据国际代表报告，一九二三年前国民党以中国革命正统自居，一部分人认为中共在中国社会尚无政治力量与地位，实在无资格与国民党谈合作，因此主张只联俄不联共。直到“二七”前后多次大罢工发生，中共政治声望猛然增高，孙中山才断然赞成与共产党全面合作，借以增高国民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

溯自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始，中国共产党在党报《向导》上先后刊布了几个文件，包括党的宣言及陈独秀的署名文章。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即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主张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倡议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向导》第二十二期，刊布了陈独秀以《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为题的文章，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据该文论证：

（1）革命的资产阶级，如华侨及长江新兴工商业家之一部分。（2）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官僚资本家及买办资本家，如新旧交通系。（3）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不问政治，采取中立立场，如小工商业家。（4）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无产阶级联合打倒共同敌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上面两篇文章可作为当时主张国共合作的代表理论。国际代表马林以孙铎的笔名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亦表达了同样性质的论点。

“国共合作”在共产党内也为许多人所不理解，特别是工人和作工运的同志，因为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而国民党脱离群众，成分中官僚、政客不少，色龙混杂，却为人所共知，许多同志不愿与之伍，反对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阻力。直到这次会议，经过多方工作，“国共合作”始为全党所接受。陈独秀在会上多次提出中共应全力帮助国民党，各级组织应派出最得力的干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自此，“国共合作”乃成为全党的

一项中心任务。

对“二七”斗争评价，也是会议郑重讨论的议题。“三大”正值“二七”斗争四个月之后，为总结这次罢工经验教训问题，首由北方代表，书记部负责人提出“二七”斗争的详细报告。报告后展开讨论，有人认为“二七”罢工与军阀武装冲突，如以卵击石，伤亡重大，得不偿失，是闯了大祸，并提出要处分闯祸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代表批判了这种错误意见。在讨论中，马林发言高度评价这次罢工的政治意义，肯定了这次罢工的重要价值，并总结了罢工的经验。我记得这次讨论会是在春园举行的。

原来对于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问题，在“三大”以前，二届中央曾召开扩大会议（杭州会议），作出了决议。这次大会着重总结其经验教训，重申二届中央决议，认为：“二七”事发于北洋军阀统治强盛时期，犹如万马齐喑之会，风雷乍起，给予北洋军阀一大闪击。事虽未成，但在政治上确有极大影响，足使曹吴气夺，令天下振奋。事后证明，“二七”的政治影响确实很大，北洋军阀从此陷于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困境。反对封建军阀的伟大统一行动，由此酝酿臻于成熟。

国际代表在会议上还强调，北方开滦罢工与“二七”罢工从表面上说来，虽都不算成功，但却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史上空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战斗。开滦反帝斗争、“二七”反军阀斗争与党的纲领要求完全符合，从此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才真正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二七”后共产国际来电，亦云：“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列里了！”在“三大”会上，秘书处并以《京汉工人流血记》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给各代表。

中央执行委员会

经过讨论和选举，“三大”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的中央委员九人：陈独秀、李大钊（守常）、毛泽东、罗章龙（文虎）、王荷波、蔡和森、谭平山、项德隆、朱绍莲。新中央委员会名单，系由国际代表向三届大会提出讨论后通过的。国际代表强调，中央委员会组成应以工人运动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这一原则，为大会所接受，认为是进一步发展工人党的组织的重

要保证。因此，“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容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三大”选出了五人中央局，其成员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和蔡和森。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委员长主持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通信及开会记录、管理党内文件等，会计管理全党财务行政，并对中央机关和各区各地方机关财政、行政负审议之责，主持审计财务预算和决算有关事务，稽查现金出纳等工作。中央委员李大钊、王荷波、项德隆、朱绍莲则分别参加北方区、上海区、鄂区及湘区的委员会工作。

“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原在广州，后因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当时粤汉路未通），对指导全国斗争不利，中央乃决定迁回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留中央委员谭平山在广东工作，并改选王荷波入中央局。

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我和荷波都到中央局工作。我们二人原来均在北方区委工作，同时又都担负铁路工运工作，唯恐同时离开北方会影响北方区工作，所以有些顾虑，想保留一人在北京工作。我于是将此意见报告中央，并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方区工作。中央乃将我的来信转商国际代表，意思说，文虎本人有意留北方区，由荷波一人南行，这样可减少北方当前的人事困难。中央和国际代表考虑后表示不同意，批示说：“文虎不能留北京，应该从全局着眼，三代会既已作出决定，就应该全部执行。”国际代表坚持让我和荷波二人均应到上海中央主持工作。

北方区委乃立即举行会议，商定关于我离京交代工作诸问题。长辛店、石家庄、天津、唐山、甫口等处党的负责人均应邀来京参加会议。会议对当前工作及人事调整等均作了具体决定。会毕，尽美和我共赴天津，抵津后又参加了天津市有关工作交接事宜。天津会议结束后，决定派尽美回山东报告北方区委决议案。我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尽美亦同车到济南。时尽美患病颇重，临别时，我再三嘱咐尽美去青岛德国医院检查身体，作作透视，并休养一个时期后再工作。我对他表示：“一年期满，我仍当北来，望多保重。”尽美说：“我自觉体力日弱，不知以后如何变化，党需要兄方面甚多，不必一

定要回北京。”

车次浦镇，王荷波得信到站相迎，并领我至其家下榻。其室内只有一双人铺，因嘱其夫人至邻家借宿，留我共榻。我遂传达中央来信旨意，荷波漫应之。荷波夜间向我谈说：“虎兄，你大嫂闻你在火神庙蒙难，曾亲往寺院祈祷，她并求签问卜，据称，你在三十六岁还有一跳（即惊险事故），当小心在意。”我听后，暗自好笑，因答道：“我们天天在‘跳’，何待三十六岁？”荷波道：“那是自然，娘们的话，信之则有，不信则无。”二人一笑而罢。次日，我劝荷波就此同行到沪，荷波初尚感犹豫，说不愿离开工厂，怕脱离群众。其夫人在旁催促他说：“你走，我同你一道去好了，是真神到处可以显灵。”荷波遂决定离开多年的工作位置，携眷赴中央工作。

车抵上海，我与荷波寓火车站界路旅社，随至中央接头处。晚间，仲甫来寓，倾谈至深夜始兴辞而去，并约定举行中央局会议。

当时出席中央局会议除中局委员外，尚有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等。会议首由国际代表马林致词，接着是委员长陈独秀报告政治问题及中央局今后工作纲要。报告后即席讨论工作纲要，并进行具体分工。其后，润之因事赴湘，改由我任秘书兼主持宣传部工作。王荷波则任会计，监察财务。蔡和森负责《向导》编委。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恽代英。代英因事离职期间，有一个时期由我兼代团中央书记。

在这期间，中央发出的重要文件都由委员长和秘书联署，方发生效力。一般信件则仅署名钟英（中央代号）。中央代号也时有变动，从一九二三年九月起至一九二四年上半年，中央连续发布的通告，大多由独秀或我起草，并由我们二人共同联署。如目前保存下来的十三号通告，就是经中央局讨论后由我起草的。该件的署名：委员长 T. S. Chen 是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o Dshan-Lung 是罗章龙的德文签名。

国际代表经常列席中央局会议，因我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大家对国际代表很尊重，实际上很多决议都经过国际代表同意。

随着工作开展，中央局成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教育委员会。

秘书处：掌管文告、总务、对外联络、交涉等事项。

组织部：主要负责组织、建党、人事调动、党员训练等。组织部长为毛泽东。

宣传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宣传方面主要是办中央的党报——《向导》，后又加了《中国工人》，并协助国民党办了上海大学，邓中夏任上大总务。还办了训练班，组织学生出国学习等。我兼负宣传方面的工作。

还设有几个委员会，主要工作是设计、规划、制定方案。有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稍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

工委：王荷波为主任。

青委：实际就是共青团，书记为恽代英，委员为李求实等。

妇委：向警予为主任，下面设妇联。

“三大”后的军事工作，属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央及各地没有正式设立军委。

另外各省还有民委，党中央没有。主要是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也就是后来的统战部。

三届中央的全部工作方案，主要可分为党的日常工作与“国共合作”两个大的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工人运动、农民协会、青年、妇女工作等。后者包括有关改组与加强国民党等工作。

日常工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三大”以来在工人运动方面作了新的部署。其重心特别放在当时比较薄弱的上海、广州与武汉等处。于是开始集中干部在上海建立工人俱乐部，项德隆、林育南、邓中夏、何今亮、李震瀛、刘剑华、李立三等先后调到上海沪东、沪西二区主持工会工作，从而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的序幕。随后纱厂、丝厂罢工相继兴起，影响波及武汉、广州、青岛及北方各地，工会运动风起云蒸，经时约一年遂汇合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五卅”运动、省港罢工运动和全国总工会的建立等，这是三届中央坚持工人运动均衡发展新方针所获致的革命成果。在农民运动与军事工作方面，当时亦渐渐开辟道路，积极建立新的群众组织。

帮助国民党改组，其中包括建立黄埔军校，目的是为了争取工农运动进一步开展。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筹备北伐，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三大”在中共党史上，在大革命高潮进展中，具有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作用。

关于国共合作，从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都贯彻这个精神，原则始终没有变动。这个时期国共合作，对方是孙中山。孙中山当时特别重视双方平等合作，成立了改组委员会。国民党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苏联派来了特别顾问鲍罗庭。孙对鲍的意见很重视，鲍在两党合作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现今留有一个文件，记载了孙中山聘请鲍为总理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理如果缺席，会议由鲍罗庭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罗庭同意。意思是：鲍在国民党会议上有“否决权”，可代行总理职权，权力相当大。为了国共合作，苏联派出以鲍为首的广泛的顾问团。有政治的、军事的（海陆空三军）。军事顾问团以加伦为首席代表。加伦是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如东征、海南岛战争、北伐战争，加伦决策起了重大作用，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广东政府海空军方面，苏联顾问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有十几架飞机，由加伦领导。并曾由中共中央派刘云等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各军政治部主任及政工人员，也由苏联顾问及共产党共同协商派出。

黄埔军校，原来是清朝训练海军的地方。新建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多半是中共和苏联顾问所任命，经费全部由苏联供给。苏联前后分批送给一万多支枪，各种型号的轻重武器都有，质量很好。苏联在莫斯科办了一个专供国民党留学生学习的“中山大学”，去学习的人不少，有名可查的就有一、二百人。我党还派出了一些军官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当时，中国的军官主要来自保定、清河两个军官学校。海军方面，最大的一条舰是中山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舰长是从北方区烟台海军学校党支部挑选出来的。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任务是帮助改组国民党，不少中央委员做这项工作。国民党省党部的改组工作，中共也投入了不少力量。北方是北方区委主持，南方是广东省区委负责。通过改组国民党造成一个国民革命的高潮。第十三号通告前段主题就是讲这件事。

十三号通告后段讲的是争取关税独立自主问题。当时，这件事比较复杂。孙中山的口号是争“关余”。北京政府段祺瑞的意见是与帝国主义协商，稍为提高一点进出口税率，使北京政府财务上有所增加。这个要求最低，当然说不

上维护国家主权及人民的利益。“关余”问题是南方政府关心的问题。因为北京政府外债太多，以海关收入担保，还本付息。每年关税实际收入比还债数额多些，多的一部分叫“关余”。孙中山当时在西南组织了一个西南政府，北洋海军有几十条军舰拥护他，纷纷把兵舰开到广东，因此孙要把“关余”争来发海军军饷。共产党认为“关余”是临时的财政措施，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在中共策动下，后来全国爆发了关税自主运动，北京政府被迫召开关税会议，帝国主义亦被迫让步。

关于中央通告

为了执行“三大”的政策，三届中央产生后，从一九二三年六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前后签发的正式通告约二十四、五件，目前保留下来的很不完全。

“三大”中央拟了一个全国工作规划，内容包括有宣传教育、建党建团、工运、农运、妇运、青年团工作等。各项工作还分别有所规划。中央的通告反映了上述规划的内容。当时的大部分通告由委员长陈独秀和我共同签署。一九二四年夏我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被派出国工作，我出国期间的通告则由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署发表。

目前中共中央机关保留下来的由独秀和我共同签署的中央通告还有五号、九号与十一号、十三号等。现已公布的有第十三号通告，该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前部分专说国共合作问题，后一部分说的是收回海关问题。

通告十三号

各区执行委员会并转各地方同志们：兹有两个重要工作，望同志们努力进行。

（一）国民党改组问题

自大会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第一次本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适值国民党有改组之议，遂议决关于国民党进行计划，以冀实行大会之议决案。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着着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广州已设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驻沪执行部业已成立；广州上海二市，



已着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中局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各地方同志在此工作中，望依下列步骤切实进行：

(a) 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要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b) 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 S. Y. 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

(c) 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委与地方会员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川资由总部发给。

(d) 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会议决一致的主张。

（二）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协定关税制，税则与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者致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进口税，以遏外货之输入；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税，以遏原料之输出；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

目前广东海关问题，广东政府原来之目的固然仅在关余，然相持之际已发展到用人问题。我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所不惜。

各地方同志们应立即尽力之所能设法联络各团体，以地方公团名义，散放

传单，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发起排货。此主张一时未必即能贯彻，然我们断然不能失去宣传的机会。

以上二工作，为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各同志接到此通知后，拟如何进行，并已进行至何程度，各地方务须随时报告区委员会，各区会务须随时报告中局，中局即以此二项工作进行如何为各地方工作勤惰之标准。

十二月二十五日
委员长 T. S. Chen
秘书 Leo Dschan-Lung

“三大”前后发行的主要报刊

中共“一大”前，最先刊行的党报为《共产党》月刊，至“一大”时停刊。“一大”以后，党以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上海党报为《劳动界》，由独秀主编。北方党报为《工人周刊》，由我主编。

中共“二大”后，国际代表马林来京时，向北方区委提出建议，出版一种英文日报，争取在中国外交界及国际工人运动中扩大党的影响。区委讨论后，决定创办英文日报，并定名为《远东日报》，由北方区委负责筹办，并在南池子冰窖胡同租定报馆馆址，克日开始筹备工作。

《远东日报》编辑部，主要由马克思学会西文翻译组负责。在筹备过程中，立案事宜发生波折，而且一时亦无法购置英文排字机。由于上项困难，经中央商议决定作罢，改在上海出中文周报，即《向导》周刊。

《向导》周刊，原定名为《政治向导》，后简称《向导》。《向导》主编陈独秀，早期编委会成员有国际代表马林、伍廷康以及高君宇、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蔡和森等。编委会下设翻译室，有英、法、德、俄、日五个组。《向导》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旬集稿，每周星期三出刊。独秀主编《向导》，他几乎每期都执笔写文，仅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中断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独秀患慢性肠炎卧床不起，《向导》遂改由我主编了几期。

《向导》编委要求熟悉各国党的过去与现在的政治文献，须经常阅览中、西文报纸，如康民特尔、朴罗芬特尔出版的报纸与月刊，及英、德、法文版国

际通讯等刊物。《向导》编委会对读者所提意见十分重视，一般均须作答，或在通讯栏刊布，或个别函复。《向导》编委在集稿前一、二日，齐到编辑室漫谈，交换对于下期题目及内容的意见。有时谈锋所及漫无界限，谈毕亦不必写成文。即令写成文章，由于篇幅所限，亦不一定全部刊出。

《向导》与一些党内刊物、书籍一度曾在北京印刷、发行。由于政治迫害，没有固定的发行机关。如第一期至第三期，总发行所为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徐白民。第四期起始办妥邮局挂号手续。第六期至七期，在北京后门内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一号。第八期至十一期恢复徐白民，加北京大学第一院收发课转罗璈阶（我的学名）。第十二期，北京发行改由刘伯青负责（他同时是《工人周刊》助理发行人）。第二十期公开发行集中在北京。第二十一期至二十五期，除北京外，再加广州一处。第二十六期，北京照原址，取消广州发行处，改由杭州马坡巷法政学校安存真（安体诚）转。第二十九期，杭州发行处撤销，仍恢复广州昌兴街二十八号。第三十期至三十三期，又取消广州发行处，恢复杭州原址。第三十四期又撤销杭州发行处。第四十二期，恢复广州发行处。第四十三期起，独存北京一处，其他撤销。第四十四期起，又恢复杭州原址。一年间《向导》发行不断变易地址，可见其处境的艰难。前后发行人与发行地址，大多数都被军警机关传讯或搜查过。北京大学、杭州法政学校就常为此遭到检查，发行人受到侦缉。

《向导》文风泼辣、形式多样。政论文章如刀枪上阵，言辞锋利，英气勃勃，凌厉无前。以笔名只眼、独秀、孤松所为短文及诗，则语调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次，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延误革命的佳期”的句子，独秀偶然看到，失声笑道：“以革命与佳期联用，实为新颖，形象非凡，气氛乐观。我们平日草文，均属一时急就的篇章。如从文艺角度看，竟无一长处。”三届中央还出版了一种党内刊物《党报》，记载党内文件和通告，但出版期数不多。

《中国工人月刊》：一九二三年中共中央曾决定办一种工人运动理论刊物，但因人力不足，久未实现。一九二四年，中央再次作出决定办一个革命理论与实践综合性的工人运动刊物，定名《中国工人》，我适由欧洲回国，遂推我负责主编，并组成编辑委员会。一九二四年十月，创刊号问世。后刊行国际职工

运动专号，销数很大。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前后，共出五期。经编委会审定的稿件，累计约几十万字。参加写文者有下列二十余人：邵时威、李守常、徐典、刘伯青、林伟民、若愚（林育南）、邓中夏、赵世炎、项英、辟世（任弼时）、张伯简、张特立、吴雨铭、罗亦农和我等。

《中国工人》当时在国内与《向导》平行发刊，销路仅次于《向导》，而为革命阵营第二大刊物。“五卅”运动发生后，因编委会重要成员工作繁忙，且分居各地，集稿发生困难。一九二五年六月，经中央决定，暂时宣告停刊。一九二九年重组编委会，由沧海（即我的笔名）、石溪（育南）、项英三人负责。一九三一年后，印刷厂因故复停，《中国工人》便成绝响！

《中国青年》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创刊的，由恽代英主编。社址设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一八六号。一九二六年五月移广州，改由李求实主编。一九二七年五月移到武汉出版，十月迁上海，易名《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改名《列宁青年》（化名《光明之路》），一九三二年停刊。

“中央出版委员会”，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中央局会议讨论关于党内外出版方针与机构问题时，决议由中共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合组而成立的。以我、徐白民、恽代英、顾琢之、苏新甫等为委员，并指定张伯简、成伟、郭景仁等参加专门筹议有关出版事项。第一次会议决定统一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发行事宜。原在上海南市民国路小北门设立上海书店，经整顿后，由徐白民任上海书店经理。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建立全国书报刊物发行网。各地负责人为：

广州《新青年》社苏新甫（一九二六年改设国光书店，由黄国梁任经理）；

武昌利群书社林育南（一九二七年设立长江书店）；

北京大学刘伯青；

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安体诚；

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太原晋华书社杜时；

济南齐鲁书社王尽美。

又决定自办国民印刷厂，厂址设在闸北香山路香兴里，延聘胡忧天任经理。

三曾里三户楼

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后，决定“三大”中央设在上海，“三大”中央局的常委全部到上海集中。常委们陆续到达，有的由湖南到上海，有的由北方到上海，有的由广州到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路线都不一致。到上海后，在闸北找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这就是三曾里三户楼。

三曾里的房子是王荷波租的，离闸北火车站一二里路远。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这个名称很费解，后来才知道这个里弄只有三个门牌，由此而得名。

三曾里的房子结构是普通的二层楼房子，用上海话说叫做两楼两底。我们决定找这地方作办公地点，是因为此地属于中国地界，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工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居民以广东人最多，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环境条件对工作很有利，所以才定了下来。这个房子，楼上楼下大小共有八、九间房，当时没有户口制度，但住房必须有个户主，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我一户，大大小小算起来有十口人常住。对外就说是一家人，向警予是一家户主。

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栋房子的前厢房。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时间做了很多工作。

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小孩住的房间和润之的房间只隔一层板壁。向警予在中央参加工作，负责妇委，兼做工人运动。在三户楼中间，她是年长的一个，做事很有经验。我们推她当户主，中央开会和里里外外的事都由她安排，照顾。

另外，有一个管事务的女同志，叫王熙春，共青团员。她是扬州邗江人，原上海某教会大学英文班学生。她排行第九，外号九姑娘，主要是在秘书处领导下负责对外联系，管理机关内一些政治性和事务性的工作，包括警卫、后勤等。房子上有一个警报电铃，也由她管。熙春同时负责女工运动，组织领导丝厂工会斗争，曾被捕过一次。我们还请了一个娘姨，叫魏贞秀，苏北盐城人，是个丝厂女工，有三十多岁。她是工会成员，不是党员，但很忠实可靠。

三户楼设有公共伙食，由向警予管理，平常吃饭有七、八人。每月休息时

间由向警予和王熙春规定。为了工作，我们口头约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纪律，不成文的公约，即不准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上海街上游逛，休息时间和业余时间如要出外，可在空旷的地方散步，假日可到吴淞炮台、兆丰公园，或远处如松江、太湖、虎丘、苏州等地旅行。

中央机关不止这一处，英租界威海卫路瑞兴里也有办公处，其他如共青团中央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和辣斐德路等处，国际联络处即外白渡桥苏联领事馆，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设在英租界汇山路。

经常到三户楼来的有王荷波，他住在英租界同孚路，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约四十多岁。国际代表也来开过会，他不常在上海，有时到广州等地去。恽代英当时是共青团的书记，中央开会他也要来列席会议。陈独秀不住在这里，离这里有一、二里路，但在三户楼设有床铺，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这里留宿。我们这个“家庭”对外以“报关行”作职业，即帮人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经常来的这几个人对外就说是亲戚串门子的。其他人非经允许不准来。例如，有一次陈独秀的爱人高君曼来找陈，王熙春不认识她，不让她上楼。还有一次，湖南有个青年从长沙来找杨开慧，杨问明来意，知道他头次到上海，很想在此留宿，杨说不行，叫他回去。这个青年远道而来，很难过，杨说你一定要离开，以后也不能来，就把他送到了车站。这只是一个例子，足见其严密了。一些特殊的、经中央允许的人和来接头的人可以来往，这个地方是不公开的。苏联领事馆派专人和我来往，他可以进我们的房子。当时，常委会在楼上的客厅举行。

在三曾里，我们订了《新闻报》、《申报》、《新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的《益世报》；订外文报有《密勒氏评论》，这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家外报。还订了一些外国杂志，主要是第三国际的英、美、德、法各种文字的报刊。润之主要看中文报，代英、荷波、仲甫和我都看外文报，有时我们也在一起谈论有关报刊内容诸问题。

毛润之每天早上利用吃早饭的时间看报，把重要的记录下来或剪下来。我们的报纸头天取回来，第二天仔细看，主要是了解政治情况。报纸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申报》、《新闻报》的北京专电，可借以研究全国的政治动向。

我们的报纸不是送到所住的地方，而是送到信箱，由小王每天去取。我们的信箱不止一个，在北四川路离苏州河不远的邮政局地下室，也有我们的信箱，也可以收到报纸。

三曾里离环龙路执行部比较远，我们坐车子前去办公，大家指定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车前去，大部分坐出租汽车。当时出租汽车很多，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上车。就是专车，我们也不让他开到住处，让它在指定的地点停下来。

我从一九二三年秋搬到三曾里，第二年六、七月才搬走，住了近一年。后来我出国到欧洲工作，以后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向警予住在此地，到丝厂做女工的工作也很方便。这附近有个湖州会馆，是浙江大资本家盖起来的，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时，它是最著名的司令部所在地。

三户楼诸人，平日生活十分紧张，如草拟文件、决议，为《向导》及党报撰文，经常静思澄虑直至深夜，但大家以革命为信仰，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生活又十分有朝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是我们遵守的信条。当时，我曾有诗记述三户楼：

黄浦激浪雪山倾，淮海风云会郡城。

东楚山川多壮丽，西方瘴疠满神京。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按一九七〇年上海房管部门查到解放前一张房产建筑的旧图纸，确认三届中央办公处是在上海闸北区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三曾里。但是，原房屋在“一·二八”时，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毁了。现在原址建筑了一座新楼，三曾里已看不到了。

国际代表马林

一九二一年至二四年间，国际代表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者主要有马林与伍廷康等，二人对中国革命均有劳绩，而以马林的贡献最为显著。

马林自中共“一大”以来便在广东、上海工作。北方会议前后，马林作为国际代表曾留驻北京多日，参加北方区委会议，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研究国共

合作问题，并提出方案与建议。马林全名：Henker Slievlied Maring，原籍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投身荷兰工人革命运动，担任荷京港运秘书。周游世界多地，后遂侨寓泗水。一九一四年成立东印度社会主义联盟。一九一五年出版荷文《自由呼声报》。一九一八年出版印尼文《人民呼声报》。一九一八年间，马林因迭次著文抨击荷兰政府的殖民政治，被驱逐出境。一九二一年受第三国际派遣来到中国，帮助中共推动工人运动，有运筹帷幄之功。

当时，马林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器识宏通，对中国革命问题从世界形势权衡全局，故观察与议论非寻常之见所可比拟。仲甫对马林颇尊重，但二人秉性均倔强，如遇议论不合时，互以盛气相凌。一次仲甫尝向马拒绝国际经费支援，说道：“何必国际支援才能中国革命！”马林颇为难堪。仲甫亦自觉失言。马曾戏称仲甫为“火山”。又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仲甫与马因争论，致使会议不能进行，我当时任三局中央常委会秘书，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马林心平气和去邻室抽烟，陈仍余怒未消。片刻后我说：“时间已到，继续开会。”马问：“‘火山’是否熄了？”我说：“熄了！”马林说：“革命党头脑应该冷静。”时润之亦在场，会议结束后，润之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我们均表支持。

马林关心工人运动，身体力行，在北方时，尝不顾环境险恶参加工人支部会议。某次在会上与铁路工人谈话，有人发问“革命主要目的何在？”马答：“首在争取政治自由，实现政治自由以后，经济各项改革自然水到渠成。”又问：“敌势强大，如何着手？”马答：“从组织群众力量入手。敌人对我施百吨压力，我们以千吨革命强力回报。”马林这些简明有力的谈话曾给予参加会议工人以极强烈的印象，亦是他长期从事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战斗意志和语言。

一九二二年我在唐山领导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斗争很激烈，双方冲突，死伤很大，罢工遇到重大困难。我即发了一个西文急电到上海中央，时值中央开会，陈仲甫和张国焘之间因意见分歧，相持不下，马林接电说：“目前唐山问题是党的首要问题，要全力以赴！其他个人争执均属次要。”于是大家转入讨论支援唐山罢工问题，及时作出决定。马林还为此事亲临天津和我见面，反复商讨

罢工问题。

“三大”会上，代表们对“二七”罢工问题，认识不一致，马林在会上提出共产国际文件，对“二七”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同意国际的看法，以理服人。马林对确定“三大”路线，贡献亦大。

国共合作，起初阻力很大，第三国际授权马林具体执行。中共“一大”后，仲甫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意见，即介绍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直到党的“三大”，马林在这一期间做了很多解释说服工作，对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林对中国革命视同自己的事，遇事率直倡议，不稍瞻顾。他曾担任《向导》编辑，很刻苦，每篇稿文都要我翻译讲给他听，不对的地方，就提出看法，要求我们改正。对他自己亦是如此。他在上海时曾向工委提议组织北方矿业工人联合会问题，当时我心不谓然，乃将此事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会议上详加讨论后，认为北方矿区分散与铁路性质迥异，目前只有开滦、焦作煤矿尚有基础，六合沟、枣庄、阳泉与淄博次之，其他矿区尚无眉目。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策略原则，北方至少须有几个大矿工会作基础，才能成立联合组织。目前尚无此条件，因此对马林提议决定缓办。此项决定尚未正式通知马林以前，马林托春木（张太雷）送来亲笔德文信一封面交给我，封面上书 Mandat（命令）字样，内容仍是坚持限期成立矿工联合会事，我即往见马林，将会议讨论情形详告。马不悦，说这是“外交词令”，但亦未坚持下去，此事遂作罢。事后马林自觉前信失之操切，乃在出席会议时加以解释，并撤回前次提议，同时，对中央工委处理问题态度认真负责加以赞许。由此一事可见当时国际代表与中共组织关系互相遵守民主原则，故能同心协力共赴事功。

马林在中国工作颇称顺利，自一九二一年至二四年，中国革命循序渐进，收到确实成效，马林之功不可抹煞。但由于当时国际东方部倾轧排外政策的结果，马林于一九二三年下期被调回莫斯科，改派伍廷康继任。伍为俄罗斯人，原先来过中国，后回国，自此以后长期代替马林职务。马林回莫斯科后与东方部意见龃龉，众口烁金，马林遂辞职重返荷兰，一年以后，我们于阿姆斯特丹又曾相逢。

马林自离开中同后即返荷兰担任码头工会秘书，在汉堡参加国际运输会议，我们同时出席，在会上相遇。会后他约我到荷京阿姆斯特丹一行，我乃与马林同往荷京访问，约经一周时间，即暂寓其家。其夫人热情招待有如家人弟兄，亲切异常。荷兰是世界闻名的航海国家，其海员工作效率为欧洲之先进。阿姆斯特丹，港政修明，足与汉堡相埒。但见海上艨艟巨舰，往来如织，工人组织极严密，生产与文化均极可观，马林尽数日工夫陪同参观造船厂、堤防口工程以及近郊农场，其中奶油乳酪、蔬菜生产量丰质高，不愧为欧洲诸国的“厨房”。几千年东方专制大国毫无民主传统，视此蕞尔小邦，经济、政治、文化均远所不及。马林对中国革命备极关怀，他告诉我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今天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更无达到民主的道路。”在马林家连夕倾谈，情谊隆重，临行时，夫妇二人依依惜别，请留诗以作纪念，我用当地文体写了“十四行”诗相送，他们夫妇均曾学习过汉文，又要求把诗译成中文，我勉译成下列绝句一首：

海国西来万里轮，

威廉霸迹已成尘，

唐山、辛店惊风雨，

话到当年情更亲！

夫妇两人阅后，喜甚，互道珍重而别。

环龙路国民党执行总部

国共合作具体执行时，中共曾多次郑重地进行讨论，各次会议均有国际代表参加。中央局会议曾作出决定，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下列原则，即：

（一）中共保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共党报及中共各级刊物对国民党施政得自由批评，不受限制。

（二）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组织不受国民党及其政府干涉，工会、农会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纠察自卫之自由。

（三）中共党员（包括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任群众工作，但一般



不做国民政府官吏。工人运动领导者及中共所属工会会员不得加入国民党。

(四) 在组织方面, 自一九二三年七月起, 中共中央由仲甫代表中共出席国民党最高会议。党组织自中央到省市各级按系统派遣党员分别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 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部及基层组织, 训练干部, 整饬宣传机构, 协助国民党工作, 扭转该党在民众中的不良影响, 帮助国民党改善军事教育训练, 建立革命军队等。

根据上述原则, 中共中央政治局派政治局委员(时称中央局常委)王荷波、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参加国民党执行部, 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 后又续派中委李守常、谭平山等协助国民党在北方及广东的改组工作。中共各省委、市委分别派遣中共党员参加当地国民党省市委会的改组工作及军队改建工作。现就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国民党执行部、黄埔军校的建立诸项略述大要如次:

国民党“一大”

一九二三年十月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召开。此次会议, 中共方面全力以赴, 动员党内大部人力协助筹备大会诸事。中共中央决定自中央到地方派遣多数干部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央工作。派遣干部时, 曾经过详细讨论, 决定原则如下:

(一) 李大钊、张国焘、韩麟符、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等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 为跨党党员。

(二) 原有国民党籍之加入中共党员, 由中共方面提名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 人名为: 林伯渠、沈玄庐、邵力子等。上述名单是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

(三) 省、市党部委员由国共双方经地方党部决定。人名为: 夏曦、董必武、宛希俨、于方舟、侯绍裘、江浩、李锡九、谢晋等。作为跨党党员得当选为国民党机构委员。

(四) 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级工运干部, 原则上不参加国民党。

如罗章龙、王荷波、项德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李震瀛、何今亮，北方工运负责人何孟雄、王仲一、张昆弟、邓培、孙云鹏、安幸生、康景星、李宝成，湖北工会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江苏工会负责人朱宝庭、孙津川、姚佐唐、余立亚，浙江工会负责人沈干城、朱阿堂、赵济猛，江西工会负责人陈赞贤、王凤飞、袁孟冰，广东工会负责人阮啸仙、刘尔嵩等，均不加入国民党。

独秀对于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央委会的意见开始不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大多数中委都不同意独秀的主张，所以结果仍然决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央委会。

（五）向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大会决议草案及宣言内容，决议主要包含下列几点：

- （1）对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重新作解释。
- （2）提出联俄、联共与赞助农工的政策。
- （3）国民党组织从总理制改革为委员制。
- （4）选举时尽量引进国民党左派进入新中央委员会。

因此，国民党“一大”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体现着两党平等精神，从理论上奠定了名实相符的合作基础，两党联合会议决定了国民政府的施政总方针。

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置国民党执行部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执行部内主要设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等部及秘书处。国民党派定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丁右任、叶楚傖、茅祖权等分任各部部长。中共方面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四人参加指导执行部工作（恽代英系代表团中央参加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协商决定。同时，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干部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杨贤江、沈玄庐、张秋人、李成、刘伯伦等参加执行部各部门宣传与组织的基层工作。当时上海社会传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日，上海执行

部国共两党工作人员齐集莫里哀路孙的住宅举行纪念活动。并在孙寓的花园中合影留念。当时参加者每人都有一张。六十年后，仅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一张，但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张相片中，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茅祖权、叶楚伦、叶纫芳、戴季陶、林焕廷、孙铁人、喻育之、王陆一、周雍能、何世桢、葛建时、陈德徽和向昆等十六人。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沈泽民、刘伯伦、韩觉民（团员）和张廷灏（团员）等十一人。总计二十七人。相片是由一家广东人开设的“王开照像馆”拍摄的。上海国民党执行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只三十多人，而参加合影的居其中大多数，且都是双方的主要主持人。因而这张相片也就成为当年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的真实写照，珍贵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在党的“六大”以前，中共中央的同志如此众多齐集一起留影的相片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告诫全党党员，不计较权位，不营求私利，努力实干，相忍为国，把完成国民革命视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耿耿此心，薄海皆知。

在国民党中，胡汉民与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孙的亲信大都为广东同乡，中心人物为胡汉民与汪精卫，外间称之为国民党“平衡力量”。胡孙二人后乃分道扬镳。

胡汉民，原名鸿衍，字展堂，清末举人，一九〇三年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习速成师范，最先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所倚重。胡平日对人称“位不过贤书”（意指最小的芝麻官），但自负极高，先是一九二二年五月，胡以代大元帅名义率师由韶关北伐，进入江西，攻下赣州。随闻陈炯明倒孙，即回师驰救，北伐遂无功而还。但胡对此颇炫耀，其部属也称他为胡代帅。

胡头脑冷静，能诗文，吐属隽永，外传说孙中山所刊布《三十三年落花梦序》，重要政治文告及悼刘揆一诸作品，均胡等捉刀。他尝戏用广东方言写咏史诗多首，亦极有风趣，其《垓下诗》有句云：

八千子弟向秦封，
破釜沉舟究不同。

咁样多人为你死，
因何有面见江东。

胡对中国文、史、书法颇有研究，在办公室有暇辄练字，一心不乱，临“曹全碑”极为神似。

胡平日，高自期许，于人鲜所许可，尝在办公室当众评论汪精卫“华而不实”，戴季陶“有流无源”（指戴作文多译自日文书报），某某“周而不到”，《民国日报》文字散漫无章法，其他讥评尖刻，往往而有。他对我党诸人初亦不甚重视，不久态度渐改，尝对人言：“执行部中共党员各有长处，不可小觑。至于中共群众组织势力更不可侮。”胡对其属下曾说：“仲甫先生，戛戛独造，究竟与众不同。”胡善观察事物，但城府极深。一天会后，闲谈中俄关系，他说：“俄国即殷高宗时的‘鬼方’，当时中俄双方打了三年战争。”语意双关影射时事，因询问我：“罗先生对中俄关系掌故了如指掌，以为然否？”我已知其意有所指，因答道：“此乃先生创见，极可参酌，但就‘地望’而言，显属似是而非，且孟轲有言：‘此一时彼一时也’，战争与和平本是常见的事。”胡聆言嘿然，忽扬声鼓掌道：“高见！高见！”遂彼此一笑而罢。

一九二五年胡因廖仲恺被刺案涉嫌，亲往苏联报聘，以贵宾资格出席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其祝词云：

“……我以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对允许我出席这次国际代表会议表示感谢。只有一种世界革命，而中国革命就是它的一部分。

国民党口号是：为了人民群众！这就是说：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胡汉民在共产国际开幕会致词）

这是胡言不由衷的例子。一九二七年胡是发动并亲自主持清党的大员。

汪精卫与胡性格各异，但极能干，故时称“汪胡”。汪敏慧过人，善属文，兼擅长演讲，激昂慷慨，感染力极强，满座为之倾倒。汪为人圆通无棱角，善窥人意，对人彬彬有礼，故人乐与往还。在大庭广众间，汪对孙中山称先生，对独秀称仲甫先生，对鲍罗廷称鲍先生，对其他诸人词令婉约无不气顺言宜，即偶发笑语亦令人觉其真挚可亲，故人称其为“政治尤物”！汪对当时国共合作政策始终毫无间言，热诚拥护，对中共遇事体贴入微，奉国际代表若神明。



迹其用意无非是想在合作过程中博取个人超额权益足以凌驾胡之上。一次，我与汪精卫同车到静安寺路中华书局工人进德会演讲，汪在车中与我攀谈，郑重说道：“我参加革命以来，由于个人学无专长，至今一事无成，今后愿诚恳向中共工人同志学习，多读革命理论书，在即将来临的国共政府中，贡献微力。”由此可见汪说话动人处，“巧言如簧”，真是当之无愧！

张继，字溥泉，直隶静海人，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孙中山指定他专门同我联系，加强执行部的日常政务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他在日本东京时与独秀友善，回国后时相往还。国共合作，张溥泉实为居间奔走撮合之人。在上海执行部成立前，国共双方接触频繁，多在法租界蒲柏路巨籁达路某里张溥泉寓所。一日，我至溥泉家商谈有关国共合作问题，谈锋所触极广，张性豪放，纵情高论，更无拘束。张云：“同盟会革命得日本友人助力不少，今日苏联拥有红军几百万，只要从库伦出兵，中国局势立即可以完全改观。”张又云：“我们过去从事中产阶级革命，十几年间浪费光阴，今后应改弦更张，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还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继性情豪迈、健谈，其夫人亦身裁祁硕，丰仪俊秀，对客常提说我们溥泉是个直爽人，赤胆忠心，革命阵营少不了他，却不会做官……云云。张以目止之，夫人佯做不理，侃侃而谈。故外间流言张有“季常之癖”，未知确否？不久，鲍罗廷来到中国，张闻讯十分激动，走访仲甫，谈话中张幽默地说：“国共合作‘鲍姥’实良媒。”仲甫笑颌之。张去后，仲甫对我说：“溥泉说‘国共合作鲍姥实良媒’，老实说，不过炮姥做良媒罢了。”（鲍与炮谐音）从此以后，张溥泉乃成为国共合作狂热拥护者，直到一九二六年间，张溥泉忽一变而为仇共最力之一人。他向上海驻军李宝章献谋，派大刀队肆意砍杀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要“一个不留”。前后竟判若两人。

叶楚傖在国民党原是很重要的人物，叶是上海《民国日报》的主编，同他打交道的人比较多；他又是江浙人，为照顾上海地区，让他来参加执行部。他表面中立，内心非常抵触，我们那时不把他当左派。他是做青年妇女部工作的，我党派向警予做助理，实际上是向一手把工作做起来，叶是不甚管工作的。

于右任，代表西北国民党的势力，是执行部内的左派。于曾任陕西三原靖国军司令，诗文与书法独步一时，有“北方之强”的气质。尝自述身世，言其

少而孤贫，有“我亦凄凉托外家，如今囊笔走天涯”之句。为人倜傥风流，不拘细行。如在上海闸北青云里办上海大学时，于对我说外间称上大为“野鸡大学”，并解释说，野鸡投宿榛莽，故与一般大学不同，上海大学是革命通逃藪（如刘华、余泽鸿、黄仁诸同志均上大学生）。他当时支持国共合作，将工人部交给我们。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时，亦将整个权力交给中共同志。他曾到苏联去过，后把在苏联所作的歌颂十月革命的诗写给我看，以表白他内心是拥护苏联和共产党的。他口诵七绝一首，云：“三原征战绩已陈，我亦关西一老兵（于常以“关西老兵”自称）；万里投荒阿穆尔，老而不死做诗人！”亦可见其性情为人之一斑。

另外，谢持代表国民党中国西部力量，辛亥革命时是四川省长，是右派代表性人物。孙让其参加执行部工作，不过是表示团结的意思。茅祖权是长江中部同盟会负责人，当过安徽省省长。在执行部任调查部部长，与仲甫同乡。

以后，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邓演达等也先后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戴季陶原名天仇，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会员。讨袁失败后，政治失意，生活潦倒，流寓上海，混迹于证券交易所，慕陶朱公（范蠡）为人，易名季陶，后愿望落空，乃乘轮返川，在宜昌投江自杀，为一渔夫救起。其人文风平庸，但能阅日文书刊，抄译成篇，颇自矜持。平日好饮酒，醉后尝失言。在一次会议上，戴对《向导》文字不满，悻悻地向我说道：“你们太霸道，目中无人，要知你们是‘客卿’，我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时汪精卫在傍，对其言感到惊讶，遂笑道，你又说醉话了，我们并无主客之分，国共同志，大家都是好兄弟。几句话敷衍了过去。但戴心里并不悦服，耿耿于怀，现于词色。戴在宣传部任部长，旋开始宣传正统思想，扶植政治偶像。以上事例可见他与中共同人貌合神离，意见渐不协调。

在执行部内，左、右派斗争相当激烈。

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胡说，这是新规定，先生（孙中山）也同意要我们这样做的。此人将桌子一拍，就是不肯填表。汪精卫也出来说：上有总理，下有组织部。意

思是要他向我们说。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胡汉民、汪精卫也填了。要遵守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但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准备召开一个会议，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四区就是环龙路所在的法租界地区，有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住在那里。有的当过军长、师长、部长、省长，大约有千余人。审查后发了党证，同时还清洗了好多。他们在审查时一下子进来许多表，企图蒙混过去。在这个成立会上，国民党左、右派斗争表面化了。右派酝酿要争得更多选票，争取区党部的多数。他们自己估计没有把握，准备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合法的争取多数，请孙中山先生出来说话。二是如果办不到，就纠集一些流氓，在会上抢主席台、制造武斗，以破坏选举。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认为会一定要开好。于是决定我们全体同志，党、团员及同情我们的左派都要出席会议，保证会议胜利开好。右派曾经去请示孙中山，孙没有表态。胡汉民、汪精卫说，开会那天除极少数人留室办公外，其余的人都去。还让新闻记者去采访。当时上海有许多外报记者。当时执行部决定，这个会最主要的是要组织好，主席台不能乱，万一他们武斗，我们要出面制止，使他斗不起来。同时又成立了纠察队，严格控制会场，制止武斗。由王荷波领导组织了一个很强大的纠察队，从主席台到门口设立岗哨。布置好了以后，王荷波对我说，现在准备齐全了，他们如在外头闹，我们就在外头制止他。开会那天决定我担任区大会主席。第二天我们开会，右派就在外面扰乱，我们内外配合把会场控制得很严，流氓想进来，纠察队把他赶走。右派头子高冠吾多次捣乱都失败了。这一次斗争，右派失败了。他们不服气，在上海各报纸上写文章大肆攻击中共中央，攻击四区会会场主席，当时上海《申新》等报，曾记其事。

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以后，继而成立黄埔军校，由是建党建军工作着着进展。在两党合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冲突亦渐渐酝酿，逐渐产生和发展，至一九二七年而更趋显著。

党的三大^{*}

北伐战争以前，湘区党委的主要工作是贯彻党的三大和四大的决议，即同国民党实行合作，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进行农民运动；领导各阶级人民，同帝国主义在湘势力、北洋军阀和赵恒惕政府积极开展斗争。

实行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的一项重大决策。孙中山经过辛亥革命，讨袁护法之役，屡遭挫折、失败，深感过去依靠军阀武力的“革命”没有希望，深感国民党组织涣散，党员革命之“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他开始寻求新的道路，逐渐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可以借鉴，同俄国革命党可以联合。一九二一年底，他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了国民党同苏俄以及中共的关系问题，认为俄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同他的民生主义不谋而合，而他的民生主义就包含了共产主义。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以后，他又多次同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接触，进一步商讨国共合作的问题，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确定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二大”决定同国民党及其他革新团体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二大”以后，党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当时，中央虽然尊重国际的建议，但大多数人只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参加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这次会议以后，只有很少几个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就国共合作问题又专门作了决议，指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

^{*} 李维汉：《李维汉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的旗帜。”同年五月，共产国际在给我党的指示中，又强调在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议程仍然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三大”接受了国际的决议，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第一步应该先实行国民革命。大会分析了国民党的状况，认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大会认为，国民党有较长的历史和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威望，较之我党有更大的号召力，运用国民党的旗帜，有利于团结各阶级民主力量参加国民运动，也有利于我党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开展工作。大会所作的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策，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会也正确地指出，国民革命虽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应该保持自己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大会还指出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大会通过了较之“二大”制定的更为具体的民主革命政纲，作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和袁达时作为湘区党员代表，参加“三大”。“三大”以后，毛泽东留中央工作，袁达时大约在八月回湘，向区党委和党员传达了大会决议和大会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的争论情况。袁对我说，毛泽东让他带话给我，他认为安源工人应集体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在会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有可能来湖南活动，要我注意。后来张并未来湘，湖南的产业工人也没有全体加入国民党。

“三大”以后，在共产国际和我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宣布了政纲，实行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最近，有同志对我说，在国民党“一大”文献中，有一个参加大会的湖南代表名单，其中有我。实际上我完全不知道被选为代表的事，也没有去广州参加过会议。代表湖南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是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和林伯渠。

“三大”以后，党内曾发生忽视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而只集全力于国民党工作，忽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偏向。为此，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湘区党委派代表参加。代表是谁，我已经忘了，这次会议强调我党在国民党工作中不能“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要“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要促使国民党不断加强反帝反军阀，要求民权原则的宣传，使之赞助农工运动。会议还强调加强党对工人的工作，说今后“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各地方委员会的工农部内设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这次会议使我们对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和在统一战线中注意保持阶级斗争观念的认识，提高了一步。

对于产业工人是否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我现在的看法是，既然规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张国焘的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它不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以推动革命运动。但也不必要全体产业工人都集体加入国民党，而应根据工作需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或以个人身份加入，或集体加入均可。扩大会议认为让国民党组织渗入产业无产阶级是“很大错误”的说法，未免有些片面。后来，“四大”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一些规定，说：“为在国民党中发展劳动群众的左派势力起见，到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我们亦须领导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特别的革命化。……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危险，还不在于工人加入国民党，却在于共产党在真正工人群众中没有势力及没有独立的职工运动”。这样，在工人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四大”政变了扩大会议的决议。



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暄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二月七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诒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是事先毫无警告的阴谋袭击的屠杀行为。这种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误会’二字来掩饰的……”我这斩钉削铁的回答，使这次的晤谈迅即结束。

这样一来，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几天后，他旋又接到北

*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京朋友们的来信，告以他在北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图书馆去了。

这年一月间，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了，他由北京来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开活动的人。他以记者身份回来，共产色彩尚未表露出来。他的肺病那时似乎停止了发展；满腔热忱，很想一显身手。他爱好文学，住在闸北区，屋内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书屋，出入于他那里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的老作家于右任过往颇密。他们计议创办上海大学，由于右任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不久这所大学终于成立了，成为一所有名的革命青年训练所。当时，中共因职工运动遭受挫折，对瞿秋白的这种活动多方予以赞助，认为这是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而且能与国民党的名流们建立较广泛的关系。

失败的苦味是罄竹难书的。有些国民党人物讥讽我们，打击我们；他们讥笑我们对吴佩孚存有幻想；指斥我们对吴佩孚政策的不当；因而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工作者，更想乘机夺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阵地。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反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

一部分国民党人的这种活动，还得着湖南劳工会王光辉等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响应。他们大多不满意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气焰，因而组成一个反中共职工运动的联合战线。他们标榜工会应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应与政党发生关系，尤其不应受中共的利用。他们提出“穿长褂子的共产党人滚出工会去”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二七罢工失败是中共领导的错误”，“工人们应向中共要求赔偿损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甚至有些素来同情中共，因罢工而失业的工人领袖们对中共也表示怀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们因为你的领导而罢工，现在失业了，要请你负责。还有少数人向我说：听说你去莫斯科为我们募集了大量救济我们的卢布，为何不发给我们？幸好多数的工人领袖们还是信任我们的，因而这种挑拨并未造成严重的纠纷。

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的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进行顺利的时候，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出来。邓中夏对陈独秀先



生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倾向，指他“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

当时埋头编辑《向导》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满意陈这种言论。不过中共中央的会议这时是大大减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会议讨论；尤其是陈先生所写的文章，蔡纵然有不同意的地方，也无法加以讨论，只有仍然按时发表出来。我虽是饱尝罢工失败苦味的人，也不以陈的言论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点的暴露，就失去我们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但我们这种不同的看法，终未得着详细研讨的机会，因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齐爆发出来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间，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携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一个特别训令。根据这训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他的要求，立即筹备大会的举行。

我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工会的一些紧急问题，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时候，马林已赴广州，中共中央的人员也正在陆续前往。我于六月初赶到广州，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体均已就绪。

为了第三次大会的举行，中共中央临时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房子。我们中央的职员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里；大会也就以那里为会场。马林住在附近一幢较为华丽的房子里。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来，马林准备在广州作久居之计，他房子里的布置美轮美奂，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

我们的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这与前两次大会偷偷摸摸的在上海举行的情景显然不同。我到达后首先在马林的住宅里看到了共产国际那个著名的训令。它已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治批评

的自由；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我看完这个很短的文件后，马林即向我说明，他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曾组织一个由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这个重要文件就是这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草定的。他向我解释这训令的主要内含，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主要论断，所有的共产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训令中只是附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俾能接受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解释，认为依照他的解释，那是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马林对于我的反对意见立即发生强烈反应。他隐瞒着在莫斯科的讨论经过，不提在莫斯科已有过的争论。他在中国工作已有两年，自以为已有足够的权威来实施高压手段。他认为反对他的解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训令。这样，我与马林之间，就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在大会举行以前就在热烈的进行着，为了寻求相互间的谅解，曾使大会推延了一个多星期。争论的主要之点大致如下：

第一，我声言赞成国民革命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在事实上，当职工运动遭受二七罢工的失败后，中国反帝运动的怒潮正在激荡上涨之中。一九二三年三月间，曾发生收回旅大日本租借地的反日运动。四月间，津浦路临城土匪劫车，一些外国旅客被掳，外人盛倡共管中国铁路的论调，曾激起反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运动。五月初，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残杀中国人的事件，又激起了各地反日抵货运动。凡此一切，都是明证。我相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有其急切的需要，并能形成广大的革命势力。

我进而声称，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这即是说，除国民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职工运动，现虽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但仍有其本身的阶级斗争的任务。

马林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认为国民革命既是中心任务，就几乎包括一切，

事实上也能包括一切，剩下的只有中共的阶级教育。如果在国民革命之外，再强调阶级斗争，无异就是放松国民革命。

第二，马林声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是脆弱的。他讥笑我：“你的职工运动那里去了？早被吴佩孚几条枪杆子打垮了！”他断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他讥笑，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的工作，中共的存在不仅是没有意义，反会在国民革命中成了唱高调的破坏者。

马林这种论调使我大为愤怒。我指控他的论点违反共产国际历次的决议。我声言，中共的长成与发展是值得骄傲和满意的。它现在虽遭受打击，但将很快的爬起来，它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它经过较长期的艰苦奋斗，终将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更彻底的胜利。

第三，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比印尼的回教联盟要高明得多。他盛赞孙中山先生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认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深通马克思主义的人。三民主义是完全可以接纳的，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优秀的革命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即工人阶级中的优秀者，也大多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提出甚么按民主方式改组国民党等条件，中共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到那里去学习民族自觉。

马林这种对国民党的过高的估计，曾遇到陈独秀先生的反对，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点。我便指出马林只看见国民党的光明面，没有看见它的黑暗面。我依据一九二〇年我参加上海中华工业协会工作的经验，指出国民党分子流品复杂，缺乏组织和纪律，并说国民党如不认真改组，大量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也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第四，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实际问题，是我们争论得最激烈的部分。我指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

份对外发言，那还有甚么中共的独立呢？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些共产党人都涌进到国民党里去，要求分派一项实际工作，他们会说：“这些身家不清白的人是来干甚么的？是帮闲，是小偷，还是抢劫？”至少会被人认为是来挤掉那些老国民党员的地位。这样，名为国共合作，事势的演变，将是国共交恶。

我认为，国共两个不同的政党为了同一的国民革命，应更加紧联合起来，须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实际工作；但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意义了。但我这个看法又是马林所不能接受的。

第五，关于中共保留对国民党政治批评自由一点，马林表示中共党员应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对国民党的措施作必要的批评。如果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国民党进行批评，那就要是富于建设性的才行。我则表示中共党员为了国共间良好的合作，自然不能任意批评，尤其要避免不必要的指责和攻击。但一个共产党员经常要保持他那共产党人的面目，在国民党外固应如此，即在国民党内工作，也不可随声附和，丧失他共产党人的原来面目。至于中共中央及其各级领导机关，在政治批评方面不应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和有所顾虑。这一点双方意见出入虽然不大，但马林仍旧是不满意的。

第六，关于职工运动，我坚持它是中共所领导的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领导各地工会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但不能领导其成为国民党的职工运动。中共将在工人群众中大量吸收党员，发展中共的组织；一部分加入了中共的工人可以参加国民党，但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职工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职工运动。马林在这点上又坚决反对我的意见。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左翼。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我指斥他的主张是将“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硬要将中共已经领导起来的职工运动奉送给并不一定愿意接受的国民党。

从上述的这些争论之点看来，我与马林确是站在两个针锋相对的，不同的政治立场上。马林指斥我仍保留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国共建立联合战线



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这一基本政策。我则指斥他犯了右倾取消主义的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使之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这不仅忽视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也有害于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

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称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我向他声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即我一个中央委员，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他能将我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但现在主要之点是：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反对他这种歪曲的解释。我将“共产国际”和“马林”分开来的说法，使他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

在这次争论之中，瞿秋白和张太雷两个是支持马林的。他们在代表中展开活动，宣传马林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宜违抗这训令。瞿秋白还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是封建制度的统治，因而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这也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主要内含。我不同意瞿秋白这种说法，也与他展开争论。我认为中国主要受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制度已在没落之中，阶级分化日渐显明，因而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含是反帝国主义，但对内而言，除反封建外，则有工人阶级反中外资产阶级的主要因素在内。

陈独秀先生对于这种纷争觉得苦恼而左右为难。他大体上采取了李大钊先生在西湖会议中的调和立场；但他保持着作最后裁定的家长姿态。他从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职工运动经过二七罢工的失败，一时不易复振，这也证明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因而国民革命应由力量较雄厚的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只是其中的左翼。他不愿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也不相信马林会歪曲共产国际的训令；他也支持瞿秋白那种中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为主要内含的说法。但他也觉得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不能混为一谈，不同意马林对于国民党那种过高的估计。他还以多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工作后，将引起两党间许多纠纷为忧；因而他主张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只对马的解释作些轻微的修正。

经过互相协商互相让步的结果，我们间意见的距离虽然缩短了一些，但主

要之点还是无法弥缝。陈独秀先生提议：西湖会议只决定，少数个别共产党员根据中央的决定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应进而决定，全体党员均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但一部分共产党员可不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负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不应兼任国民党的职务，以免混淆中共的独立面目。同时，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起见，中共应帮助国民党增加工农党员，发展其在工农群众中的组织。马林对于陈先生的这种意见表示赞成。但我则表示只同意陈先生建议的前一部分，不同意他的后一部分。这样，这个案子就只好待第三次大会作最后的解决了。

这项争论成为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题。大会于六月中旬举行，共有十七位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代表党员约四百余人。大会开幕后，首先由陈独秀先生作报告。他的报告内容，是中共中央一年来工作的经过和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他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

在讨论陈独秀先生这个报告的时候，激烈的辩论便正式展开了。我在上面所述的具体的分歧点都一一被提出来了。支持陈独秀先生发言的主要是瞿秋白，他不承认中国有显明的阶级分化，他认为反帝反封建都是全民性质的，无产阶级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陈、瞿当时这种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论调，引起了不少代表们的不满。

我和蔡和森、毛泽东是反对陈、瞿这种论调的主要发言者。我的发言是概括性的。我说明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虽不多，但精干而又团结，必将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我强调中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职工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中共在现阶段中虽以国民革命为其奋斗的主要目标，但不能因此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共——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蔡和森的发言是陈述中共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的重要性。他引证共产国际已有的决议；不能因加入国民党，就牺牲这些原则性的立场。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

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上述这些争论之点，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中共第一个著名的农民运动者彭湃，于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就在广东的海陆丰成立了第一个农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他的工作已收到相当的成效。但海陆丰那时正在陈炯明的统治之下，一切消息不易外传，他的工作也未引起重视。陈独秀先生和中共广东区区委虽曾鼓励彭湃这种活动，但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未提到这项农民运动，而且还慨叹农民人数虽多，但太落后了，一时不易发动起来。

毛泽东当时对于彭湃的这种活动也是毫无所知的。但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毛泽东这种思想，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旁门左道，此地暂不论及。但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

这个辩论继续近一个星期，马林终于亲自出马参加辩论了。他向大会发言，表示支持陈独秀先生的报告，强调他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原有主张。他指责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他素来瞧不起农民，对农民问题更是只字不提。他最后用威吓式的口吻说：陈先生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

当时陈先生和我都曾企图经过协商以获得谅解，但这些努力终告失败。最后在结束这一辩论时，即以我提出的一个修正案交付表决。这个修正案是就未获得谅解的部分而提出的，其内容大致是：一、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须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并在工人中发展中共的组织；二、中共在职工运动中须与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和工会中的国民党员，密切合作。但工人中的中共党员，

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三、工人运动既是中共所领导的独立运动，中共虽不能阻碍国民党在工人中的活动和工人加入国民党，但不应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这个修正案付表决的结果，是八票对八票，于是担任主席的陈独秀的一票，起了决定的作用，换句话说，我的修正案被一票的多数所否决而宣告失败了。这个修正案的被否决，等于通过陈独秀先生的提案：中共应在工农群众中（尤其是农民为最），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当时，我们这些反对者认为，在农民中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还是无关宏旨的，因为中共在农民中尚无实力存在，至于在工人中无限制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就等于放弃了中共的主要阵地，这也等于取消了中共的独立存在的基础。

马林的主张终于胜利了，但他也知道这主要还是得力于陈独秀先生的支持，而且也觉得这种胜利是不够稳定的。他加强压力，大肆宣传我反对陈独秀先生的领导，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和破坏党内的团结，应当予以严重的惩戒。

同时按照共产国际的成规，持反对意见的人须向大会表明态度。我们这些反对者表示出来的态度，却不是完全一致的。首先，支持我修正案的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讽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继之而起的蔡和森则仅沉重的说了一句话：“服从多数的决定。”我则向大会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见。由于反对者所表示的态度程度不同，以及我强调保留原有意见，使一切攻击都集于我的一身。马林声言，我的保留意见意味着我仍将发表反对言论，将会引起党内纠纷，非予以制裁不可。

这时候，一位来自哈尔滨代表东三省中共组织的代表陈为人起而发言。他声称他投票赞成陈独秀的原提案，是表示对陈所领导的中央的信任，但并不赞成因加入国民党政策而牺牲中共独立的观点，也不相信陈先生会这样做。他诚恳的号召党的团结，要求陈尊重反对者的意见，他特别说到我不仅不应当受处罚，而且此后仍应负责领导工作。这位一直没有卷入争辩漩涡的陈为人发言态度非常诚恳，当即转变了会场的空气，使陈独秀先生觉得须适可而止。这样，马林的高压政策便无法施展了。

中共内部第一次意见分歧的大风浪过去之后，大会旋即恢复了平静，继续



讨论其他的问题。值得特别说到的是陈独秀先生还提出一个党团问题的提案，主张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内工作者都应组织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响。陈先生提出这个决议文的原意，似乎是要表示一下他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安慰一下我们这些反对者。其实代表们受着这场争论的震动，心情都有些不安，因而大会气氛也有些无精打采，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也就一致通过了。但后来它却成为国共纠纷的一个主题。

最后大会所通过的宣言，系表示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之领袖地位，并希望社会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来。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各项革命工作都是国民党工作的一部分”，这些马林所说过的很响亮的话，在宣言里并没有提到，这也是顾到党内的团结的结果。

中共中央改选的结果，我以落选的方式被排出了中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五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陈仍任书记，蔡仍任宣传，毛泽东则接替我任组织部长。

后来中共的记载多宣告我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或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被第三次代表大会开除了中央委员，这些记载多不免有些似是而非。我自信我上面所述是合乎当时真相的。现在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尚在人间者，除我以外，似只剩下毛泽东一人，如果他愿意保持历史的真相，他当不会否认我在上面所说的话。

在中共历史的发展上，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西湖会议不过决定中共少数人加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才进而采取在国民党内实现国共全面合作的政策。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历史家们往往着重描述这次大会的重要性，企图多方面证明共产国际领导的正确。

其实，这个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论从那个角度上看，都不能说是恰当的。在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虽然因这一政策的执行获致可观的成就；但不能证明如果国共合作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至于国共混合终于招致了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使中国陷于内乱和外侮交相煎迫之中，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共两党，都陷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

后来，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国际还以“天子圣明”的态度，强调这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正确；并诬指一切错误都出于中共执行之不当。许多记载往往说共产国际主张中共采取加入国民党，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只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在执行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时，放弃了领导权的夺取，才使中国革命归于失败。同时也批评我初期反对这政策的主张，是不愿去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犯了左倾的错误。其实，当时所讨论的，是中共应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在这里，恕我要批评瞿秋白几句，他有点舞文弄墨的积习，在那次大会中他极力为马林的主张找理论根据，因而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瞿氏这种议论发展下去，可能比马林还要右倾，即是说中共根本无存在的基础。可是他在后来继陈独秀而领导中共时，再也不提他过去有过的主张，断章取义的说他人人都错了，都是机会主义，只有他自己正确，即是他主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其实“国民革命”和“国民党”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两个政党（例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先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怪不得当时汪精卫就曾说过，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指导，事实上是很混乱的。首先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些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只知“国民革命的重要”和“革命势力必须集中”这两个空泛的原则，不顾国共两党的实情，硬要将它们混合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还强调中共的独立性，但后来似受着越飞、马林等人的影响，它的四月训令显然改变了方向，认为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是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独立性却成为次要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的四月训令是中共趋向右倾的起点。

马林个人的见解比共产国际的训令还要右些。他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

作的要人身份，在广州长住下来，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之实施。可是他不够幸运，遇着了重要的障碍。国民党方面对他的主张似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最感兴趣的，只是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点，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当前的急务。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国民党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马林的主张虽大体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但却从未实现过。在我看来，即使实现了，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国民党一般老党员多具有门户之见，他们对党内的后起者也往往抱有轻视的观念，即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完全放弃原有的共产色彩，循规蹈矩的为国民党工作，也不免要被视为是身家不清白的异端，那里会允许他们在国民党内自由活动？而且一般共产党员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还是原具有国民党籍而转加入中共的。当他们过去在国民党时，多对国民党的成规表示不满，现在这些中共党员又都加入到国民党去，那里会做安分守己的“小媳妇”？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说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观的幻想。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主要政策的正确性。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共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味着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

们的主张被搁置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与权势。如果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形成正常的多党的民主制度，这样，也许中国的现代史就会换一种写法了。

瞿秋白三大中央委员问题的质疑^{*}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同志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一九二三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根据一些有关历史资料，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是否被选为中央委员的问题是值得质疑的。

一、一九三五年瞿秋白牺牲前写的《多余的话》并附有生平年表，文中没有谈到他在党的“三大”选为中央委员的事情，却明确说明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据党的四大中央委员名单记载，这是确实的。

二、一九五七年苏共中央移交给我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俄文文献，记载三大的中央委员是陈独秀、（罗）章龙、谭平山、毛泽东、王荷波、项德隆、朱少连；候补委员是：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邓培、张良工（音译，即张连光。——编者）文件对中央委员记述的不全，但在提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没有提到瞿秋白。

三、据瞿秋白一篇记述有党的三大情况的文章中，详实地记述了党的三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不仅说明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而且还附有每人的当选票数：陈独秀（四十票）、蔡和森（三十七票）、

^{*}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第五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李大钊(三十七票)、王荷波(三十四票)、毛泽东(三十四票)、朱少连(三十二票)、谭平山(三十票)、项德隆(二十七票)、罗章龙(二十五票)，以上九名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以上五名为候补委员。

根据以上三个资料，特别是瞿秋白记述有关三大内容的文章中，全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中，没有瞿秋白。关于瞿秋白被选为三大中央委员的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罗章龙谈“三大”会计*

我党三届中央局常委分工中，设有“会计”一职，为其他各届所无。为究其原因，我们特走访了当年曾任过三届中央会计的罗章龙同志，据他的回忆，整理如下：

关于三届中央设有“会计”一职，很多同志也询问过我，这要从党的经费来源说起。

“一大”前，各地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党员自筹，李大钊就经常把薪资收入的大部用作党的费用。北大学生很早就有自筹经费的传统，当时许多社团和互助团体如曦园等的活动经费都靠自筹。学生缴纳党费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向各报馆投稿的稿酬，以及学生所在各省、县会馆的资助和家庭的接济，省吃俭用后的节余。当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收入颇多，也较稳定。特别是合订本出版后就可收入一大宗款项。他每月除开支李汉俊一百元编辑费外，其余均存入亚东书局，由陈亲自掌握，用以支付党的活动费用。但总的来说，经费数目不多。

“一大”后，党的经费来源多了一些，除党员须缴纳最低限度的党费外，对于有固定收入的党员，还派定他缴纳超过规定的党费，类似于所得税一样。到了“三大”后就改为党员自觉地缴纳而不作派定了。而这时已有了第三国际的支援，各种渠道汇集来的钱也多了。除第三国际外，赤色职工国际、互济会（总部设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国外团体，都有钱汇来，

*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第六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这笔款数加起来就可观了。此外国内罢工胜利筹有工会基金，如安源和北方铁路工会都有自己的金库，可以互相调剂，支援罢工募集的款项为数也不少。“二大”后，党报《向导》周刊销路亦大，也很赚钱，当时向党报投稿一律不付稿酬，刊物收入也就多些。还有党经营的“上海书店”、“广州人民出版社”等都有一笔收入。“二大”决定，由委员长总理党务及会计，因此凡是汇交中央的，或由中央支配的经费，都由陈独秀掌管。陈平日节约，也最恨贪污，一切收支他都要亲自经手，从不放手别人去干，因而不免为一些好事之徒所忌恨；加之党外的攻击，不少流言蜚语，说他十分阔绰、挥霍浪费等等，实则并无其事，他自己也很恼火。

“三大”会时，国际代表向他建议，在中央设立会计（Cashier）一职。当时的会计不同于现在一般的会计，它要管理全党财政行政，包括收支、预算、决算以及监督使用等，与以前不同之处，是把全党的财权集中，各省各地方的财务也置于中央的监督下。大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我记得毛泽东同志也很赞成，认为如果没有专人负责和建立制度，将会流弊无穷。会议决定设立“会计”职务，由中央常委担任，并郑重其事地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上。其中提到的“财政行政”即“财务行政”之意。但近年有些人却分为财政、行政，意思就走样了。在常委分工时，决定由我担负“会计”一职。我感到突如其来，觉得自己缺乏理财的本事，不适合这一职务。过去多次领导罢工时，募集罢工基金虽也是数以万计的款项，但北方书记部有规定，书记部人员不参与经手现金款项，只是监督使用，不直接理财。陈独秀特意找我商量，他说：“你不负此重任，我就不能脱身。”言词极为恳切，他当时确实很忙，财务收支要占去他很多时间。我经权衡后，对他说：“为了能使你脱身，以大部精力来统筹全局，我当勉为其难把这一工作承担下来。当然这也是暂时做做。”我向他提到在唐山、天津罢工时的经验，主要在建立好制度，有具体人负责，有账目可查，中央起到审核、监督作用，不必亲自理财。他也同意，并提醒我注意吸取安源的教训。

我接受这一工作后，以建立健全财会制度为主，有制度可循，慎选贤能，即使出现差错或贪污，也容易查获。这些制度包括全党的预算、决算和监督使

用等，当时管辖的部门很多，有书店、印刷厂、刊物和各地汇集的党费及其他收入，我们在银行中以代号立有户头，提取款项要有会计的签署和印鉴，特别是国外支援都是通过苏联银行系统支付，统一办理，以公对公，不能由私人收授。如国际支援，均先交付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或上海、广州苏联领事馆，将款项以支票发给我们有户头的银行，我们在支取时，要由会计审定凭中央的印鉴支取。一九二四年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离国时，财务制度已基本确立和完善，这方面的工作改由任作民接任。他新从苏联学习回来，为人忠实可靠，并有制度可循，工作也无困难了。“四大”后，中央机关扩大，设立组织部，由总书记兼管，党的财务行政亦愈走向正规，不似“三大”时那样突出。这部分工作归口于组织部，不再在中央常委分工中专立会计一职。

在“三大”期间，下边虽也发生过一些小量的财务上的贪污和挥霍现象，但有制度和账目可查，很易发现和纠正。到了武汉政府时代，党的经费收入更大，中央有武汉政府拨款，各省也由省政府拨款，如湖北、江西、广东、湖南等省，各省经费也自筹自用。陈独秀长期不在武汉，经费不能集中、统一使用，下面也不严格执行制度，随意挪用，不免也有些失职现象。

（雨 平整理）

党的“三大”不存在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易兵在《党的“三大”有没有“左”的错误的一个分辨》一稿中认为，在党的“三大”上不存在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更没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易兵指出，据张国焘的说法，他确实始终怀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个政策的正确性，认为“党外合作”比“党内合作”要好些，但是，他又不能不遵守1922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所以他没有再提反对“党内合作”，只是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大批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易兵举出中共“四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的有关内容，说明张国焘的说法基本符合事实。该决议案说：“到了第

*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三次全国大会（1923年）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们有加入国民党的必须，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惟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当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参加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易兵认为，张国焘反对全体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也并非“左”倾错误。“三大”以后的实践证明，由于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大批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以后，在党员队伍和工人队伍中，确实发生了思想混乱、阶级调和的危险，出现了取消工人运动的错误倾向。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上述错误，“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之危险”，“四大”《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作了新的规定：“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

——张国焘给维金斯基、穆辛的信^{*}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亲爱的威金斯基、穆辛同志：

你们二位给我的亲笔信，我已先后收到。我非常感激你们对我应该如何在国内进行工作的忠告。同时，也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经常地、全面地把中国的情况写信告诉你们。因此，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很可能会对我产生误解。

当然，要我用我的观点来全面地回答你们二位信中提出的一切问题，这对我恐怕太困难了。因为我的英语很差。不过，我将尽力简单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 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当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到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我们许多同志

^{*}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没有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清楚。为了阐明我和我的对立面之间的意见分歧，可以把我和马林的观点，作一个比较。

马林的观点如下：

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不错，中国的劳动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都还太年轻，太软弱，目前在中国只能开展国民运动，国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这些我们都同意。但是，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吗？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存在吗？中国的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吗？这些就是我们所怀疑之点。

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对立面的同志就叫嚷说：“要忠于国民运动。”“不要怕国民党，劳动运动不会在国民党内迷失方向的。”他们不以客观分析，而是用许多这类主观的辞句表达他们的意见，以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甚至有些领导同志也说出这样明显的错话，如：“中国没有劳动运动。所谓劳动运动实际上就是国民运动。”“谈论阶级斗争就是破坏国民运动的统一”等。由此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被曲解到何种地步。

我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要论点是：

（一）中国的民族运动受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同其它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埃及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还谈不上已经有了一个纯粹的民族运动。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而这个运动却多少被美国帝国主义所利用。现在的民族运动不但不反对美国和大英帝国，反而出现了一种保护他们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一直

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则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

（二）中国资产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及商人），在各方面仍然十分依赖外国资本家，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即使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除了反对日本的压迫之外，还远不是一支反对外来压迫的自觉力量。

（三）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

（四）我们不能指望，一场意味着反对世界上所有列强的民族运动，会轻而易举地到来，这是需要几年时间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不可能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产生。再说，工人已经有了相当力量，它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运动的一个强大因素。

（五）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

（六）因此，当前我们共产党人首先要对国民革命的思想继续进行一般的宣传，特别要做大量的工作，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然后下一步，我们再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组国民党，或采用其它任何形式使我们参加到联合的国民运动中去。

（七）与此同时，我们将留在国民党内，为国民党组织支部，并设法改组国民党。这就是说，我们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或者一般地讲，是为国民运动寻找新的动力。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但它和上述的第六条同样重要。有人提出：马上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如果失败了，就离开国民党，哪怕是短时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再呆几年，因为我们要使国民党做些事情。

（八）由于国民党还没有进行改组，它仍然集中力量于军事行动和组织政府，我们共产党一方面要作为一个独立地对我们关于中国目前时局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的组织而存在，另一方面，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的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

（九）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同时，我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还不明确，也许从一开始，工人队伍就是联合的国民运动的左翼。所以，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只有在广州和汉口，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不得不在国民党内进行。

这里我还要向你们指出几点：

（一）前一阶段，我们的同志过多地期待国民运动的统一。可是国民党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因此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现在只能说为国民革命创立某种基础，从而为其打开新的局面，然后再把各种不同因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的国民运动。

（二）事实告诉我们，组织一个真正的中国国民政党还需要几年时间。首先要做许多初步的宣传工作。中国人民，甚至革命者，至今还没有感到组织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把革命工作看得非常狭窄，认为只有军事行动才是革命工作。孙中山先生本人一直坚持他的陈旧观点，认为革命进程首先是军政，然后才是训政阶段。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认为，首先他们必须掌权，然后再建党。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有作为的党，它的领袖们首先必须完全放弃组织政府和搞军事行动的主张，诚恳接受首先建党的思想。在国民党的领袖们还没有放弃其陈旧观点和老一套的行动方式的时候，苏维埃俄国却去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是决不会成功的。一旦国民党在反对北方军阀和陈炯明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孙中山就会马上被他自己的将领们所抛弃，广州政府也就会马上彻底垮台。所以，对广州政府的支持不但毫无价值，反而会延误国民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当国民党遭到失败，放弃旧的主张并接受新的做法后，方可给予支持。

（三）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改组国民党，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这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就认为：“自上而下的改组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组。”在我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会

目前正热心于组织一个国民革命青年团。最近我收到陈独秀同志本人的来信，说他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而且，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而是现实状况造成的。

（四）当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传到上海时，我正在那里。上海市党员大会开会讨论了这个宣言。我在会上发表了以下几点看法：“宣言中计划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可能立即组织好。我们一方面必须宣传关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并且坚持不懈地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要赶快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并深入到地方的国民运动的组织中去，以便完成宣言中所提出的计划。”虽然一些同志认为全国代表大会应立即召开，并认为我的意见是“破坏”（“破坏”这个词在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出现），但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大会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清楚地表明，当我们着手进行某种政治运动时，每个中国同志就会懂得，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是何等重要。这同组织或改组“国民党”一样重要。我们不能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党产生之后，再去着手组织工人和农民。

（五）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幼弱，如何不能把工农组织起来。是的，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仍然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所以现在只能促使幼弱的共产党来承担这双重任务，及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党和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

不过，现在形势起了一些变化，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上面所说的，只是这个问题在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的概况。上周以来，得到这样的消息：国民党将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上封信中提到，想给你们写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现在我想把这篇文章推迟一下，改为同你们讨论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据悉，要求各省派六名代表参加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于广州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六名代表中，三名要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名由各省的支部选举产生。



在上星期一举行的北京市党员大会上，我就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我把报告的要点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些要点可以表明我对大会的看法。我报告的要点如下：

一年前，我们所要求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两个月以后举行。虽然我们还未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这件事的通知和指示，但是我们必须抓紧进行讨论并作好准备。

代表大会是否能如期召开，这取决于广州的战局。可是，关于广州战局的现状如何，前途如何，现在北京没有人能说清楚。

这次大会能否成功，确实难说。不过，据说每省只派六名代表，那么这些代表可能多数是国民党的将官，能代表普通国民党员思想的代表极少，故而会议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求增加代表名额，尤其象广东这样的省份，名额应增加得更多些。我们应该提议：国民党的知名党员，那些虽不是国民党员、但却是国民党的朋友的革命者，以及各种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团体的代表，都应被邀请出席这次大会。这样的结果，就会增强群众对大会的影响。

其次，我们必须要求国民党在各地的党员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国民党所有的报刊都应该动员起来讨论和宣传这次大会。尤其是我们党的报刊，应该立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邀请一些进步的国民党员和非国民党员的革命者，一起为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草拟一个纲领，并把它提交大会讨论。这次大会将表明我们同国民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假如我们这个纲领被大会采纳则很好，如果不被采纳，那些和我们一起起草纲领的革命者，就会作为国民党的左翼，同我们站在一起。

此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至少要把首先用武力攻占一省，继而攻占多省，然后再发展国民党的主张，改变成首先组织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然后再进行革命。这就是我们对这次大会的主要要求。

北京市党员大会已采纳了我的报告，并决定报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推选我草拟前面提到过的纲领草案，作为下次地方党员大会讨论的基础，

然后再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最后决定。

关于这个问题，这里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从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但是由于近来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无法告诉你们确实的情况。

二 我们党的目前状况

在这次广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马林在祝贺大会成功时一方面说，大会排除了在解决党的组织问题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他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障碍”不仅没有“不合作”，没有搞“破坏”，相反，他们仍然同过去一样积极工作。如果马林真的把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些“障碍”排除了，我不知道他将会如何地向那次大会的成功表示祝贺呢！

代表大会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象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那时，我们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反对上届代表大会和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由于我们的帮助，使这种情绪平息下来了。因此我们深深懂得，我们幼弱的党根本经受不住这种打击。

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热烈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有些同志根本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且他们在那次激烈的讨论中，不去避免产生困难，甚至还在会内会外利用我们党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纠纷，对我进行攻击。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样谈论我的。我要公开地答辩：“的确，由于我们年轻，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甚至于犯过一些很愚蠢的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将来也决不会犯。”

你们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穆辛同志甚至还表示相信我不会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确实，我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维护我们幼弱的党的团结的。我决不会亲手损害我视为自己生命的共产

主义事业和从一开始我就参加的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的说来，党的三次代表大会并未给我们党带来任何困难。至于某些支部出现的一些小纠纷也只是因为我们党的组织还不够完善、党员太年轻又有些个人主义的东西所致。最近我们党的工作没有多大进展，因为遇到了诸如缺乏办法等实际困难。有些决定，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没有贯彻执行，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受到了同志们的阻拦。现在，根据我自己的看法，简单地向你们谈一谈关于我党的工作情况。

自从我们代表大会决定了同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以来，我感到我们党的机关现在并没有加紧宣传工作，也没有对国民党问题提出什么要求。甚至对于我们党公布的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也没有作什么宣传，我们党的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譬如长沙支部，这是我党最好的支部之一，也由于战局的影响，和长沙工会一样，都处于几乎无法开展活动的境地。

长沙支部领导机关遭到了军阀赵恒惕的镇压。汉口外交后援会过去是反日的民族主义组织，近来已把矛头转向英帝国主义。我们在汉口开展国民运动多少还得依靠它为基础，可是最近它也遭到了湖北督军的镇压。

有些地方的工会运动有了进展，但由于我没有得到全面的消息，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确实情况。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危机。上海一些或多或少反对我们的工人领袖，打算举行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当然，有些政客是支持这些工人领袖的计划的。我们也打算召开这些代表大会。但我们是否能同他们顺利合作，目前还很难预料。交通系的政客和张作霖大帅以及其它一些人，正企图利用工人反对其反对直系斗争效劳。有些工人领袖也想从某个政客身上寻求支持。倘若这些工人领袖一方面同某些政客或张作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末这在今后很可能会成为分裂中国中部和北部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些领袖尚未和任何政客有任何联系之前，我们要委派两名同志去奉天揭穿他们的企图。过去我们因为派同志去奉天而犯过错误，因此，现在我们也许还会受损失。

最后，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我们看到出席党的三次代表

大会的同志们对政治问题都能切实地积极讨论，这表明了我们党在成长。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在大会上多次提到这点。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年轻的、赤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革命者组织起来的，是唯一具有远大前途的党。我希望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给我们以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对工会运动的支持，以使中国革命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现在再说几句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我现在在北京工作，我的任务是编辑北京《劳动周刊》，每周的发行量为二千五百份。同时我还担负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政治委员会工作，并在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个委员会里工作。我还经常为我们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报刊写些文章。可是我现在不是党的专职工作者，所以还得抽些时间搞自己的事务。我个人动用的一部分共产国际东方部为购买中国刊物寄来的款子。当然，我将尽快于短期内归还，并且要给你们多寄些刊物。我每两周给你们寄一次刊物，寄去的刊物想均已收到。

希望你们能给我寄些书刊来，并告诉我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希望你们能马上给我回信，对我上面写的问题，请多多提出批评。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张国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

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

1923年春，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形势变化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并就此掀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为此，中共中央机关也从上海迁到了广州。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到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罗章龙、何孟雄、陈潭秋、向警予、徐梅坤、邓培、冯菊坡、阮啸仙、朱少连等40人，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

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共举行了7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中共六大是在

* 苗体君、窦春芳，《党史纵览》，2008年第8期。



莫斯科召开外，其余 6 次都是在国内召开的，而且中共一大、五大、七大等会址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修复，而中共三大会址由于在 1938 年毁于日军飞机轰炸中，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时间内，人们都不知道中共三大会址在广州的具体方位。直到 1972 年 10 月，一个叫徐梅坤的浙江萧山人来到广州实地勘查后，中共三大会址才得以确定。据现在的研究来看，当年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至少有 40 人，并非过去史学界的传统说法有 30 多名代表，徐梅坤就是当时出席三大的代表之一。那么，徐梅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党员

中共一大前后，党员成分大部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就是从法国回国的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等人，及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人，他们也都是知识分子。当时中央局的负责人陈独秀对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一个工人入党而感到很是遗憾。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独秀通过《民国日报》编辑部的邵力子结识了徐梅坤。

徐梅坤，1893 年农历七月初一出生于浙江萧山长山镇（今属新街镇）富星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0 岁时就开始到酱油店、订书作坊做工，16 岁到浙江省官制印刷厂当学徒。因为不识字，一开始他只能学浇铅版，后来，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识字，经过努力当上排字工。1920 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浙江印刷公司当工人的徐梅坤为了能把杭州的印刷工人组织起来，多方奔走，联络工人，终于在 1920 年七八月间，与倪忧天共同发起成立了杭州印刷工人团体——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徐梅坤担任互助会宣传股长。12 月，在浙江一师革命师生帮助下，徐梅坤还创办了浙江工人的第一张报纸、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曲江工潮》，这是一份小型的工人报刊，每月两期，公开发行，每期印数约 200 份，总共出版了十几期。

1921 年 1 月的一天，浙江印刷公司总经理的一个亲戚无故打了一个学徒工，引起工人们的愤慨，徐梅坤就以公司互助会的名义要求打人者向被打的学徒工道歉，但被总经理拒绝。他便号召工人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 40 多天，最后导致印刷公司关闭，徐梅坤遭到通缉，于是，他回到了家乡萧山。

当时，萧山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全国较早的农民协会，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减租抗捐斗争。徐梅坤回到家乡后，积极联系周围许多乡村，用城里工人罢工的事例鼓舞乡亲们的革命情绪。他还在乡里初步建立起有二三十人参加的农民组织，领导农民共同抗租，交“对折租”（原租每亩一石二斗，只交六斗）。最后，地主豪绅被迫同意了农民的要求，斗争取得了破天荒的一次大胜利，徐梅坤也因此在家乡遭地主的嫉恨。后来，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帮助下，到《民国日报》当排字工。当邵力子向陈独秀介绍了徐梅坤的情况后，陈独秀很感兴趣，就派张秋人找徐梅坤谈话。后来，在上海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寓所，徐梅坤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1922年，徐梅坤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历史上较早的工人党员。

徐梅坤入党之后，就向陈独秀建议：印刷工人有知识、不是文盲，比较容易开展工作，应该先在印刷工人中筹建工会。陈独秀同意了他的建议。他又主动向陈独秀提出去商务印书馆开展工作。经陈独秀介绍，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并在那里认识了沈雁冰（茅盾），后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入了印刷厂。不久，徐梅坤动员一个照相制版工和一个绘图工加入了青年团，继而又发展、吸收商务编辑所的一名工人入了党。此后，上海的四大书局：商务、中华、世界、大东都先后有了中共秘密组织。随后，徐梅坤又发起成立了以印刷工人为主体的工人群众团体“旅沪工人同乡会”，有400多人参加，他担任了该会的理事长，会址设在浙江北路华兴坊24号。他还前后发展了王梅庆、陈宝延、蔡林生（蔡和森的哥哥）等8名基层工人入党。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还介绍了两位女工入党，其中一名叫王根英的女工后来与陈赓结婚，她也是我党早期少有的女工党员之一。1922年底，有2000多名印刷工人参加的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立，徐梅坤被推选为印刷工会主任。1922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与徐梅坤联系后，还暂留上海一段时间帮助他搞工运工作。此后，徐梅坤与其他同志组织了上海邮政局、金银行和英美烟草公司罢工。他不仅脚踏实地地抓好上海的工人运动，还曾专程去杭州建立党组织，任杭州党小组小组长。除了杭州外，徐梅坤又到浙江绍兴、宁波活动，经他发展的党员中有印刷工人、纺织工人、

中小学教师，还有大学生，为后来中共浙江省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共二大后，党中央在全国改设了4个区委员会：北方区、两湖（湖南、湖北）区、广东区、江浙区（兼上海）。徐梅坤被推选为江浙区兼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此时，他的公开职业是上海光明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借此机会，他还兼管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印刷出版工作。他通过贿赂光明印刷所的老板，操纵印刷，然后将成捆的印刷品交付“民信局”运往各地，从而越过邮政检查。当时，《向导》的编辑工作由陈独秀、蔡和森负责，撰稿人有李大钊、张太雷、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等，后来，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带着儿子毛岸英避居在上海，寄居在蔡和森、向警予家，也为《向导》撰稿。徐梅坤每次去蔡和森、向警予家取稿件时，常常见到毛泽东夫妇。后来，徐梅坤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杨开慧每晚要去小沙渡工人夜校上课，因为路不熟，都是由我顺路陪她去，到10点左右我工作结束再陪她回家。有时我就住在毛泽东家里，晚上同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谈个没完，很愉快，他们各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对我的帮助不小。”

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徐梅坤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偕同王振一代表江浙区出席会议。他从上海乘英国轮船“怡和”号前往广州，同船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邓培、孙云鹏、王峻等人。在途中，徐梅坤常到李大钊的舱位里跟他交谈。当时的船不能直接从上海到达广州，途中还要在香港停留一天。船到广州后，广东党组织派人在长堤码头接他们。三大的主旨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徐梅坤在中共三大上也发了言，他提出应该重视农民革命问题，瞿秋白、毛泽东同意他的观点。但国际代表马林对农民问题却不感兴趣。徐梅坤还在大会上直率地批评了张国焘搞小动作拉帮结派的行为。最后在选举中，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等9人被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李汉俊、徐梅坤等5人为候补委员。

三大后，徐梅坤奉命在上海组织了中共第一个秘密特工小组，专门惩治工贼及叛徒。他们从外滩的洋水兵那里买来了4支手枪，加上几柄消防队用的小

斧头作为武器。大革命失败后，这个特工小组被交给周恩来改建成“红队”，俗称“打狗队”，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共特科。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当时，徐梅坤正因病住在宝隆医院，他知道要游行示威的信息后，就偷偷溜出病房，带病加入了上海大学的游行队，只隔了一天，他又抱病参加了上海总工会成立大会。

1925年12月，中共江浙区委以罗亦农为区委书记，汪寿华为工人部长，加上赵世炎、徐梅坤等4人组成核心小组，这就是传说中的所谓“四大金刚”。因为徐梅坤的年龄比罗、赵、汪恰好都大了8岁，所以，徐梅坤又被称为“小老头”。1926年到1927年，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组织指挥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7月，徐梅坤奉命到宁波、余姚、定海等地组织武装斗争，不料，在搭乘浙江余姚至绍兴的汽车时被暗探跟上，在萧山家中被捕，关押进浙江省陆军监狱。他先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无期徒刑，后经邵力子等营救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由于徐梅坤的被捕，其萧山的老家也被洗劫一空，家里的房子也被贴上封条，他的父亲和二弟徐照坤被抓走，他的母亲和弟媳被赶出家门，沦为街头乞丐。

徐梅坤被捕后，上海党组织和党内许多同志通过各种关系设法营救，但均没有成功。徐梅坤在狱中被关了7年零7个月，后来因病获保外就医。出狱时，他瘦骨嶙峋，已经不能走路了，是乡亲们用担架把他从狱中抬回萧山的。出狱后的徐梅坤依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监视着，从此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脱党。后来，受沈雁冰的委托，徐梅坤在上海的大弟弟徐经坤回乡，偷偷地用船把徐梅坤接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徐梅坤继续干自己的印刷老本行，印刷出版了当时上海的党报《解放周报》和《共产党宣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以及一些抗日宣传品。

抗日战争时期，徐梅坤于1939年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他把自己在狱中的一些情况如实地向党做了汇报，表示希望尽快回到党组织里来。周恩来当即对他说：“你暂且不回到党里来，在党外多做些工作，也很好，我相信你有一天能回到党内来。”后来，徐梅坤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继续留在党外，一直为党工作着。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决定炸毁杭州钱塘江大桥及其他一些重要设施，



为此，国民党当局还逮捕了不愿意破坏城市的三名官员，调周岩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为了阻止周岩对杭州的破坏行动，徐梅坤通过关系找到了周岩的父亲周宪达，又找到了国民党杭州市政府秘书长徐雄飞的朋友分别做工作。最后，促使周岩把炸药包埋在离大桥主梁稍远的第五孔处，炸药包爆炸后破坏性不大，事后经过三天的修复就通车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梅坤来到北京，周恩来、陈云等人对他的生活工作都十分关心。1952年9月22日，徐梅坤收到由周恩来签发的任命通知书，任命他为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参事。1955年2月8日，徐梅坤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54年，徐梅坤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党籍，党组织曾对他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调查，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1981年6月8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已88岁高龄的徐梅坤老人，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龄从1954年算起。1997年1月17日，徐梅坤在北京病逝，享年104岁。



三大之后重要会议及主张

- ③ 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 ③ 三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 ③ 第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
- ③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 ③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
- ③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研究贯彻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

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于1923年9月初由广州回迁至上海。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加入后，仍保持团的独立性，同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此后，大部分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建立的强大推动力。

1923年9月，受苏联政府委派，鲍罗廷作为驻广州常设代表具体指导国民党改组工作。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其后不久，孙中山决定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政治顾问，并委任廖仲恺、林森、谭平山等九人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

为了进一步研究贯彻党的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央局委员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等四人，驻京委员李大钊，驻鄂委员项英，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一共八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共有十项议程，即：中央局报告“三大”后进行事项；各委员报告地方工作情形；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劳动运动进行方针；教育宣传问题；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准备事件；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陈天党籍问题；胡鄂公等党籍问题；党证问题；中央局会计报告，等等。

对“三大”以来执行决议的情况，这次会议着重做了讨论。会议听取了中央局的报告，随后，各委员也分别报告了北京、湖北、上海、湖南、山东、哈尔滨、广东七个地区的国民运动、劳动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党务工作

^{*} 陈峰、高敏：《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情况。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向会议报告了工作情况。

经过认真讨论，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目前党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政治上，要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在组织上，要努力扩大国民党，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今沈阳）、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会议还强调指出：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

此外，会议还讨论决定了如下问题：

其一，关于第六项议程：会议决定催取各地方对于党纲草案之意见，鉴于原选出代表张国焘失踪，届时由中央局另派。决定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其二，关于第七项议程：会议决定开除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等四入党籍；由于张绍康、陈天均已登报脱离，亦应同时开除。

其三，关于第八项议程：会议决定，在未能证明胡鄂公确未帮忙贿选以前，仍旧停止出席小组会议；熊得山、汪剑侗因与胡鄂公有连带关系，亦应同样办理。

其四，关于第九项议程：对于党证问题，会议决定暂行从缓。

这次会议对贯彻落实“三大”的正确策略方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较“三大”前进了一步。此时，虽然同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历史很短、人数很少的政党。尽管大多数共产党员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但是共产党通过上述办法，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三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进一步推动国共双方能圆满合作，并敦促国民党
切实执行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定的章程及相关决议案^{*}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共双方能圆满合作，并敦促国民党切实执行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定的章程及相关决议案，1924年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

经过热烈讨论，这次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该决议案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认为，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只有实行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方能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因此，决议案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工作时，要更加努力扶持国民党，不可因其以往的缺点，就予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不应有不屑与之伍的成见。决议案强调指出：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我们的同志均应努力工作。只有共产党在国民党能尽所职，引起国民党员都能尽职，使其成为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之目的才算达到。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应采取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驱左为右”。

决议案提醒全党同志，对于国民党一大的圆满结果，不可过于乐观。但是，决议案也同时提出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中的“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实际上是没有完全认识到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主张对国民党右派调和、退让。决议案还强调提出，党以后的一切实际活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这些主张，在实践中无形助长了党的工作中右的偏差的发展。

三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召开表明，党在克服国共合作问题上“左”倾情绪的同时，党内右倾思想有了某些发展。

^{*} 陈峰、高敏：《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第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

——进一步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正确领导，
巩固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积极推动下，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国民党逐渐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革命形势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工农运动有复兴和发展，反帝民众运动也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常有发生。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革命阵营中逐渐涌现了一大批军事斗争骨干，这些，都预示着国民革命高潮的行将到来。

在此背景下，为总结国共合作实现以来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正确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正确领导，巩固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十人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代表中央局作了工作报告。报告分组织、宣传、政治运动、劳动运动等四个部分。报告指出，党对国民党关系的政策应该做到：向左倾分子宣传，使他们左倾观念坚固不至摇动；向国民党员中工人学生宣传，使之左化；努力介绍革命分子进国民党，以增加左派的势力；向社会广泛宣传反帝国主义，以迫使国民党全体左倾。在讲话中，陈独秀总结了党的三大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以来党的各项工作，检讨了工作中一些偏差，并专门就自己的“大家长”式的工作方式问题做了反省。作为反省的具体表现，陈独秀拒绝担任此次会议主席。

这次会议着重深入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问题。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深入检讨此前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如：党在国民党的工作偏重于组织，甚至于大部分中央执委都到国民党中去工作，而党的会议停止，有许多问题拿到国民党中去解决，等等。大会指出，国

^{*} 陈峰、高敏：《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民党内的一大部分党员的阶级利益与劳动平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国民党内必然会出现左右派之争，而中国共产党又是国民党左派的基本队伍，党当前一方面要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出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另一方面，则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为做到这一点，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经常不断地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在当前宣传更重要于组织，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产业工人要赞助国民党左翼，同时反对国民党右派思想对工人的影响。应当使“国民党的宣传政策注重反对帝国主义”。会议特别强调，应当使国民党特别注意军队里的宣传，并使国民党注意去调查国民党势力与北部及中部的地方势力相结合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要求国民党实行废除额外苛税并禁止大地主对于贫苦佃农之过分的剥削。

其二，工人运动新的责任问题。会议认为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虽少，但这些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只有联络这些工人，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会议认为，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运动，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党的最重要的责任，便是继续不断地在产业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通过发展会员的阶级意识，抵制国民党右派思想在工人中的影响，使工人的日常斗争和切身利益结合起来，逐步发展成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委员会的工农部内均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

其三，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和党与团的关系问题。会议指出，在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内工作，党更要有非常之明显的组织形式。会议提出，我们的任职，便在于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使党不但成为“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唯一组织”。会议决定在中央、区、地方各级委员会，都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会议还明确了青年团的责任。

其四，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在此之前，党的三大决议中曾指出农民群众是国民革命最有力的动力。会议重申了这一论断，同时强调：中央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并要求国民党做经常的有规划的农民宣传。

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

各项决议的内容来看，这次会议初步检讨了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工作中出现的右的偏向，并就实际工作中如何纠正这些右的偏向，作了相应的规定。会议明确认识到劳动运动尤其是现代产业工人运动是党的根本工作，开始注意农民运动，并纠正了党和团的关系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到青年运动也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与此同时，通过这次会议，党对国民党的工作也有了较为正确的答复，就是应以宣传工作为主，组织工作次之。同时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分开，也就是把共产党的组织独立起来。这就使党认识到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性。这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国民党左派力量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为党的四大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当然，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这次会议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会议所确立的在国民党内以宣传工作为主、组织工作次之的工作方针，明显地存在着放弃领导权的错误倾向。此外，会议在肯定工会运动独立性的同时，却不正确地指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最好的帮助，在工会方面并不是帮助它设立国民党的铁路工会及矿工工会，或者使已成立的工会全体加入国民党，而是先组织纯粹斗争的工会，于必要时，指挥这些工会赞助国民党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个论断又明显具有“左”倾的色彩。这次错误倾向的存在，表明了党还是处于一个幼年时期的党，还是一个处于艰辛探索阶段的党。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载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先驱》第二十四号）

时局之危机，现在大家都觉悟了，大家都想起来挽救了，只可惜稍迟了一点！

时局之危机来源甚长，此次曹党驱逐黎元洪，不过是长久酝酿之危机中屡次发现之一个最近发现的结果；大家对于这一个最近的结果都大惊小怪起来，而对于酝酿此结果之根本原因却不甚措意，象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如何能救危机四伏之中国！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号称民主国家已经十二年了，而与民主政治绝对不能相容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存在，是以有洪宪之变，复辟之变，安福之乱以及此次曹党之乱。这些连续不断的变乱，都是北洋军阀势力存在与列强势力相勾结之自然的结果。他们多存在一日，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利用他们侵略中国的程度便增高一日，这就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原因。去年奉直战争之结果，我们知道一面是奉直势力的消长，一面也是日美在中国的势力消长。所以当时吾党对于时局主张，曾说过恢复国会，联省自治，黎元洪复位，吴佩孚得势，都不能解决时局；曾说过只有以民主的联合战线，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及军阀背后的外国势力，才是救济中国的唯一道路。

即以此次曹党之乱而论，也非旦夕的骤变。去年奉军战败，美国在北京的势力，几乎取日本代之，那时曹党本欲拥曹代徐，其所以未即实行者只以曹党中分缓急两派（现在还是如此）：缓进的洛阳派吴佩孚主张暂时利用黎元洪为傀儡，直系取得实际的政权，一面以武力削平南方统一中国，一面以金钱包办宪法，然后利诱威迫国会议员拥戴他们的大帅做很体面的合法总统，所谓“武力统一北洋正统”，就是当时吴佩孚号召的政纲；急进的天津派曹锐边守靖^{〔1〕}等，迫不及待，即欲拥曹登台；当时吴佩孚势盛，曹边等只得屈从了他的主张，可怜的黎元洪遂因此做了一年替直系军阀监印的傀儡总统。曹党阴谋酝酿至今，一方面因为削平南方为期愈远，制宪之说徒为黎元洪延长监印时期；一方面又得到美国及亲美派基督徒冯玉祥之助，遂不顾一切而悍然驱逐黎元洪。曹党所恃者，不但冯玉祥之兵力，尤其是以外交系顾维钧等为中间人获得美国之金力，欲以重金购买国会议员及军队，攘窃政权。短视的国民，视黎曹争政为时局危机之焦点，其实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曹党敢于逐黎，因其背后有大力者（美国）之援助，所以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

因为大家不甚措意时局危机之根本原因，所以此时各方面解决时局之舆论，仍不免趋向几个错误的观念：

（一）拥护黎元洪。黎元洪依附军阀窃取高位，在法律上本无根据，在政治上勾结军阀御用之国会与张内阁而为三角同盟，杀工人，伤学生，妄发命令造祸闽粤，以恋位故不惜逢恶长乱，其罪不在曹吴之下；此时政学会拥之抗曹，纯系利用时机，以报私怨而窃政权；其他直系政敌欲以猪黎为傀儡，拥之于奉或浙者，均应为国民所不齿。

（二）拥护段祺瑞。段派与直系素不两立，安福罪恶，世界所知，彼等亦欲利用国民恶曹心理，起而恢复其势力，张作霖卢永祥之于段，亦犹吴佩孚冯玉祥齐燮元之于曹，将来即有变化，其结果亦不外北洋军阀直皖两派首领夺政之争，这两派首领背后都各有一派帝国主义的列强在那里做后台老板，无论谁胜，都非国家人民之福。此等反动的北洋军阀，无论何派利用时机，出而组织政府，窃取政权，曹与非曹均应为国民所抗拒。

（三）国会南迁及制宪。贪横无耻的国会议员，久为曹锟所驯养，或云其中亦有贤良，何以始终同流合污无所表示？代表全国商人工人学生各团体，都已先后宣告否认此国会，不知其尚能代表何种民意？我们认定国会南迁及国会制宪之说，都是违反民意的主张；此种鲜廉寡耻违反民意的国会议员，无论其将来投靠何方，其所定宪法所选总统，国民都一概认为无效。

（四）团结西南联省自治。西南诸将之拥兵聚敛压抑民权，无异于北洋军阀。以此而谋联省自治，仍是联督自保之老文章；若云团结西南以抗北方，观往察来，只是地域上南北割据之争，绝无政治上封建民主之别。主张此说者，不是失意政客欲挟西南为奇货，以达其总裁头衔及分赃会议的欲望；便是贪鄙腐儒欲据此以为拥黎地步而已。

（五）借助列强。创造独立的国家，建设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力，真能艰苦奋斗而成，断不能效有些朝鲜民党，不自努力革命，而呼号于巴黎华盛顿会议，希望外国承认之助力，得以成功。勾结列强的军阀固为人民所痛恨，而痛恨军阀者亦往往有借助列强以制军阀的谬误观念，象这样懒惰取巧依赖外力的国民，不懂得军阀列强勾结的关系，如何能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反之，我们是要求一个以国民自力，由革命而建设的政府，由任何外国帝国主义者所支配所援助的政府，国民都誓不承认。



同胞们！用以上五个方法中任何方法反对曹锟，都不是国民应取的正当态度；我们的主张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若是国民党看不见国民的势力在此重大时机不能遂行他的历史工作，仍旧号召四个实力派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其结果只（是）军阀互战或产生各派军阀大结合的政局，如此我们主人翁的国民断不能更袖手旁观，例如上海总商会所发起的民治委员会即应起来肩此巨任，号召国民会议以图开展此救国救民的新局面。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由此国民会议所产生之新政府，须以真正国民革命的势力，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然后才不愧为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不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个各派军阀合作受列强势力所卵翼的政府。同胞们只有这一条路，是真能救济我们中国人逃出外力军阀二重压迫的道路。

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

打倒勾结列强压迫人民的军阀！

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

注释

（1）曹锐，曹锟的弟弟，当时任直隶省长；边守靖当时任直隶省议会议长。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

（载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二期）

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操纵及国内军阀之扰乱，非人民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外而反抗列强内而解除军阀之政权及武装，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费力气。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然而短视而又懒惰的国民，总喜欢在国民革命以外，费尽气力试用各种药不对症的方法，考验的结果，至今只有空言和平免战，结局仍旧移家逃难丧失生命财产，别无办法！

在直皖直奉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安福派及奉张完全失势，在表面上似乎是中国政治上进步的现象，实际上却不然，因为打倒安福派与奉张并非由于人民的力量，乃是由于另一部分军阀曹吴背后挟着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当时国人迷信曹吴，以为借重他们而国民自己不费气力便可以达到统一和平的希望。殊不知世界上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军阀曹吴佩孚和帝国主义的英美勾结为患的局面之下，只有去统一和平更远；因此，我们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主张全国革命分子结成联合战线，继续民主的革命战争，以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军阀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唯一的道路。

曹吴佩孚眼见国民很容易被他们欺骗，得了政权以后，反动的局面日益严重起来：迫压北京知识阶级；以武力及阴谋扰乱川湘闽粤；惨杀京汉罢工工人；驱逐他们自己所利用为傀儡总统的黎元洪；至此，直系军阀之罪才为国民所认识。此时，国民依旧不信任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找不出第二个象以前所崇拜的吴佩孚，遂转而出于消极否认及国会南迁等懦弱无能的办法，即避开革命的办法；因此，我们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主张由国民党或人民团体出来号召一个国民会议，开始以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来解决一切对外对内的政治问题。

直系军阀，腐败政党外交系及帝国主义者，都看破中国国民懦弱无能，遂敢于流瀝一气，进行中外古今所希有之公开的贿选。曹吴贿选成功将近一年以来的成绩是：

- （一）承认列强临城案⁽¹⁾的要求，以为列强承认贿选之交换条件；
- （二）力谋承认威海卫案⁽²⁾，金佛郎案⁽³⁾，宜阳丸案⁽⁴⁾，以取得帝国主义者援助；
- （三）利用赵恒惕杨森吞噬湖南四川；暗助周荫人陈炯明扰乱闽粤；
- （四）因袒护贿选议员，命捕安徽全省学校学生数百人，并累及其家属；
- （五）向外商进行津赤，烟滩，沧石三路⁽⁵⁾借款；

(六) 在天津购买意大利军械，价值五百五十万元；

(七) 吴佩孚派人强提胶济路款，以充由广东降北之海军军饷，并滥提盐款，强截捐税，种烟贩烟；

(八) 解散胶济铁路工会，并逮捕及开除工人多名；

(九) 因拥护曹党私人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直隶省长派出保安队，包围学校，驱逐学生，逮捕学生代表；

(十) 曹锟的妾舅任意殴打铁路人员，曹锟的卫队任意打死警察；

(十一) 在汉口郑州石家庄逮捕工人杨德甫孙云鹏等七人，在北京逮捕张国焘等五人，均未宣布罪名；

(十二) 禁止学生着白色衣白布靴走过新华门，禁止北京戏馆唱演《捉放曹》《打鼓骂曹》《徐母骂曹》等戏；

(十三) 接受日本公使的照会，通令全国严禁人民“五七”“五九”开会纪念国耻；

(十四) 容纳列强干涉中国商标之要求，商标公报用英文，商标局聘外人为顾问，对于李义元陈（刘）魁元⁽⁶⁾及英舰炮击万县等案之丧权辱国；

(十五) 办理德发债票案⁽⁷⁾，国库损失至少三千万元，收回前存伦敦拟付德债之款，悉作军用；

(十六) 重禁京沪所出多种新书新报；

(十七) 为办金佛郎案，纵令王克敏迫孙宝琦去职；

(十八) 向美国购运大批军火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又购德国军火三百五十箱；

(十九) 力持以造路名义攫取各国退回的庚子赔款；

(二十) 纵令齐燮元兴师攻浙。

此次齐燮元兴师攻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说简单的齐卢个人战争，或江浙战争，其战争之实际性质，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

我们不可迷信中国的军阀真有独立作战之可能，——倘有此可能，已应有一个军阀主义的独立国家。每次内战都有国际帝国主义争斗的背景。国际帝国

主义者，欧战后以英美法日四国为其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关系：从前独霸远东的英国只须保守其既得权利已足惊人；与英争霸欧洲大陆的法国现时工业状况，中国虽还不是他必以死力争的市场，然而也不是可以忘情的肥肉；在中国竞争最烈的乃是欧战中骤然膨胀的美日两个帝国主义者。因为种种的关系，法国与日本站在一边，英国与美国站在一边。日本是帝国主义中之最幼稚者，还有结托中国统治阶级以政治的支配达到经济的侵略之必要；美国是侵略中国之后至者，全中国已没有他回旋的隙地，所以也必须援助一派军阀，树立他在中国政治的势力，以倾覆他在中国经济的敌人——日本。华盛顿会议美国给日本第一次大打击，直皖奉直战争，美国给日本第二次大打击，自此以后，美日在中国的势力消长，我们当已看出；此次直系兴师攻浙，乃是美国给日本第三次总结束的打击。

贿选前（去年五月），美公使曾到保定府和曹锟接洽最高问题；贿选前（六月），美总统哈丁表示美银行团可助中国统一的意见；贿选成时，美使首先称贺；列强为曹政府以武力制止广东政府分取关余时，美国最出力；直系爪牙赵恒惕将失长沙时，以炮舰拒谭助赵的也是美国；以大批军火运到天津给吴佩孚的也是美国；以大批军火运到厦门给直系军队的也是美国；和齐燮元进行导淮借款的也是美国；美国扶助直系是不可掩的事实，此次助直兴师统一中国（不只是对浙），乃是结束一切可与日本接近之政治的势力。

这次战争的爆发是与美国国务卿休士赴伦敦所订关于处置中国之密约（见本月五日路透电）有直接关系；而于英国帝国主义此时勾结广东商团以图推翻孙中山之举尤足证明。我们再看战前直与反直两方之财政与军火的准备：英美赞助曹吴解决德发债票外，英福公司与吴佩孚订定的道济借款为百五十万镑，美公使替该国商人与吴佩孚做成的军火买卖为步枪一万枝子弹二千万颗，机关枪二百五十架，而吴佩孚的飞机队完全由美国人替他组织与训练，并且与苏齐^[8]进行导淮借款。日法军火之输入奉浙，最近张作霖向法商订购快枪三千枝，子弹六百万发及其他军用品若干，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奉浙飞机队之发展显然法国人为之主持，故上次法飞行家杜氏来华，备受奉浙之优待而遭齐燮元严厉之反对。至于张作霖与日本之秘密交涉，也不下于曹吴与英美。



到作霖与日本订约，任其在满洲取得三十年租借权，以换得军火与财政之援助；而齐燮元于宣战时更向美国宣言下沪后任美国在沪设立无线电台。故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间接乃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

在开战的双方：直方于数省人民水灾待救不遑中，大兴排除异己之师，残害人民，自然是此次战乱之罪魁祸首；浙方虽宣布讨曹而非反直，实际上当然是反直战争。反直战争，在目前政治现象上虽然是必不可免的事势，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认为救国卫民的战争，其理由：（一）在逻辑上，只有反国际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争，可以全称肯定他是为国为民，至若“反直即是为国为民”，我们实未能加以承认；（二）军阀自身的性质与环境，在客观上亦无由实现他为国为民的余地；（三）在他们政治的行为上，一向连为国为民的倾向也没有，出兵宣言中虽然抬出抽象的正义与民意，直军讨伐安福奉张时，更说得词严义正，自来口说无凭。所以此次战争，我们只能承认是直与反直的军阀战争，只能承认是帝国主义与军阀重苦吾人民之较前更大的惨杀。

因此，我们可推定此次战争之结果：第一，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第二，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我们对于前者固深恶痛绝，对于后者又岂能欢迎！无论前者后者，外力侵入断送国家生命的惨痛都是有加无已，内部战争屠戮人民牺牲人民的惨痛也都是有加无已。第三，假若双方势均力敌胜负不分或直系形势大有不利时，则野心勃勃的美国帝国主义必然发起干涉中国内政，以图达到共管目的，其形式必然是勒令双方听命于列强强制的和平会议之下，组织买办式的商人阶级与军阀阶级暂时混合统一的政府，而根本剿灭广州和全国一切革命的进步势力。然而即使成功这样的局面，也是暂时的，各帝国主义之间与各军阀之间不久仍要因利害冲突而争斗，不过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便要因此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

所以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一天，即军阀与战争的惨痛存在一天。我们要解除这种惨痛，固然不是空言哀求和平息战可以得到，也不是依赖何派军阀战胜可（以）得到，更不是希望阴谋构成中国内乱以达到其垄断或共管的目的的帝国主义之干涉可以得到。人民若希望此次任何一派军阀之胜利，只有蹈直

皖直奉战时希望吴佩孚得胜之覆辙；若希望什么“友邦”出面干涉，只有步印度安南之后尘！我们对于双方军阀不能存丝毫希望，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尤不可存丝毫希望，这种希望不仅可耻无效，而且要使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更加凄惨更加危亡。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全国被压迫的人民！你们看呀：外国帝国主义刚刚构成这次内战，同时他们在华盛顿与伦敦之间便发起（由美国发起）干涉中国内政，采取强制号召各势力派和平会议的方式来亡中国。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呀！亡国的惨祸是由这次外国帝国主义构成的内战临头了！你们尚可希望军阀给你们以“正义”，帝国主义给你们以“和平”么？起来！起来！

打倒侵略中国构成内战的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屠杀人民供外国帝国主义利用的一切军阀！

全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

注释

（1）一九二三年五月，山东临城（今划归枣庄市）附近土匪孙美瑶部劫袭火车，绑架中外旅客二百余名，并枪杀英人一名。经北洋军阀政府与孙美瑶谈判，六月十二日签立协定，释放被绑架人员，孙美瑶接受北洋政府军队改编。八月十日，帝国主义各国外交团向北洋政府提出通牒，要求赔偿损失，接管津浦铁路护路权，惩办负责官吏田中玉等。曹锟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外交使团的要求，除护路计划外，完全允诺。

（2）威海卫于一八九八年以二十五年为期租借给英国。一九二一年底，我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要求以后，英国一方面表示要交还威海卫，一方面又对该地提出了许多领土主权要求。一九二二年开始，北洋军阀政府和英国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准备基本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引起山东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抗议。

（3）一九二二年，法国政府与北洋政府秘密协议，要中国以金佛郎（即法郎，当时法郎纸币贬值，金法郎实际并不存在）偿付对法庚子赔款，使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随之美、比、意等国也向中国提出了同样要求，消息传出，举国反对。法国政府又串通英美等国扣留

关税余款以压迫中国政府。一九二五年四月，段祺瑞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协定》接受了法国的要求。

(4) 日本轮船宜阳丸号，在四川内战中，替吴佩孚偷运军火给渝军，被省军周西成部截留，拘押船员二名，驻京日本大使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外交使团以此为借口要求控制中国长江的警卫权。

(5) 指由《泰晤士报》披露的北洋军阀政府同英商谈判借款准备修建的三条铁路。津赤，从天津到赤峰；沧石，从沧县到石家庄；烟潍，从烟台到潍县。当时的《申报》、《向导》等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其中津赤铁路可能指的是当时议筑的由锦州到赤峰的锦赤铁路。

(6) 陈魁元可能有误。当时报刊上与李义元案并提的有陈国贤、刘魁元、陈贵元三案。一九二四年二月，陈国贤被控在丰台指挥工兵打伤英国人贝赛尔，英国大使到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由英员到军事审判处观审；六月审判中贝赛尔不能认明陈国贤，判陈打人罪不能成立。一九二四年四月，英人威德比违章漏税，强行登车离开，北洋政府税警刘魁元等前往阻拦，被威德比打伤；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英使援李义元案来严惩凶犯，并准我国派人观审。一九二四年六月，汉口浅田一二洋行日人打伤贫民陈贵元等三人，日本领事不严惩凶手，引起中国人民的抗议。

(7)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洋军阀政府屈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同意以战前所欠德国债票抵作德国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又因急于取回在伦敦所存的九百万元票息充作军费，在谈判中放弃了多项中国应获得的权益，其中仅交给德华银行经管的一项，就使国库损失了三千余万元。

(8) 指盘踞在江苏的军阀齐燮元。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九十二期)

此次北京政变之后，在国内政象上，一方面表现出反直派在北方之胜利，将回复到直皖奉直战前安福交通执政的局面，一方面表现出直系在中部仍保有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其地位；同时，在外交上，一方面表现出英美帝国主义者不能独力挟曹吴攫取全中国，一方面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没有挟段（祺瑞）张（作霖）统一中国之可能。

二

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之企图，约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是所谓瓜分政策，由帝国主义的列强协议在华势力范围之划定，华盛顿会议以前，均属此时期；第二时期是所谓共管政策，由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协力共同宰制中国，自华盛顿会议至今年七月伦敦会议，均属此时期；这两种政策，均因为帝国主义的列强间在华利害之冲突不能成为事实，遂进入第三（时）期，即现在之分立政策。

这种分立政策，和第一时期不同者，只是不取列强间协定形式及表面上避去瓜分之名，而实际上乃是帝国主义者各在其势力范围内——日本在北方，英国在中部，法比在其他方面，——集中当地军阀之力，由经济的支配权力，进而各造其自己支配的政治机关，实行分裂中国。

独有后到的美国，一面因为其国内经济力特别优裕——余资余货——之故，一面因为在中国尚未有独占的势力范围，遂极力鼓吹什么“在华开国际会议讨论施行于中国之一种道威斯计画”，以图寻得相当的机会与工具——游移于英日帝国主义之外的军阀，达到其以经济力宰制全中国之野心。

三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此时不得不大声疾呼，警醒国民，勿固执从前的预料与恐怖，以为帝国主义者宰制我们只有瓜分与共管两个死板方式，应该觉察他们希图宰制我们的别有新而更毒的方式：分立或道威斯计画。前者比后者更有实现之可能，其危险更迫在目前。此种政治的分立，即是国家的民族的分裂，也即是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计画之实现。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



我们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更应极力反对军阀们拿什么各省军民长官会议来代替此会，执行此会职权。此预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筹备国民会议，我们更应号召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的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

此临时国民政府（一）为挽救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危机而成立，自应不妥协的打破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势力；同时，也应杜绝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其道威斯计画之阴谋。（二）依赖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帝国主义尚无确定关系的武力之拥护而存在，至少也应采用国民党政纲为施政方针，方能得农工兵等民众的同情。

四

此临时政府如果成立，本党当然不能妄想他是国民革命左派的政府，或甚至还不是中派；然而我们却准备赞助他，只要他确能防止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或共管（中国）之阴谋，只要他确能镇压一切反革命的军事行动，只要他不妨碍一切平民参与政治之机会。

五

为全民族的解放，为被压迫的兵士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阶级的特殊利益，本党将向临时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本党认定拥护这些要求，是一切人民及其代表之责任，尤其是国民党之责任。要求如下：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

（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因为这是人民对内的政治解放之唯一关键。

（三）全国非战时的常备军，均以旅长为最高级军职，废除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总司令检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军长师长等军职；因为这是杜绝军阀势力集中盗国乱政之重要关键。

（四）军阀之祸，罪在最少数高级军官，失业入伍的兵士们所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后旅团司令部，应采用委员制，军饷公开；应改良现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须给以土地及农具或他种确实可靠的生活。

（五）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谋农产品和他种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之均衡，促成职业的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自卫的组织，这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纪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之规定，废除包工制，工厂卫生改良，工人补习教育之设施，工人死伤保险法之规定，限制童工之年龄及工作时间，女工妊娠前后之优待，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

（七）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设劳动平民之住屋。

（八）没收此次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东北东南战地人民之损失及救济北方水灾。

（九）各城市乡镇之厘金牙税及其他正杂捐税，在国库收入无多，而小本营商者则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废止。

（十）废止盐税米税以裕平民生计。

（十一）增加海关进口税，整理国有企业之收入，征收遗产税，征收城市土地税。此等大宗税收，不但足以补偿废止旧税——厘金牙税盐税米税田赋附加税及其他各种正杂捐税——之损失，并可用为补助退伍兵士失业贫民及推广教育之经费。

（十二）为保障知识阶级之失业及青年失学计，国家预算中，不得将教育经费移作别用，并应指定特种收入如收回庚子赔款等，为实行中小学免费优待小学教员及推广平民教育之用。

（十三）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



国共携手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三大所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

ISBN 978-7-202-06971-4



9 787202 069714 >

定价：30.00元